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 956210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s://www.dne8.net>

金融可以 颠覆历史

挑战世界
金融故事的
观的

长江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金融史课程精华
中国金融博物馆馆长首部通俗财经大作

王巍◎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王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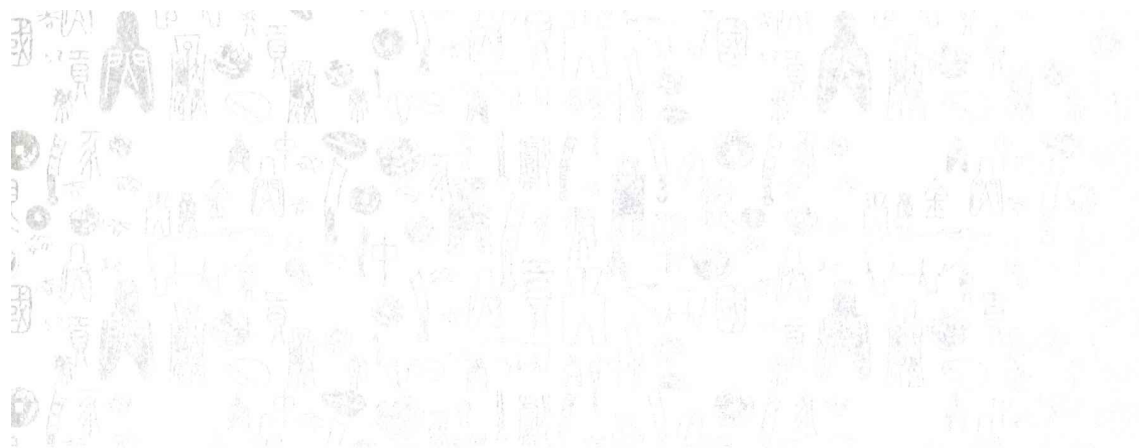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欧和长江等商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并购公会会长，曾获得2012年美国并购论坛终身并购成就奖。

自1982年以来曾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美国化学银行、世界银行、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担任重要职务；直接策划、组织了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被称为“中国并购之父”。

2010年，在天津创建第一家中国金融博物馆，后陆续在苏州、北京等地创建以金融为主题的博物馆。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中国经济圈中叫得上名字的人几乎都加入了顾问团队。

2011年，与好友任志强组织起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了易纲、柳传志、马云、周其仁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做讲演交流，嘉宾自费，观众免费，刚开始的半年就有了3万人旁听，是京城最受欢迎的读书会。

因为作者在金融知识普及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被媒体称为“中国金融扫盲教头”。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王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 王巍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4

ISBN 978-7-5057-3182-0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金融—经济史—研究—世界
IV. ①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6435号

书名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作者	王 巍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毫米 16开 16印张 200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82-0
定价	3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目录

Contents

[推荐序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 周其仁](#)

[推荐序 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的“革命” 任志强](#)

[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闲书 王 巍](#)

[第一章 地中海三个帝国攻城略地的金融动力](#)

[第二章 恶性通货膨胀毁了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政府](#)

[第三章 宋代交子与欧洲纸币的来龙去脉](#)

[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金钱魅力与文明迁徙](#)

[第五章 维京海盗消亡的货币迷踪](#)

[第六章 美第奇家族哺育了文艺复兴](#)

[第七章 张居正的银本位和牛顿的金本位](#)

[第八章 犹太人与金融阴谋论](#)

[第九章 英国光荣革命与税](#)

[第十章 高利贷与现代金融的起源](#)

[第十一章 所谓三大金融泡沫事件的真相](#)

[第十二章 奴隶贸易与金钱](#)

[第十三章 中英鸦片贸易冲突是源于鸦片或白银吗](#)

[第十四章 中国本土钱庄与票号的衰败](#)

[第十五章 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金融的激励](#)

[第十六章 墨西哥鹰洋与货币的全球化](#)

[第十七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

[第十八章 铁路与金融启动现代中国的产业革命](#)

[第十九章 百年前的中国橡胶泡沫](#)

[第二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就输在融资上](#)

[第二十一章 一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

[第二十二章 曹锟贿选与金钱政治](#)

[第二十三章 民国金融的大突破：废两改元与法币的建立](#)

[附：我为什么要办金融博物馆](#)

[部分参考书目](#)

推荐序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

结识王巍多年了。每次和他见面，讨教金融市场和企业活动的实情，总是很有收获。他的语言表达有特点，能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还能把故事和道理讲得极其生动。这位浸淫市场多年的实干家，从来没有因为学院里的书生朋友不解实情而懒得对其讲明白。他蛮有耐心，总记得他叙述时一副诲人不倦的模样。

他也常有令人意外之举。去年年底参加他参与组织的一个读书会，开场前看投放在墙上的视频，才知道这位老兄已经在天津、北京、苏州等地创办了数个金融博物馆。说是访问华尔街金融博物馆时受到一点“刺激”，回来就筹办中国自己的。从画面上看，金融博物馆蛮像样的，定位于民办公益事业，分文不取向公众开放。北京的金融博物馆在朝阳公园内，哪天一定要去体会一下。

几周前，小渔童女士传来王巍的一部书稿：《金融可以颠覆历史》。这倒不意外，因为王巍早就在商学院任教，我也曾经耳闻过选他课程的同学对他任教水准的定评。这也符合我喜欢的传统：遥想古典时代，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咖啡馆里，商人、工匠、学者和神父打成一片，切磋交流，讲起来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在那个经验主义氛围里诞生的条件。王巍有实战经验，讲话言之有物，何况为了办金融博物馆，他和他的团队先要梳理金融脉络，下大功夫，如今用文字写下来，当然是可读之物。

翻开书稿，不久就读到：“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清是唯一的起点。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也包括企业家和金融家们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的。”我想，这是作者的明志之句，需要呼应一下的。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据作者之见，“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我们的金融思想”。这是说，深藏在人们观念里的“想法”可不是无关宏旨。观念影响思维模块，作用于金融思想。思想受了影响又怎么样？那就表现为行为，因为人的行为说到底就是不断的选择，其中思想的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常常是实际行为的第一步。

这些我都同意。或可加以补充的是，观念一旦流行，不仅影响自己的选择，还会影响到他人——很多很多他人——的选择。直追下去，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的走向，甚至让很伟大的文明在很长时间内岔到一条歧路上，多少年也走不出来。

由此看，观念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也更加理解这本书的取向：金融事件固然重要、金融人物固然有趣、金融故事固然传神，然而，最要紧的还是有正确的金融观念来充当灵魂。否则，依托含混不清的思维模块搞推理，受错误金融思想的支配解读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么人们还是摆脱不了可悲的路径依赖。

这就带来了新问题，从哪里才能获得正确的金融观念？把这个问号想下去，麻烦一大堆。从根本上说，“正确”本身就是问题。公说正确，婆也说正确，究竟谁才算正确？这个方向想到底，唯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正确不正确，只能在开放的环境里才可明辨是非，才可能在假说、怀疑、推翻、辩驳、验证的无穷尽的思想过程中，不断逼近正确。

读者会说这个答案太哲学化了。那么好吧，我们具体一点，对任何流行一时、大家都以为绝对正确或不假思索就认为正确的观念，推敲一下吧。拿什么来推敲？拿真实的金融事件（无论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来推敲，换一种思路来推敲。这也许接近了本书的主题，以重新梳理过的金融事件和金融脉络来“颠覆历史”——其实历史早在那

里，真正可以被颠覆的，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是蕴含在历史叙述中的观念！

以“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为例，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劣币驱逐良币”。据查考，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英国1560年有关反对银币成色不足的公告中，相传是对伊丽莎白的通货改革起过决定作用的格雷欣爵士所创（虽然在他的手稿中没有发现相关的叙述）。这个“定律”说，如果多种货币流通，那么成色不足的那种货币（“劣币”）会把成色足够的“良币”从市场上驱赶出去。

从本书提及的在银币中加注了廉价金属的罗马皇帝尼禄，一直到近代英属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劣币驱逐良币”之事时有发生。人们以日常经验推断，似乎市场交易中的那些败德恶行（如假冒伪劣），总是在竞争中具有成本优势而容易打败良行，所以“劣币驱逐良币”还常常超出通货领域，被应用到更为广阔的环境中。比如当下大陆消费者不信任本地牛奶，一股脑儿出境购买，问以何故，答案一般是“劣奶驱逐良奶”。

但是，如果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上述“定律”就难以验证了。我们不妨问，尼禄皇帝的劣币于今安在？当然早就没影了。其实，自古至今，中外劣币何其多也，但没有一种货币因为劣而在历史上站住脚的。进入法定不可兑换的纸币时代，造劣币连廉价贵金属都可以省下的，直接开印钞票就是了。从美国的绿背钞票、威玛时代的德国马克、蒋委员长的金圆券，以及2009年宣布把10000亿面值的钞票删除12个0当1元用的津巴布韦元，不一而足。但是追问它们于今何在？很一致，长期来看这些劣币统统都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良币，至少相对于垮台的货币而言，多少良一点吧。1949年以后的人民币，难道不比金圆券好到天上去了？2010年之后津巴布韦实施的美元化，公道地说，也比原来的津巴布韦币好很多。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吗？为什么从长期看，反倒是良币驱逐了劣币呢？

从观念里找答案吧。原来一时得逞的劣币驱逐良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总流通量不足以满足通货的需求”。也就是说，市场里待交易的商品服务量大，但流通的货币不足。在这个前提下，成色不足的贵金属货币或者纸币，照样可以充当交易的媒介，帮助商品转手，所以照样也被看作“良币”——真正的良币反倒被替代下来，退出了流通。既然“良币”退出，通货更不够，结果就是劣币更受“尊敬”。说到底，通货就是帮助货物流通的。既然同样可以发挥通货功能，货币成色的足与不足，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是，劣币通行会刺激更多劣币的供应。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通货膨胀就来了。这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市场中的人们最后总会知道，物价总水平上升，钱不值钱了，或者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钱毛了”。此时，可不只是良币退出交易，连“良货”——那些具有保值功能的商品——也开始退出市场。人们偏好抢购、囤积，巴不得把手中的货币全部换成货物。这时，被驱逐的就是劣币本身了。货币当局舍不得劣币吗？人们就一并驱逐货币当局。

讲到底，无论市场还是政治里的欺骗，可以长期骗少数人，也可以一时骗多数人，但绝做不到长期骗多数人。否则，人类早就完完，经济早就完完，市场也早就完完。从长期看，唯有良币才能长久。受这个理念支配的国家、人民和货币制度，才具有长期的演化生存能力。

本书涉略的内容极其广泛，可以撞击流行观念的金融事件为数不少。若问正确的金融观念从何而来，我想在长期的金融事件与深入思考之间来来回回，恐怕是一条可取之道。

是为序。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3年4月于北大朗润园

推荐序

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 的“革命”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字历史，却是记录皇权斗争和交替的历史。

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垄断史中，只会以从上向下的角度记录统治的权术，因此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经过加工的历史。

当各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制度上的竞争，而是皇权至上的竞争时，拼的大约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与经济，这种经济的对抗中，既包括了皇权统治的力度（政权的稳定性），也包括了对外掠夺的能力。

在皇权可以任意掠夺的状态下，几乎是没有任何金融发挥作用的余地的。

当中国的皇权强调的是“重农抑商”时，商人不但在社会中没有其应被尊重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其发挥调节经济增长的余地，更不用说发挥金融的作用了。

宋朝之前，中国的街与坊有着严格的规划界线，街为官道、坊为民道，所有的民间商业活动都被局限于坊间。当宋朝打破了这种严格的街与坊的限制条件，并有限地开放了市场时，经济就有了发展，虽战乱多年，但仍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其中就有了金融故事的雏形。

当八国联军侵华、慈禧逃离北京时，是山西的票号和钱庄让其重新回到了皇宫，并以此为交换条件让票号有了更大的流通范围。

鸦片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是一种商品，一种有毒的商品，但在英国人的账本中却将这种商品当成了货币，以此来换取中国的瓷器及其他东西。当这种货币被禁止而无法流通时，战争就爆发了。

曾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许多西方帝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量都远远不如中国，但他们的足迹能遍布大半这个世界，不仅是凭借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依靠了金融的杠杆力量。

从蒸汽机到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除了技术创新，背后都依赖于金融力量的推动。而皇权的垄断和计划经济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除了抑制科幻世界的胡思乱想外，还在资本市场中扼杀了金融的支持，让那些本来弱小的技术创新无法借助金融的力量而更新和成熟，使得其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历史的背后无法看到的是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如果将这些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如同拨开了漫天的乌云，让这个世界照耀在阳光之下。于是书本中的记录变得苍白无力，曾经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无恶不作、流淌着鲜血的资本，原来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同样借助了世界金融的力量，这种金融的力量除了让美国赢得了战争、获得了独立之外，更重要的是让美国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政府的借债让美国人明白，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仅仅是分配财富的权力，因此必须将这种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有了未经纳税人同意就不纳税的约束性条件。也正是如此，才给了市场自由发挥金融作用的权利，从而让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号强国。

金融可以告诉我们的故事有许多，最基础的是当重新认识金融在社会发展、政治统治、经济技术进步和国家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之后，人们会发现，过去政治价值观下的历史可以重写了。

我之所以推荐王巍的这本书，正是由于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认识。当我们共同举办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时，就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的“革命”，让社会重新认识曾被当作教科书的历史记录，并用独立的思考和实践的检验去纠正过去的错误，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

不要认为金融只是货币，更不要认为金融只流行于市场，其实金融要面对的是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变革。未来世界的希望不仅仅依赖于劳动创造价值，更依赖于自由创造财富。

任志强

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闲书

2011—2012年间，我应《创业家》杂志和《财经》杂志之约开了专栏，讨论金融观念和金融史事件，陆续写了二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不断被各种网络媒体转发，引起了业界的注意。我也有机会应邀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开了几次课，有很多企业家朋友选修，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此次得到出版社青睐，结集出版，很是忐忑。我本商人，非金融学出身，更与历史学无缘，只是参与创建了几个与金融相关的博物馆，因此拔帜登场，自然会令庙堂高人贻笑，至少也会落个跨界忽悠、投机取巧之名。好在我一向行走江湖，内心执着，低级错误犯得太多了，再多犯一个也不会受伤害的，何况因此也会得到高人指教。孜孜向学，何其乐也。

需要坦率报告读者的是，创建并管理金融博物馆并非我的初衷，不过是侧面推动而已。不期在筹备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像样的金融史家了。出现这种状况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文化里“士农工商”排序中，商一直地位最低，商业史本就很少被整理，金融史料更是缺乏，民国以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第二，共和国以来的金融学者基本上以意识形态统领学术研究，缺乏客观立场。加上中国金融业态始终置于财政管理之下，时而取消，时而恢复，没有连续历史周期，也难有真正的金融史专家产生；第三，近30年来，人们更重视市场开拓和财富积累，金融史专业没有市场前景，大多数院校已经取消这个专业，教授们也改弦更张。所以，当下的金融史观是一个空白区域，偶有专著也多是所谓的阴谋论和文学戏说。

再需要坦诚报告读者的是：本书不是金融史，缺乏严谨的文字和资料考证；更不是金融思想史，因为没有太多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当然，也绝不是故事和戏说，笔者长达30年的金融历练和学习过程还是可以保证有个知识底线的。我愿意称之为“金融观念史”，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我们的金融思想。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清是唯一的起点。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也包括企业家和金融家们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的。

为什么要面对年轻人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呢？年轻人是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怀着极大的梦想、勇于开拓创新的一群人。他们从无到有，面向的是未来，向未来发掘并创造财富。在这些成功的年轻人背后，金融的观念和资本的支持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在研究力学和物理学的实验过程中，得到了佛罗伦萨银行家美第奇家族的资助；瓦特在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中几度资金缺乏，幸而得到工厂主博尔顿的投资；J. P. 摩根相中爱迪生这个从小被嘲笑为“弱智”的天才少年，联合一批投资者共同资助了他的发明，人类这才开始了电灯的使用；再看看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微软和Facebook成功的背后也同样是金融的创新、资本运作的力量。

创新源泉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面向历史的发掘。每一次回顾历史都可能是一次观念的清理和创新。研究和发掘新的史料，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梳理。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这是奠定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瞭望未来，不是简单地忽略或者漠视历史积累，不断复制曾经的创新过程。当今社会，创业者的主体是80后一代，他们代表着未来。而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改变固有的旧体制，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尽管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留下了一抹足迹，但毕竟已是伤

痕累累。如何消除自身残留的旧体制痕迹，给新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未来环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高度监管的体制下，金融作为一种拥有特殊地位的行业被不断神秘化，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金融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帮助资金融通，让项目能找到钱，让钱能投到合适的项目中，让百姓生活更加便利，让企业家能够自主创业。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金融这个看似简单的工具被赋予了太多特殊的含义，严密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很多自由有效的金融渠道被封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金融行业变得更加故步自封。好的金融制度要保证渠道畅通和融资成本的合理。Access（渠道）和Cost（成本）便是金融改革的核心。

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开馆铭义中我曾提到，金融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的取舍，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朗朗大道。只有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才能平衡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在这种平稳的金融环境下，才能更有精力放眼未来，借助未来的资源提升今天的生活品质，培育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态度。

建立正确的金融观念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社会中充斥了金融阴谋论。鼓吹阴谋论的人实际上是对风险的不理解，他们恐惧变化、抵御变化。他们更习惯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了解了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冷静地思考后知道这并不是崩溃，而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小挫折，新的金融创新的机会正在孕育和发生。就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航空运输行业中坠机事故频繁发生一样，如果人类因此只看到这种交通工具的风险性，而没有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它，又何来今日安全便捷的航空产业？所以创业者要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

我希望能和读者们共同回顾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再现金融历史场景，体验金融观念，把握历史进程中人们意识形态的进化节律。例如，辛亥革命背后的金融导火索、中日甲午战争的金融对决、王莽改币导致的王朝崩溃、科学家牛顿的皇家造币主管生涯，等等。凯恩斯讲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当然，观念的调整也会不时地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随着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出现，我们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我要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另外，我也希望能和读者朋友们有一个彼此的互动，如果你对任何金融历史事件感兴趣，都可以发邮件与我联系，一起加入讨论并发掘更独特的视角。书中的许多内容都取材于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苏州、北京三个场馆的展品。我特别感谢《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李超和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秘书长渔童两位同学的推动、资料协助和文字整理。李超的工作大大提升了这本书的内容质量。

最后还要特别声明的是，尽管本书并非学术之作，但依据史料的态度却是严谨自律的。在广泛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和中、英、日三种语言阅读的能力之上，笔者尽可能地参考了重要的相关金融史资料。但是史料浩如烟海，盘根错节，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笔者还是整理了一个大体参考书目（见本书最后），避免各位见木不见林。此书目也同时挂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网站上，期待大家一起补充。特别感谢周其仁教授，这是出于他的建议。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自2011年7月启动以来，举办了近30场活动。有15000人到场，50多位在思想界、商界、艺术界和政界享有盛誉的导师贡献了自己的心得。我的想法受益于他们，因此本书的全部稿费将捐赠给书院，这也是步了书院理事长任志强的后尘。

王 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E-mail: wangwei@mergers-china.com

2012.12.12

第一章 地中海三个帝国攻城略地的金融动力

历史常常留下伟大的人物和战争传奇，加入神话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密码，但刻意洗清背后操控和支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

在人类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农业和战争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动力。前者是繁衍种群和进步的基础，后者是保护种群和进取的途径。历史常常留下伟大的人物和战争传奇，加入神话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密码，但刻意洗清背后操控和支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金钱是交换的工具，可以交换一切物品甚至荣誉。如果被金钱左右，传奇和伟人便失去了神佑和天分，成为待价而沽的普通人了。事实上，越是依赖于金钱的人物和传奇，越会在历史记忆中被特别努力地与金钱拉开距离。

货币作为便利早期商业的共同交换物和定价标准，其演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石块、贝壳、盐巴、牛羊等物品到具有稳定重量及成色，便于携带和反复转让的金属物件，大体经过了三四千年之久。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源于吕底亚⁽¹⁾王国，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产生了刀币和布币。不过，因为我们的文字记载不清，吕底亚金银币仍被业界视为更确定的早期货币。

吕底亚王国首都萨蒂斯位于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吕底亚人在安纳托利亚⁽²⁾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开发了各种矿藏，其中尤以银金矿为主，吕底亚王国银金矿储藏丰富，吕底亚河流金砂密集分布，这是上天给这个国家的第一桶金。银金矿是一种金和银混合的矿物。他们用这种“白色的金子”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钱币。

克鲁伊斯国王在公元前560年继承了吕底亚王位，开始将流通广泛的金银币标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金本位。之前，人们使用货币时要反复称重量，看成色，程序复杂，交易成本很高。吕底亚狮币由金银合金铸成，由于货币上经常出现一只狮子的头像，因此被称为狮币，具体来说，狮币大概含54%的金、46%的银，重量约4.74克，直径约11毫米。由于采用标准重量和成色的块金为币，质量稳定，所以此类标准铸币很快随着吕底亚的扩张扩散到波斯乃至整个地

中海沿岸，大大便利了吕底亚与希腊诸王国的贸易往来，吕底亚因此成为西亚地区的强国，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建立了阿提密斯神殿⁽³⁾。

克鲁伊斯国王倚仗巨大财富，开始了一系列的土地征服战争，一度控制了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城市。不过，他低估了东边刚刚诞生的波斯帝国而贸然发动进攻，结果大败。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设计用骆驼军队打败了吕底亚的骑兵，并捕获了克鲁伊斯本人，灭掉了吕底亚。但居鲁士大帝看重克鲁伊斯的理财能力，邀请他担任波斯帝国顾问，继续使用吕底亚狮币并将其推广到地中海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

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君主，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达到全盛。他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征服者。在他短暂的统治生涯中，他建立了第一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强国，征服了巴比伦、希腊和印度三个古文明发源地。大流士一世在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打了18次大的战役，铲除了八大割据势力的首领，使得偌大的波斯帝国重归一统。除了政治制度和军事能力优秀外，波斯帝国强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流士建立了一套先进的商业制度和货币制度，历史上称为“大流士改革”。



世界上最早的货币——吕底亚“狮币” 这一诞生在地中海地区的货币，以狮子为图案，代表着权贵和进取。

“大流士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内容上大都与经济相关。首先在赋税制度方面，大流士明确规定了各省的贡赋数额，每省均须向中央交纳一定的金银和实物。具体数额为：小亚细亚4省，每年交纳银1760塔兰特；埃及省交纳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省交纳银1000塔兰特；印度省交纳沙金，约值4860塔兰特；波斯省免税。各省的贡赋，根据各省资源而定，统一输交国库，每省除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外，还有各种土贡，如谷物、家畜等，以供宫廷的需要和各地驻军及远征军的军需。如埃及每年要给孟菲斯的波斯驻军供应谷物，而巴比伦一省供应宫廷和帝国军队全年所需粮食的1/3。

大流士大帝还下令统一铸造和使用金币。由于波斯帝国的疆域十分广阔，各种货币和度量衡在许多地区通行，这就给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带来许多不便。大流士大帝根据当时西亚、北非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情况，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的特权，省区总督只许铸造银币，各自治城市只许铸造铜币。

统一后的金币，正面是他本人的头像，背面是一个弓箭手，这种金币叫作“大流克”，重约8.4克，成色最好，含纯金98%，银币叫作“舍克勒”，重约5.6克，20个舍克勒等于1个大流克。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是各地铸造的，成色不一，大流士又规定国库将纳税者所交各种银币分类，有白银或纯银、二等银、三等银等，按统一标准折算，纳税者要补交成色不足的差额。

因为计算得十分精细，货币铸造、重量和量度都被标准化，所以大流士被纳税者称为“小商贩”。这种金币、银币后来成为古币收藏家眼中的珍品。在货币流通方面，大流士规定帝国流通三种合法铸币，即金币流通全国，银币和铜币在一定地区内流行。这种不同权力的货币分级体系在当时经济系统内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且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集权和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波斯王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从部落联盟一跃成为世界上领土空前辽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其兴盛的原因无疑与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密不可分。但是，帝国的税收政策和包税制度使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处境日益恶化，许多农民因贫困而破产，帝国兵源日趋枯竭，各地民族人民的起义不断爆发。在庞大的波斯帝国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一世及其后继者发动的波希战争，是波斯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波希战争历时半世纪，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被英勇捍卫自己独立的希腊城邦所击败。在战争期间，埃及、巴比伦等被征服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波斯帝国的统治，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军事优势的动摇和丧失，使得帝国的集权统一难以维持。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粉碎。维持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遂告崩溃。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⁴⁾。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中，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⁵⁾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疆域广阔的国家。

作为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同时还是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6年接过王位时，年仅20岁，他通过减少税收的政策赢得了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他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占领了雅典和希腊全境，东进攻入当时的世界强国波斯帝国，覆盖埃及、中东、印度和部分中国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光环下，我们注意到，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长期控制着富有金银矿的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拥有的大量金钱，保证了亚历山大雇用大量军队的能力。而且，亚历山大在攻克波斯帝国首都后立刻掠走了500万公斤的黄金。

希腊与波斯的敌对始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位于小亚细亚的自由希腊城邦沦陷于向西扩张的波斯王国。在爱奥尼亚⁽⁶⁾叛乱和马拉松战役⁽⁷⁾后，公元前481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在第二次波希战争时试图占领整个希腊，但结果战败。虽然薛西斯一世被打回波斯之后再没有进攻希腊，但他在公元前480年火烧雅典卫城及其他被认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使得亚历山大时的希腊政界仍存在着报仇和反攻波斯的声音，这也被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所利用。

而在同大流士进行的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用4万步兵和7000骑兵对抗大流士御驾亲征召集的波斯帝国各部族传说当中的20万步兵和4.5万骑兵，结果波斯帝国一战而亡，大流士逃出战场。取得阿贝拉会战胜利后，亚历山大率军进入巴比伦和波斯的两座都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并且经过长时间急行军终于追上了落荒而逃的敌人。波斯军队为了防止国王大流士三世投降，将他暗杀。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击败了大流士的继承人柏萨斯，彻底征服了波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马其顿王国随即分裂，亚历山大部下将领各据一方，互相混战。公元前301年的伊普斯战役之后，它最终落得与被它征服的帝国同样的下场，分裂为几个独立的王国。



大流士家族跪拜亚历山大大帝 波斯帝国的统治，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军事优势的动摇和丧失，使帝国随之崩溃。

从金融角度纵观地中海这三个军事大国的历史，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诸国中，货币以金银币为核心，货币的积累意味着财富的增长，政治和军事强权都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也是基于金钱积累而攻守。货币的地位非常高，从货币的图案便可观见。吕底亚金银币是以狮子为图案的，大面值用狮头做标志，小面值则用狮爪做标志。亚历山大大帝去世40年后，继任者铸造了印有他头像的银币，表示自己是正统的继承人。银币上刻的是一个英俊青年，目视前方，双眼炯炯有神，头上长角，代表着希腊众神之王宙斯和埃及太阳神的交集。银币的背面则是雅典的胜利女神像和铸币国王的名字。同期，地中海沿岸广泛流通着各种不同王国的货币，基本图案都是象征勇猛的动物，如雄狮、公羊等，以及各国国王和众神像，象征积极进取和权贵。

反观同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早期货币也已经形成流通标准，刀币和布币是主要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刀币是从农业工具的形态而来，并非兵器的刀刃。布币也是从青铜农具“镈”（音博）演变而来的。铭文也只有地名和数额，并无人物和神物的表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刀、布、贝等各种货币，推行所谓“秦半两”，圆形方孔，右“半”左“两”的铭文，也同样沿袭旧例，不着权威标志。以笔者浅见，将货币维持在器用而非权威的位置上，自然有货币流通不如地中海文明那样普及之缘故，更重要的是货币地位低下，还不足以代表财富和权威。

早期货币的功用和地位，还是与当时文明的发展路径相匹配。地中海文明到希腊罗马文明的变迁是文明间冲突与交融的历史。由于金银矿藏开发和金银币的流通，特别是被赋予神权和王权的象征后，货币就成为独立于政权和军事能力的跨国跨时代标准，有力地推动了商业贸易活动，金钱成为了财富的同义词。中国的封闭农业大国环境使得早期货币源于农具象征，局限在交换工具的层面上。低质铜合金的货币本位很难被赋予上层社会的财富内涵，再加上不断的意识形态压制，货币往往带有道德的贬义，甚至在文人圈里被耻于提及。这种货

币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影响着大众对于货币的理解和国家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

(1) 吕底亚（Lydia），小亚细亚中西部一古国（公元前1300年或更早—前546），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

(2) 安纳托利亚，又名土耳其高原，在土耳其境内。

(3) 阿提密斯是希腊的狩猎女神，对古代人来说，狩猎可不是休闲的娱乐项目，而是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之一。故而，阿提密斯深受人们喜爱。阿提密斯神殿大约兴建于公元前550年，据说位于土耳其的古城爱菲索斯，公元5世纪前期被东罗马帝国皇帝奥德修斯二世摧毁。阿提密斯神殿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4) 其他三位是恺撒大帝、汉尼拔、拿破仑。

(5) 药杀水：古地名，就是现在中亚位于咸海的锡尔河。

(6) 爱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其北端约位于今天的伊兹密尔，南部到哈利卡尔那索斯以北，此外还包括希奥岛和萨摩斯岛。

(7) 马拉松战役：是波斯军和希腊联军于公元前490年9月21日在希腊东部马拉松平原进行的一场激战。

第二章 恶性通货膨胀毁了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政府

货币的价值依赖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一旦政府违背货币规律，急功近利，那么恶性通胀爆发之日，就预兆了政府的垮台。

物价上涨是稀缺资源在需求强劲时的自然结果，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历史现象。各种经济学派从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经济结构和货币数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制定了各种政策来应对物价上涨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通货膨胀一词也不容置疑地将社会和政治的关注集中在货币现象上，从而物价上涨始终被归结于上层统治者的权谋和手段。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强劲，人们开始注意到通货膨胀的全球相关性，特别指责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地发行纸币。

最早的通货膨胀与纸币毫无关系，始于罗马皇帝尼禄当政期间（54—68）。当时的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侵占了亚洲，控制了非洲，与尚无正面接触的秦始皇统一下的远东中国成为两个最大的文明社会。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古罗马帝国被称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中描绘“大秦国一名广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堊堊之。有松柏诸木百草”。可见，罗马帝国红极一时，即使是遥远的中国也对其有所了解。

从公元前82年的马略⁽¹⁾苏拉⁽²⁾之争开始，罗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最终恺撒终结了原始的公民共和制。公元前28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彻底清洗元老院。次年，屋大维向自己控制的元老院交出权力，还政于民，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³⁾”称号，罗马帝国从此时开始创立。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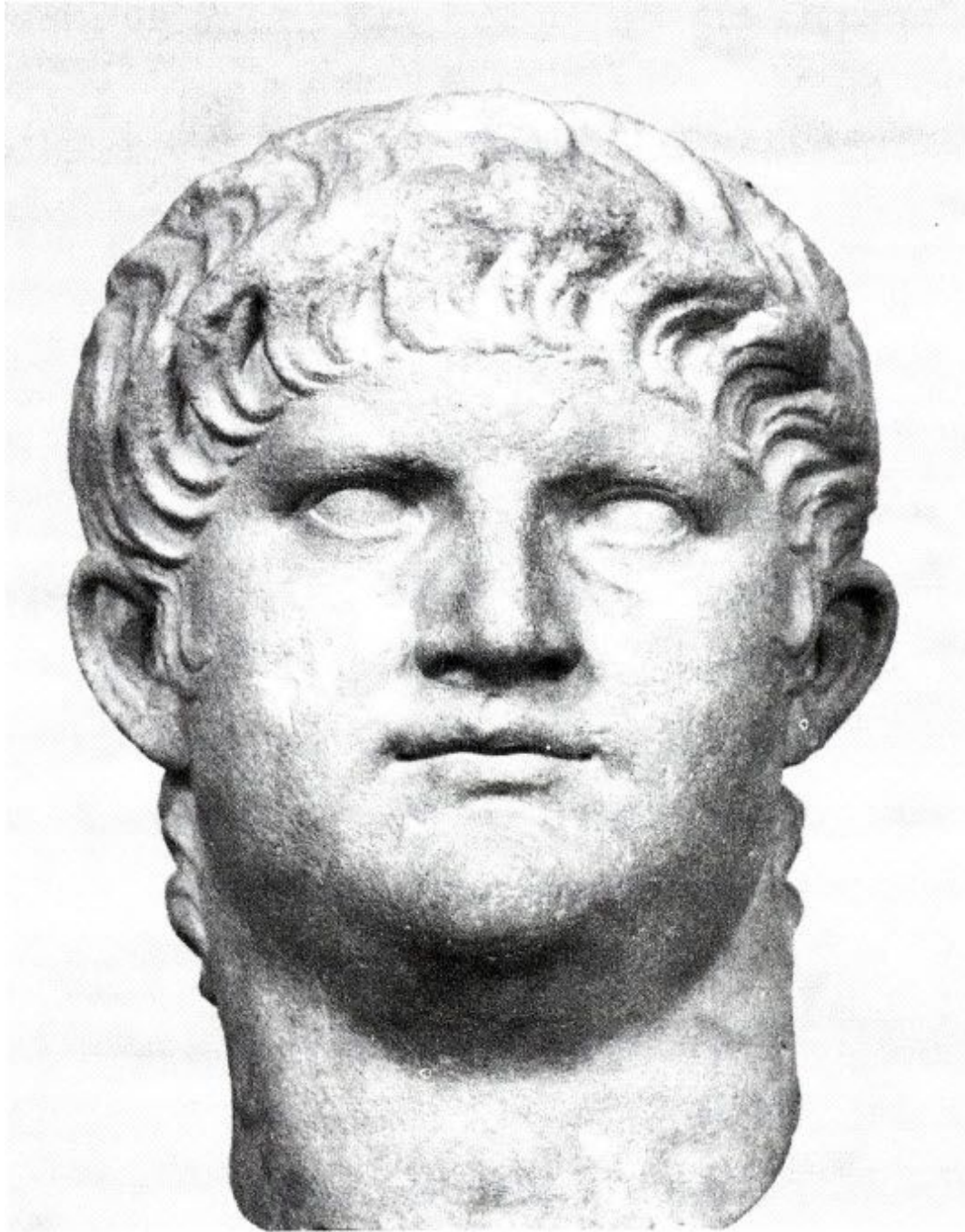
广袤的土地加上战争俘获转成的奴隶，成为强大的帝国军队不断侵略的两大财富激励。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奴隶终会达到极限，扩张不得不中止。罗马帝国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内需。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税赋成为满足皇帝虚荣和控制能力的来源，同时也是瓶颈。

恺撒执政期间（公元前100—前44），罗马建立起了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大军的征服战争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

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贸易，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控制力，大大增强了其实力。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物价稳定、税收适中、贸易经济繁荣，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稳定区间。

54年，尼禄皇帝上台。他具有艺术天赋，写诗、弹琴、歌剧、戏剧，几乎样样精通，但同时，他更是一个充满野心且穷奢极欲的人，罗马城市建设和贵族消费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64年，罗马发生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周，罗马14个区中有10个被毁坏。在大火之后，尼禄皇帝开始大规模重建和新建纪念性建筑，为了筹集工程资金，他采用了降低金银币成色的做法。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时，罗马已经实施了金属货币制度，金银铜币广泛流通在被占领区域，罗马币最为贵重。在无法继续提高税收水平，同时不得不承担庞大军队和官吏群体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禄开始在银币中普遍加铸廉价的金属，如铅、铜等，发行不足值货币（货币贬值）。很快，老的银币就陆续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价银币。这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⁴⁾。货币贬值导致交易率低下、经济衰落，又需要政府继续投入更多的贬值货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政府信用和执政能力逐渐下降。



尼禄像 这位自诩为艺术家的皇帝，被认为是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也是经济史上能追溯到的首次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

据记载，尼禄皇帝在位的14年间（54—68），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90%。到117年，含银量降到85%，到180年，含银量降到75%。又经过两任皇帝到211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仅剩50%。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在1世纪含银量达90%的罗马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268年的克劳狄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事实上，以银币发行量之大，如果足值发行，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可以挖掘的银矿了。尼禄开了头，之后历代罗马皇帝都萧规曹随，如法炮制。此时的罗马银币如同今天的纸币一样，只有信用承诺和财富象征意义。根据英国著名学者琼斯（A. Jones）的研究，138—301年，罗马军人的服装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00倍，按照复利计算，这段时间的物价上涨率每年在5%~6%。金属货币下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发生了。

260—268年，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经济困境，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战争，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士兵开始哗变，以至于国王奥勒良在275年被刺杀。

面对市场上的怨声载道，政府试图改革。但是罗马帝国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采用了强制的管理手段来控制物价。戴里克先皇帝在301年颁布冻结物价的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小麦、棕榈油、甘蓝菜、鹅等商品，甚至理发师、家庭教师等的最高工资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物价冻结后，市场立即陷入萧条，利息率也不断被抬高，法律进而又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自然，正常商业活动全部转为地下经济，游离出监管体系之外。这个法令很快被下任统治者废除。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论文，但货币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罗马帝国的这次通货膨胀，与1000年后出现的纸币无关。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世界上最早的纸

币产生于中国宋朝的成都。宋朝于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当地铜矿不足，流通货币奇缺。商人便纷纷发行自己的票据用于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从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1023年政府还在成都建立了专门机构“益州交子务”独家发行交子，次年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除了用于商业和消费交易外，主要用于战争的军用和财政管理的民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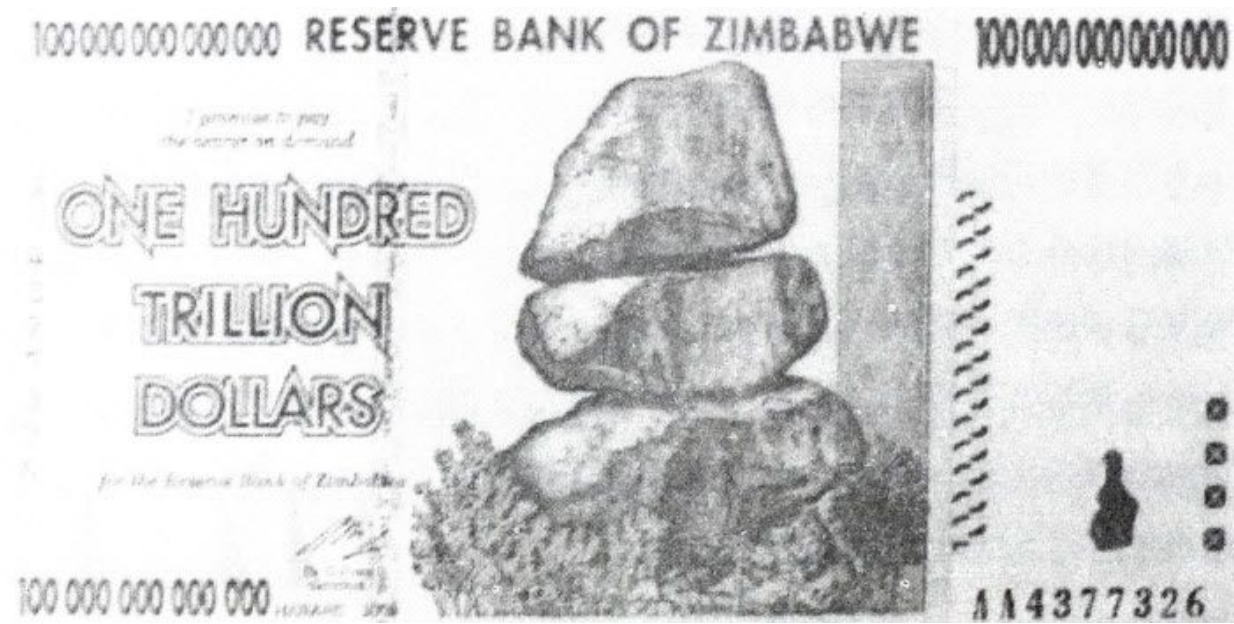
1069年，丞相王安石进行改革，试图把茶叶、食盐、谷物等重要经济资源统一国营，同时强制执行税收货币化。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大交子的发行量。在1107年，国家交子发行达到2400万贯，超过额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采用纸币的方式不断盘剥大众，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也间接导致政府垮台和改朝换代。尽管文献中少有关于通货膨胀的分析，但纸币大明宝钞导致严重危机而被废除之后，中国长期严禁纸钞发行，经济都维系在银两本位的基础上。

几乎所有发行纸币的国家都有通货膨胀的历史，在特殊情形下，还产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在中国金融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民国期间和几年前的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的纸币原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经济衰退期，整个欧洲在1920—1921年间，制造业下降了9.5%。英国失业率高达11%，美国失业率则达11.5%。相较之下，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发生在战败的俄国和德国，并且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其中，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物价指数由262上升为126160000000000，上升了4815亿倍，被称为“最经典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政府无法从税收中筹集足够的资金支付战败国赔款，只能将财政预算平衡的压力转移给印钞机，这一行为极不负责任，但是看起来却是当时唯一能缓解内忧外患的政治压力的权变策略。当然，后果令人发指。通货膨胀爆发后，德国所有薪水必须按天发放。甚至有这样的记

载，发工资前，大家通常都要做好热身准备，拿到工资，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百米冲刺，跑向市场与杂货店，因为晚一分钟，物价都有可能上涨很多倍。德国的恶性通胀最终为纳粹上台提供了土壤。

而进入现代，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则最为知名。2008年7月，津巴布韦开始发行面额为1000亿元的钞票，其官方表示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200000%。起初是由于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强硬态度导致了津巴布韦进出口贸易的停滞，而后政府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开始滥发纸币，在通胀与商品供给量不足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商店倒闭，失业率开始上升。为了挽救经济，津巴布韦政府加大了货币的供给，最终创下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通胀率的纪录。更加不幸的是，几天之后这个纪录便被打破，到了2008年11月，津巴布韦的月通胀率已经达到了796000000000%，在世界经济史上位列第二，仅次于1946年的匈牙利。在经历了10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后，2009年，津巴布韦终于放弃本国货币，开始使用美元。至此，经济形势才逐渐趋于稳定，并且开始逐步恢复。



100万亿面额的津巴布韦纸钞 这张钞票的面世，为金融史上的恶性通货膨胀增添了几分幽默色彩。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仍然需要时刻与通胀做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了应对通胀，决定将黄金价格提高，从一盎司兑换20.67美元提高到兑换35美元，让美元大幅贬值。二战后的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的通胀政策和外国央行越来越担心他们不断增长的庞大美元储备，美元开始承受压力，美国政府开始通过对一些领域实行控制和政府干预做出回应，这些措施保留了黄金可兑换性、美国国债市场、利息均衡税，最终甚至对薪资和物价进行了干预。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将美元与黄金继而与白银彻底脱钩，从此持有美元纸币者再也无法向银行系统兑换黄金和白银，美元价值的唯一维系是美国政府的信誉。今天，黄金兑美元的价格已经超过脱钩时的几十倍，美元大幅贬值。

无论使用金属货币、金属汇兑纸币还是今天完全依赖政府信誉的纸币、电子币，确定交易需求、储备需求和更加复杂的需求（如货币收藏者）并为之提供合理的供给量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市场解决方案，有政府解决方案，也会有同业或国际协调解决方案。在不同发展阶段，市场、政府和同业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解决方案的实施也伴随着不同的结果，如经济发展、市场崩溃、政府破产等，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政策依据、各种效果判断等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金融发展历史图解。人类并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还是会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们始终关注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原因。

(1)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2) 苏拉（约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独裁者。公元前88年任执政官，为争夺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与马略发生冲突，相互仇杀，争得兵权后率兵东征。

(3) 奥古斯都原意为“神圣的”，“高贵的”，带有宗教和神学式的意味，一般用来指称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屋大维”。

(4) “劣币驱逐良币”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第三章

宋代交子与欧洲纸币的来龙去脉

政府的强势决定了货币的强势，强势货币成为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纸币率先在中国出现，暗合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预兆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结构。

约在2600年前，金属货币最早起源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国。纸币则起源于中国的成都，约在1000年前。在金融史的意义
上，纸币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了货币化程度、交易手段的
复杂性、纸张的发达和管理的细致，而且表明了政府信用能力和社会
繁荣的状态。欧美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世纪末才使用纸
币，中国纸币的早期应用和消亡便成为迷津一段。

前文我们提到过，宋朝于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并试图
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并要求当地用铜钱支付税款。但四
川铜矿不足，铁钱被废、铜钱昂贵，流通货币奇缺导致市面冷落、经
济萎缩，民间便出现了许多便利商人经营的“交子铺户”。商人把周
转钱币存入，用时支付保管费用提出，这些存款凭证即“交子”，泛
指用于交易的票据。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商号和
铺户的信用立足，交子作为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铜
钱流通。它的出现，便利了大额交易，也节省了铜钱的使用，尽管有
少量的伪造和欺诈出现，但交子的流通还是受到了民间欢迎。

交子在发行和流通上的成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005年，面对战
后金属的匮乏和经济的萎靡，时任益州（今成都）知府的张咏选择了
16家商号，把他们的票据收齐，由政府统一印制，并且上面盖上公
章，统一发行交子，这一举动代表了政府信用。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
信誉，使得交子获得了巨大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
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
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工具流通。



宋代交子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它的超越时代性，注定了结局的惨淡。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两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1256340贯，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1023年，政府建立了交子专门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次年，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正式被确认。

中间有一个插曲，在史书记载中，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被称为“唐飞钱”的商业票据作为货币流转，比交子早了300多年，但它只是货栈之间的买卖凭证，并不能付现使用。例如一个商家亏欠对方的货款，被欠者又是其他人的欠债者，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就可以使用上家的欠条来付给下家，这样一层层往下，到最后一家，凭借欠条兑现。尽管它在实际上也属于一种货币，但只在商家和产业链中流通，并没有被更广泛的市场所接受，既不面向普通消费者，也没有政府的支持，缺乏强制力，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又不是货币，只能称为发达的商业票据。所以交子在得到政府背书⁽¹⁾后纳入发行，才成为了纸币真正的里程碑。

交子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是北宋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发行量，在政府需要巨额财政开支时，便利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例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益州交子务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在陕西发行交子60万贯，用来支付粮草费。交子的

泛滥和政府信用的丧失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也是北宋积贫积弱和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069年，在北宋社会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丞相王安石曾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行了一次改革，试图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纸币当时同样成为重要的手段。王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在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10%后，再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新的纸币“钱引”，与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这种做法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最高潮。

王安石是一个强势宰相，他上台后进行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发行统一纸币以取代各种官方和私人的地方纸币。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官员薪水和军人军饷都使用官方纸币发放；其次，土地补偿纠纷也使用官方纸币；最后，官方纸币在全国范围推广，政权范围所及的地方都在推行中央纸币。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变法失败，而且也使政府信用崩溃，导致民间出现“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本来试图通过变法扭转社会经济颓势的王安石，却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交子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北宋和南宋都曾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例如在杭州出现了“会子”，也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在售货、赊账或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这些地方纸币，但无法生效。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官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

宋朝衰败之后，相继统治中国的金朝和元朝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并

且面值不断加大，含银价值不断降低。尽管进行了金银本位和记账银本位等各种稳定币制的尝试，但是，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整体经济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藏入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

其实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意识到了货币规律，最终的失败是由于急功近利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造成的，而中国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在金朝和元朝。金、元是游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他们习惯的是掠夺性的边塞经济，进入中原后，发现拿纸片就可以换东西，完全没有成本，却并不明白纸片背后的奥秘。有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在通货膨胀时用纸币发放军饷，导致军人哗变，冲入京师抢劫，皇帝因此逃亡失踪。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但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严格限制在财政收支使用上，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不过，经过300年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和政府竭泽而渔的历史，中国民间对于纸币已经毫无信心，纸币不仅没能进入民间市场，最初在政府与军队中也受到了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200多年后，“大明宝钞”在1522年被皇帝下令废止，正式停用。

白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中国市场的主流货币。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中国本来稀缺的白银储藏和日益壮大的市场规模，恰到好处地与全球白银时代交会。从拉美、日本和东南亚三个方向，白银源源不断地通过贸易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相对丰富的手工业商品——陶瓷、茶叶、丝绸、布匹等，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大量的民间走私贸易真正撕开了闭关自守大国的面纱，这是后话。



中统元宝交钞 入主中原的蒙古皇帝，或许认为大量发行纸币才是掠夺财富的最高境界。然而，他们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如同造纸术一样，纸币的概念也是从中国传入了欧洲。当时来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使者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了欧洲人。他们发现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商家。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直到最近100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

第一张欧洲的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3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公元17世纪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的，而法国纸币则是在1720年左右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中国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不过，历史上的教训拖延了纸币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

先进的货币形态通过政府的强制跨越时代使用，至少有几个弊端：其一，过早脱离了货币与实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自然联系，货币蜕变为政府的执政手段和控制市场的工具，导致了货币的非货币化过程，适得其反；其二，过早的货币职能分离导致金融货币与法定货币分道扬镳，市场的金属货币荒和政府的纸币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破坏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宋、元两代政府的垮台一直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三，通过纸币来注水成为政府自然选择，急功近利的行为和大国崛起的幻觉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经济景气，但从历史远期看，会毁坏政府和社会信用，变成商业文明的内伤。有着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法国、德国和中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弥合伤口。

对比中国和欧洲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的政府能量远远超过欧洲，控制能力强，军权、政权集于政府一身。欧洲国家分裂，并且内部还有教权和皇权的分立，因此欧洲政府信誉远远不如

中国。在中国，不接受政府信誉意味着犯罪，但在欧洲，如果市场不接受政府信誉，政府就会破产。从货币角度讲，只要有政府信誉，都可以叫货币，但是中国货币的统一使其货币影响力远远大于欧洲，也造成了中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土壤远远超过欧洲。欧洲“小国寡民”式的区域型货币使得跨国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必须以金银来结算，这也从客观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早期欧洲除了纸币兑换，还有贸易和保险、雇佣军之间的交换等融资手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欧洲丰富的融资工具能够更强地抑制通货膨胀和分散风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由于没有内外部的博弈，强势政府控制货币和制造通货膨胀，同促进货币形成同样有力。欧洲的货币弱势和中国的货币强势相比，强势货币更容易成为政府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手段，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更强，而西方的货币弱势只能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手段之一，于是给了其他金融工具自行发展的空间，例如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及债券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出现。从中国的货币发展以及同欧洲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形式能够刺激官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压抑了民间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1) 背书：票据的收款人或持有人在转让票据时，在票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续。背书的人就会对这张支票负某种程度、类似担保的偿还责任，之后就引申为担保、保证的意思。即为自己的事情或为自己说的话做担保、保证。

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金钱魅力与文明迁徙

十字军所到之处，是残忍的杀戮和野蛮的抢劫，而商业的文明却在潜移默化中彼此融合。东征的最终失败，促使欧洲人寻找奔向东方的其他道路，大航海时代就要到来了。

十字军东征一直是一段神秘的历史，它是一场历经近200年，动员了千万人，跨越了欧亚非三大洲的一次战争，其中充满了血腥屠城、背井离乡、纸醉金迷的气氛。多年前，笔者曾游历耶路撒冷，也参观了多个十字军战场，陪同讲解的无论是阿拉伯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是非教徒的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个暴行和对文明的摧残。但是，翻阅了许多历史著作和资料，十字军东征仍有太多的迷思需要去重新解读。

1000年前后，经历了罗马帝国衰落后的欧洲正在成为基督教的后院，宗教势力在与世俗权力争夺民众中取得上风，旨在回归宗教精神的克吕尼运动⁽¹⁾已经将欧洲民众的价值观和财富观紧密地与基督教教义和朝圣联系起来。同时，社会也在发生巨大变革。首先，欧洲社会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封建领主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其次，西欧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使得大量贵族无法继承遗产，成为纯粹的“骑士”，他们中的很多人依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为生；最后，西欧新兴的城市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商品市场。此外，受到封建领主压迫和饱受饥荒折磨的农民，也想寻找摆脱饥饿和封建枷锁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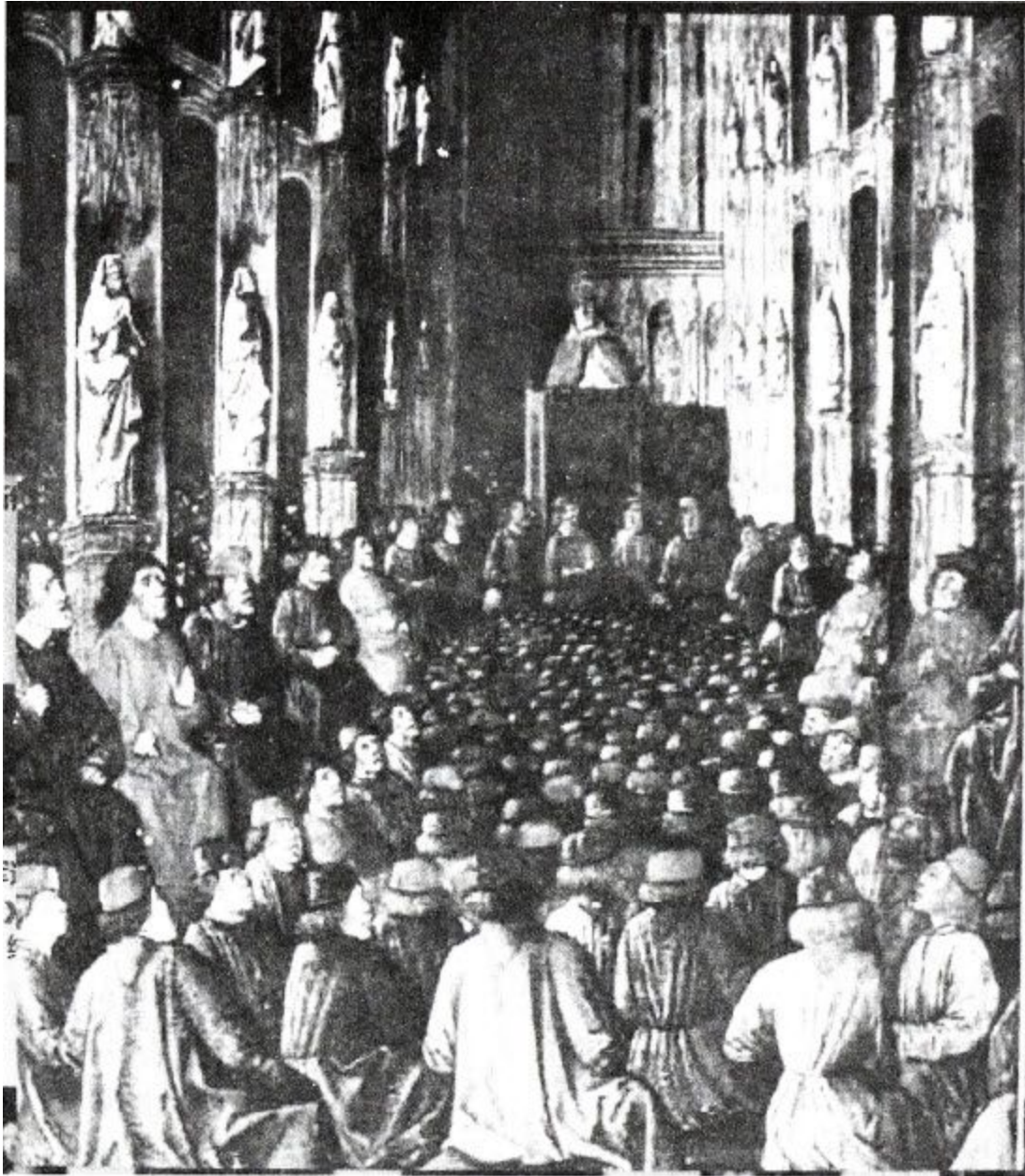
在封建公国林立、乡村正在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中，领土之争、宗教迫害和家族纷争使得大批骑士和农民流离失所，在欧洲不断迁徙求生。基督教声称的“千年末日”成为教徒和民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共同历史机遇，而到耶路撒冷朝圣则是必需的赎罪方式。

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在伊斯兰人手中统治了300多年，并且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彼此对领土的争夺战，在中欧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之间形成了极深的宗教仇恨。伊斯兰教极端派在1009年出于报复摧毁了耶路撒冷的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并封锁

了基督教徒的朝圣路线，继而又进一步在1071年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使得后者不得不向罗马基督教廷求救。

尽管同样信奉基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与远在西方的罗马教廷，已经基于神学理念和权力争夺在1054年就正式分道扬镳，形成了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两系。拜占庭的求救恰好给了罗马教廷一个绝佳的机会大举东进。此外，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刚刚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西西里岛，意大利沿岸各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阶层和共和国舰队等都强烈渴望在地中海和阿拉伯人控制的红海建立政治和商业的优势，毕竟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就在这样的社会变化、种族冲突、宗教对立和商业期待等因素下，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召开宗教大会，号召基督教徒以十字徽为标志组织圣战，向耶路撒冷进军，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圣地。在法国的克勒芒宗教大会结束后，乌尔班二世发表了煽动性演说，他历数基督教徒在东方的痛苦和突厥人的“暴行”，号召贪婪的领主、好战的骑士、冒险的商人和盲从的农民统统拿起武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他还允诺说，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过，死后直接升入天堂。就这样，宗教感情的冲动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使西欧各个阶层全都狂热地投身进了这场战争。



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做十字军东征号召 激情四射的演讲让无数地痞流氓心神荡漾。

从1096年开始，十字军发动了对伊斯兰教徒长达200年的宗教战争，直至1291年才结束。在阿拉伯世界，这场战争多认为是由法国牵头发动，所以被称为“法兰克入侵”。尽管十字军以捍卫宗教和夺回圣地为口号，但事实上这是一场财富掠夺和领土瓜分的野蛮之旅。

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了9次。1096—1099年是第一次东征，也是唯一胜利的一次，当时参加的人数约有10万。1097年，四路军队在君士坦丁堡会合，随后渡海进入小亚细亚，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²⁾的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又在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并且按照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

1202—1204年结束的第四次东征由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发动，主要由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组成，目的是占领埃及。有趣的是，在没有足够的金钱付给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的情况下，十字军按威尼斯贵族将领的建议转去攻打扎拉城⁽³⁾，并利用拜占庭内乱攻打了君士坦丁堡，在抢劫后血腥屠城3天。这次东征虽然没有击败穆斯林，但最终威尼斯占领了拜占庭帝国3/8的领土，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起了拉丁帝国和两个附庸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国家——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

十字军东征的组织是非常混乱的，除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罗马教廷等拥有由教皇和皇帝亲自统帅的正规部队，并且有明确的土地掠夺和财富获取目的外，其他多数成员均是没落贵族骑士和流离失所的平民。他们几万人、几十万人地出征，四面八方向耶路撒冷进军，但没有资金和后勤支持，甚至没有确定的行进路线和日程，完全靠沿途抢掠，得手了就给当地居民和城镇带来灭顶之灾，失败了便溃不成军，任人宰割。1099年，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后立即血腥屠城7天，杀死几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202年的第四次东征，罗马教徒向同宗的东正教徒圣地君士坦丁堡下了毒手并且再次血腥屠城，掠走无数金银财宝，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1291年，在第九次东征时，耶路撒冷易手，被阿拉伯人占领，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的彻底失败。

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历史上被视为野蛮的宗教冲突，臭名昭著，但在东西方文明的改变和彼此交流上却有不同解读。只要去过西西里岛和耶路撒冷，便会明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文化影响了服饰、习俗、商品、宗教、艺术、技术等各个领域。今天更多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次跨世纪、跨区域的冲突和文明迁移，事实上导致了先进的东方文明真正进入了欧洲，瓦解了领主封建制度，启发了文艺复兴，推动了商业与产业革命的兴起。有国外学者曾评论：“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它的影响深刻，对当时可能是全球最强大、最具活力的穆斯林文明来说，东征及其造成的破坏打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穆斯林的信心；而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则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讨论肯定仍将继续。

不过，本文要解读十字军东征，更侧重在过去少有关关注的货币财富力量上，从而窥探它的原因和影响。这是驱动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动力，但长期被忽视了。

第一，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经济正在恢复，乡村经济向城镇经济过渡，商业市场需求更多的货币协助交换。但是，由于欧洲金矿储备枯竭，基督教会又将大量金银币熔化，改铸成金盘和教堂装饰品。银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而且非常稀缺。最为活跃的意大利商人通过在欧洲南部和西西里地区从事国际贸易，与阿拉伯人交易商品，兑换金银币而成为富商，引起了欧洲各地骑士和王公的嫉恨与向往。东方黄金的传说和暴富的憧憬一直是驱动大众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最主要和最靠谱的动力。

许多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没落贵族骑士，最后都没有回到欧洲，尤其是那些在欧洲没有继承土地机会的人，他们留在东方圣地建立起了军事、文化和商业前哨。他们在第一次东征后建立起来的要塞，常常

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移植，这些人通过战争在东方世界获得了他们在西方世界失去的东西。

第二，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曾长期控制地中海沿岸的超级大国，处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接壤地带，其货币是金币贝占特（Bezant），流通了500年之久，主导着欧洲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也在欧洲各国成为币制稳定的硬通货，堪称是中世纪的美元。而与它同期相抗衡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波斯王国则采用了同样悠久、稳定的银本位制度，控制了伊朗和伊拉克地区。这两个大国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财富最多的文明帝国，但在军事上都十分落后，引起欧洲各国长期的垂涎。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拜占庭帝国传统的军区制度早已濒临瓦解。由于多次发生军事将领插手皇族内部斗争的情况，巴西尔二世（958—1025）之后的历任拜占庭皇帝都在解散军区和世袭部队，以遏制军事贵族的发展，他们用雇佣兵代替职业军队，同时削减军事经费，以限制军人势力。实际上，这些措施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军事贵族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造成了内部的恶性循环，这一内部恶性循环使得拜占庭帝国在外部势力的攻击面前无力抵抗。国家财力进一步衰弱，只能进一步削减军事开支，又形成外部的恶性循环。

同时，东征前突厥人夺占小亚细亚，使得拜占庭丧失了黑海沿岸的商业据点，在同新兴的威尼斯、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商人的竞争中，拜占庭开始处于下风。例如诺曼人入侵希腊南部的底比斯和科林斯等丝绸工业中心，将大批养蚕技师和丝织工匠带到西西里，打破了拜占庭对丝绸的垄断地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则彻底破坏了拜占庭的商业地位，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若干次皇室斗争中，为了获得资金，拜占庭皇位争夺者时常以商业贸易特权做抵押。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作为东方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被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据点夺去。到14世纪，拜占庭的商业已经完全萎缩。

第三，7世纪起，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义，从麦地那起步建立起穆斯林帝国，在300年间便吞并了波斯帝国，并击败了拜占庭帝国，成为新兴世界强国。帝国的形成，使得商业贵族进入统治阶级，很多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非欧三大洲，从事中介贸易。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一度延伸到了西欧，对欧洲商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威胁。同时，阿拉伯人征服世界的时候，也继承了拜占庭和波斯两国的金银币本位制度。除了在麦地那有金矿外，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黄金来源是非洲，而控制耶路撒冷和中东就可以扼住阿拉伯人的咽喉。

第四，埃及在法蒂玛王朝时期（909—1171）成为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国际贸易的中心，源于苏丹的黄金在埃及被铸造成金币第纳尔，并在阿拉伯和基督教地区广泛使用。来自国际贸易的税收成为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亚、非大陆之间的红海已经取代亚洲内陆的波斯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此通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入地中海，从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会的枢纽，这就是欧洲教廷、法、德、英皇帝和意大利商人们最关注的商业财富焦点。十字军东征将欧洲的新兴商人同一个广阔的财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对中东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欧洲必须拿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由此促进了欧洲羊毛和纺织业的发展。



十字军的装束 一度叱咤风云的十字军，高举“圣战”大旗，虽然给东方和西欧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对欧洲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十字军东征的最终失败，使得阿拉伯人牢牢控制了中东和红海，也扼守了地中海，欧洲人通向世界的咽喉要道始终不能通畅。但欧洲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冒险精神，让他们在直接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和间接吸收了中国文明后，掌握了算术、航海术、火药、印刷术等先进技术，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终于，他们另辟蹊径奔向东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到来了。

(1) 克吕尼运动：10世纪末—11世纪天主教会内部的一次重大改革运动，因以法国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故为此名。

(2) 塞尔柱突厥人：即更早些活跃在远东中国边境的突厥人的后裔，是西突厥汗国乌古斯部落中的一支。

(3) 扎拉城：今克罗地亚的扎达尔。

第五章

维京海盗消亡的货币迷踪

一个古老的“储钱罐”，揭开了一段隐秘的金融史。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残暴民族，却对货币和金融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

2007年冬天，专门探宝的大卫·惠兰和安德鲁·惠兰父子，在英国约克郡哈罗盖特发现了一个古代罐子。罐子已经有千年历史，里面储藏了617枚银币，及一个实心的黄金臂环，还有许多银制饰物 and 没有打造成形的银块。经过考证，这些财富属于一个维京人的首领，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将财富深藏于此。如今历史学家们对于流传已久的维京海盗和维京人有了更加确切的了解。英国文化大臣霍奇说：“这种发现对我们的历史而言是无价之宝。”英国此前只发现过一次维京海盗宝藏，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发现也不过六七次。因此，这罐宝物便成为大英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品。我们也因此有机会了解，银币是如何揭示一个民族的兴亡与演变的。

史书上记载的维京人（Vikings）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北欧，即今天的挪威、丹麦和瑞典。当时欧洲人更多将之称为Northman，即北方来客。维京人以游牧和渔业为生，拥有当时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维京人从6世纪以来就通过波罗的海不断向欧洲大陆和俄罗斯进逼，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不过，从8世纪起，贸易就演变为商业掠夺和袭击。维京人不断突袭欧洲各国城市和宗教场所，掠夺财富，捕捉俘虏作为奴隶，甚至长期占领土地和城镇。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支维京人队伍沿着西欧的大西洋沿岸向南挺进，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掀起轩然大波。他们大肆劫掠大不列颠岛，并且还向西欧进行了侵扰。英语中的“维京”（Vikings）一词便带有掠夺、杀戮等意思。

维京人都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他们用橡木制造船身和船桨，用松木制造的桅杆可以在大风中适度地弯曲。维京人总是先用整条原木加工成龙骨，以保证强度。弯曲的船头和船尾单独加工，然后用铁钉固定到龙骨的两端。在龙骨上架好横梁之后，就完成了整条船的轮廓。沿着轮廓在船的两侧铺上蒙板。这样，轮廓上的整条木板层层相楔，上面一层刚好能覆盖住下面一层的边缘。在最上层的蒙板上开凿出若干小孔，5米长的木桨就能从孔中伸出。最后再铺上地板，架上桅杆，在桅杆顶上装上金属制的风向标。橹则安装在船体后部的右侧。船帆的两侧都挂上麻绳编制的网，防止船帆在强风中撕裂。这样制

造出来的船，全长20米左右，是维京人最常用的船。这种“龙头船”分量轻、船身狭窄、吃水浅，足以保证在欧洲的所有航道中快速行动。相比较，别国的船，设计很笨重，去不了远海。



2007年被英国人大卫·惠兰父子发现的维京人古钱罐 罐中一些物品来自阿富汗、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应该都是海盗的战利品

维京人又极为擅长战斗，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开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马术、划船、游泳，尤以摔跤为重点，哪怕是冬天躲在屋里玩阿拉伯传来的棋盘游戏，也总是围绕着攻守技巧。维京人数量相对较少，于是战斗中多依靠周密的策划与出其不意的突袭取得胜利。战斗中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热，从不畏死，让人谈之色变，被称为“狂战士”。

由于维京人行动快速，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可以谈判的首领，加之掠夺的广泛和杀戮的残酷，欧洲各国深受其害，当时的大都市基辅、汉堡、巴黎、巴格达、君士坦丁堡以及英国所有城市都曾被洗劫过。8—11世纪被称为维京海盗的时代，至今仍在历史和传媒中不断被渲染和神化。加勒比海盗和库克船长的故事也都有维京海盗的影子。

不过，在横行霸道了3个世纪后，维京人陆续安顿下来，慢慢消失在欧罗巴大陆的版图上。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版本描述维京海盗的去处：或者被英国国王镇压而臣服，或者被法国文化折服而同化，或者被基督教文明感化而放下屠刀，或者是发现了农业和商业文明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而转型。所有不同角度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历史依据。

让我们看看熟悉金融的历史学者如何从银币中揭示维京海盗之谜吧。在确定这罐宝藏属于一个离开的维京首领之后，学者们开始专注于银币的来源。当时英国的东北部被维京人占领，西南部则是盎格鲁—撒克逊⁽¹⁾人的天下。罐中银币的大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发行的，那些银条、银块也被维京人用作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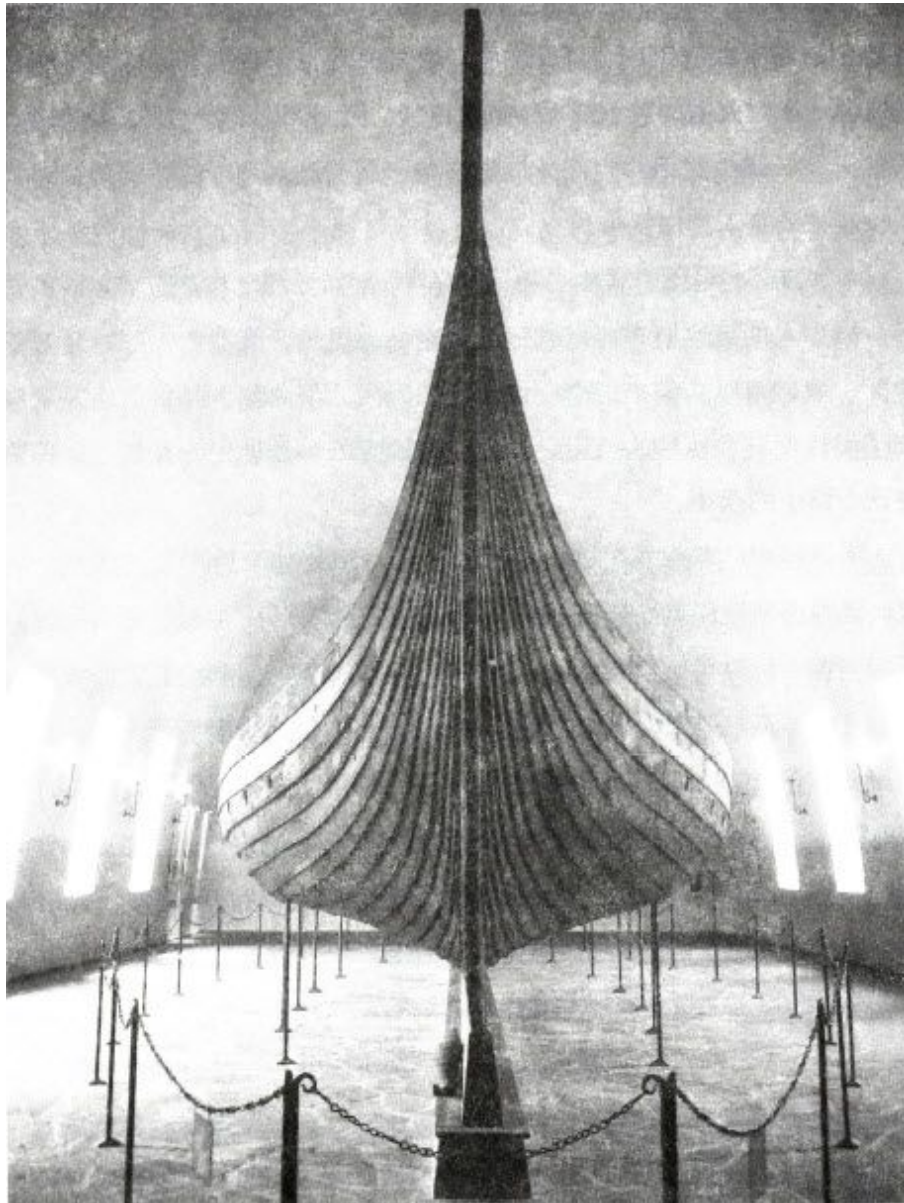
令人惊奇的是罐中居然有撒马尔罕⁽²⁾、阿富汗和巴格达三个地区的银币。维京人的足迹遍布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里海、俄罗斯大陆、阿拉伯地区，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全球贸易和货币已经发展到了何种便利和快捷的阶段。如此广袤的区域，各种货币交易都能积聚在这个海盗的罐中。

考古学家从北欧的墓葬群中找到了不少别的地区的产品与钱币。不过，看得出来他们更加喜欢白银，商人随身带着天平，用银块充当砝码。石刻与传说记载了他们的旅行：860年，沿着伏尔加河顺流而下

的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他们同当地的斯拉夫人做交易，从诺夫哥罗德⁽³⁾南下，沿河来到波尔加，用奴隶换取蜂蜜和毛皮；再顺着伏尔加河进入里海，换乘骆驼，一直来到巴格达，交易丝绸和香料。

据考证，维京人的另一条贸易路线是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进黑海，到达盛产葡萄酒、丝绸的伊斯坦布尔，出售精美的珠宝首饰。

根据维京人的贸易路径和货币积累，可以推知当时被维京人占领的乌克兰的基辅是重要的中转城市，来自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货物经过基辅和波罗的海到达北欧。从银币的多样和磨损可以看出，这个贸易不是直接的，而是不断接力的结果。



维京人的龙头船 维京人轻便的龙头船，承载了这个神秘族群最热血浪漫的岁月。

罐藏的银币中有几枚是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瑟尔斯坦（Athestan，923—939）制造的，年份是927年。正是这个国王最终打败了维京人，统一了英格兰岛，使得分裂了几百年的英格兰终于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得到其后历届英国国王的尊重。

另外几枚银币上，圣徒彼得手中的剑被改成了锤子，这是维京人信奉的挪威教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维京人正处于宗教皈依的过程中，但顽固地保留着历史。从这个罐子保存得如此完好这个情况上也可以推测出，这个维京首领只是打算暂时离开信奉基督教的约克郡而已。

一部分维京人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他们基本迁徙到德国、奥地利一带，与古日耳曼人融合。一部分维京人被法国国王用土地和爵位收买变成诺曼底公国居民。另一部分维京人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建立起俄罗斯公国。当然，今天的无数英格兰人也是维京人的后代。甚至历史学者还指出，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维京人已经访问并占领过这个新大陆。维京人已经是一个消失在欧罗巴大陆的民族，但维京海盗却始终是现代文明的梦魇。

关于维京海盗的故事和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许多流传很久，被大家熟知。但笔者最关注的是，如同任何一个人类族群一样，货币成为维京人贸易和储藏财富的工具，它们是如何帮助维京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为日耳曼人、诺曼底人、英格兰人和俄罗斯人的一部分，并进入农耕社会安居乐业的，又是如何帮助维京人在近代历史上扮演发现新大陆和殖民者的角色的。显然，货币和金融体系对一个活跃了几百年又融合于欧罗巴的民族文明历史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史和人类文化对金融这样的制度演化远远不够重视，没有像科学进步、技术发明、政治体制和语言学等一样进行系统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维京人一样具有迁徙意识的族群，如曾远征欧洲的蒙古民族、今天的吉卜赛人等，都是没有多少金融制度安排的族群。当年的蒙古人占领中原地区直接照搬了宋朝先进的货币制度，

而且赋予其更多的掠夺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不过，同样是在全球迁徙的犹太民族，则最终建立了令所有民族望尘莫及的金融帝国，这真是值得研究。

(1) 盎格鲁—撒克逊：本意就是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是一个集合用语，通常用来形容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

(2) 撒马尔罕：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自古以富庶、商业发达而闻名。

(3) 诺夫哥罗德：俄罗斯一个最古老的城市，建城于859年。

第六章

美第奇家族哺育了文艺复兴

无数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形容为阴险和粗俗的金融家，以其巨大的财富能力塑造了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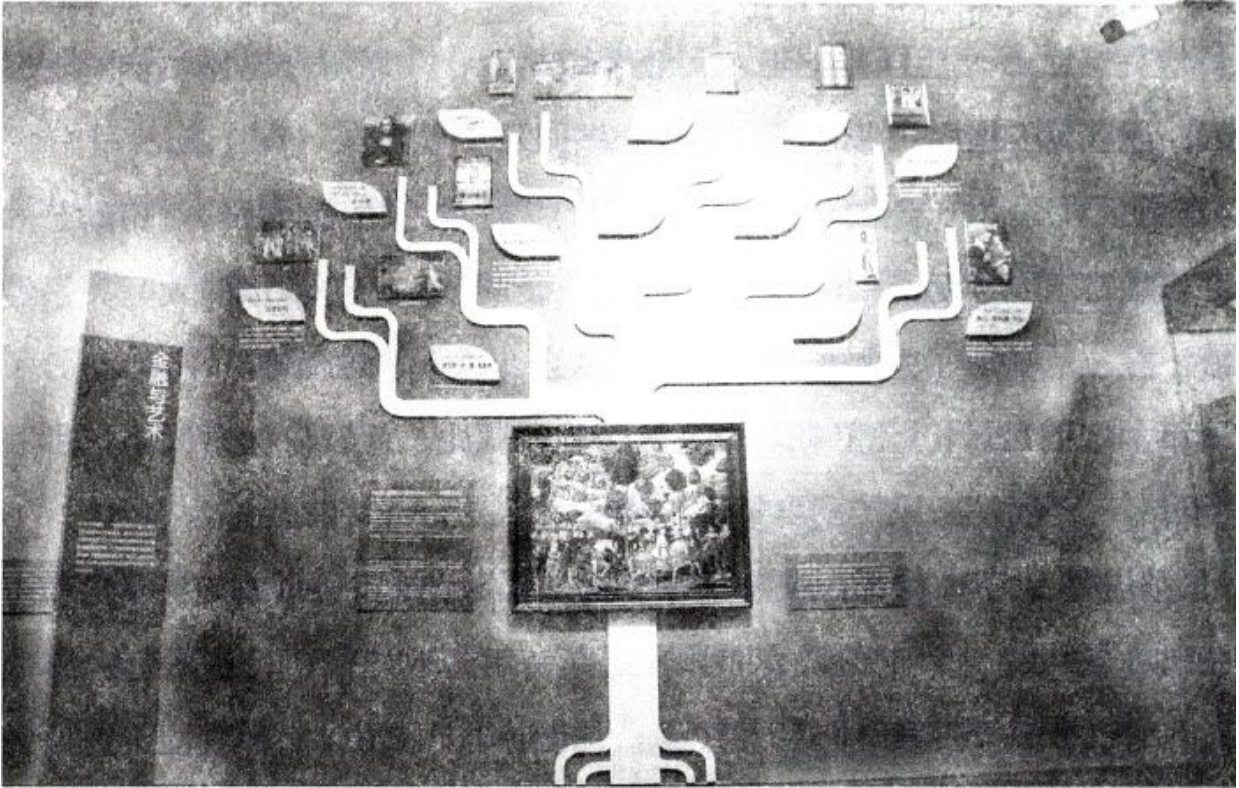
中国金融博物馆有一幅金融与艺术的家谱图，受到众多访客的青睐。在这幅图上，活跃在15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被绘成粗壮的树干，而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伟大艺术家和作品则被放置在茂盛的枝干上。

这些艺术家有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多那泰罗、提香等，每个伟大艺术家都开创了历史，而美第奇家族则“哺育”了他们。不仅如此，受到美第奇家族资助的还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科学家伽利略。而且这个家族还产生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皇后，其中一位还推动了法国卢浮宫的诞生。

在经济史上，美第奇家族是现代金融业的开山鼻祖。13世纪以来，经过十字军东征的洗礼，欧洲通向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传统海洋贸易路线被阿拉伯人切断，意大利成为欧洲最主要的贸易大国，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进口。

意大利人在跨国贸易扩张中积累了大量的周转资金和财富。专门从事货币汇兑、货物抵押、结算、保险和有息贷款的商业银行在这个国家纷纷诞生。排斥贷款付息的基督教势力较弱的佛罗伦萨逐渐成为金融中心。特别是在1252年发行了金币弗洛林后，佛罗伦萨创造的标准货币在整个欧洲广泛采用，进一步巩固了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地位。

美第奇家族是13—17世纪称雄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该家族最初经营兑换钱币的钱庄，后来随着财富的大量积累设立了银行。在众多家族领袖中，三个重要人物维系了美第奇家族的传奇。



金融与艺术的家谱图 中国金融博物馆内这幅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一个金融家族对艺术的哺育。

乔凡尼·德·美第奇（1360—1428）奠定了这个家族的财富和政治根基。1397年，乔凡尼在佛罗伦萨建立了后来被金融界广泛认可的第一家股份制美第奇银行，1万弗洛林金币的资本中，乔凡尼占55%。乔凡尼专注佛罗伦萨当时最为活跃的羊毛加工业和贸易业，采用所有已经被创新出来的商业票据等金融手段，迅速领先欧洲同行。

乔凡尼在1402年担任了佛罗伦萨的银行商会主席，并通过资助艺术家提供市政建筑艺术作品赢得最初的社会声誉。经过多年的人际关系经营，乔凡尼扶植了曾经落魄不堪的主教当选教皇，从而在1410年接管了遍布全球的教区汇款和善款的经营活动。从此，为罗马教皇体系提供银行服务成为美第奇家族财务的长期资源。

而对未来下地狱的恐惧和赎罪情结，也成为美第奇家族始终看重和资助宗教艺术的一个内心动力。乔凡尼是美第奇家族第一位资助艺术界的人，他欣赏并长期赞助马萨乔⁽¹⁾，正是这位早逝的天才在透视法等方面对绘画做出了彻底的改革。

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则代表了这个家族的权力高峰，他在美第奇银行接管罗马教皇的财政后，利用宗教势力的支持，不断参加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²⁾地区的政治角逐。在经历了一段失败并接受政治流亡的过程中，科西莫沉浸在宗教艺术和对历史遗迹的搜寻中，培养了对古代艺术和文献的鉴赏品位。科西莫在1434年回归佛罗伦萨并长期操控市政府，成为无冕之主。

科西莫是希腊罗马时期文献和雕塑的狂热搜集者，引进了多那泰罗这样的艺术家为佛罗伦萨创造传世的大卫雕像。他还支持穹形屋顶的创造者布鲁内莱斯等一批建筑师全面改造了城区，宫殿、图书馆、教堂、修道院等纷纷采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造型。这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之城，成为欧洲艺术家云集之地。科西莫本人也是最重要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者。

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1492）让美第奇这个家族真正与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和佛罗伦萨的历史成就结合起来。他二十几岁便接替祖父科西莫的统治者衣钵，与罗马教皇合作巩固他在佛罗伦萨的支配

地位。一次政治暗杀中的侥幸得生，让他更加注重强化军事实力，使佛罗伦萨的实力大增。

不过，洛伦佐的伟大还在于他亲自提携和资助了三位影响人类文化的艺术大师，即画出《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的波提切利，画出《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达·芬奇，以及画出《创世纪》和雕塑“大卫”的米开朗琪罗。这三位大师以及日后间接受益于美第奇家族的伟大画家拉斐尔、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科学家伽利略等都是意大利和欧洲的一时之选，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成就也给洛伦佐带来了巨大的光环。

在三位杰出人物之后，由于欧洲稳定和平的环境不再，教廷争夺和意大利诸国与法国之间不断征战，美第奇家族后继者无力维持大局，多次被驱逐或剥夺权力，重心一度南移到罗马。再加上意大利羊毛加工业衰落，英国纺织业兴起，贸易和金融的中心也渐渐北上，美第奇家族每况愈下，不足百年便没落了。

多年前笔者曾到意大利佛罗伦萨游览，三个主要的宫殿——美第奇宫、乌菲兹博物馆和碧提宫博物馆都曾为美第奇家族所拥有。一个从高利贷生意起家，精于计算的金融家族，沉浸在中世纪前的古典浪漫艺术之中，并主导开启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与大众文化认知中对于金融家的定位相去甚远。



科西莫·德·美第奇 金融之都——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作为艺术的狂热爱好者，他把佛罗伦萨改造成文艺复兴之城，而他本人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

事实上，美第奇家族与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一样，在当时的传媒记载中也多是负面阴暗的，往往被政府和社会群体视为公敌而动辄得咎。这主要是基于他们强大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商业创新被视为巧取豪夺之举，他们的权势追求被视为阴谋和贪婪，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炫耀与堕落，他们的性格和风格被刻意丑化和憎恶。权势很少会在历史上被公共知识分子认可，而后者却是记录历史和塑造话语体系的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融家族在社会声讨和文化鄙视中始终安然无恙地从事他们注定要创造的事业，持续积累财富和声名（即便是臭名昭著），继续成为大众仿效和跟随的榜样。最终，正是这些被鄙视不懂文化艺术、举止粗俗的金融家族，用他们巨大的财力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崇拜敬仰的文明里程碑，也迫使公共知识分子们并不情愿地给予他们起码的历史尊重。重温美第奇家族的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商业和金融是艺术和文明的温床。

没有商业的积累，没有财富的投入，没有财富来认可和衡量艺术的价值，艺术家就不能得到持续的支持，从而摆脱贫穷的烦恼，继而来专注于艺术创造；也不能集聚交流，形成艺术家群体，激发各自的才能；甚至不能引发社会对于艺术的认可。

即便人们总以凡·高为例，试图证明伟大艺术家可以是饥寒交迫的产物，但如果没有凡·高弟媳的经营、传媒的发掘和不断接力的投资者支持，凡·高会如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被遗忘在历史上。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商业发达和金融家族集中的地方，也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最旺盛的地方，美第奇与佛罗伦萨的历史就在于此。

金融是创造价值的商业活动，不是巧取豪夺和毁灭社会财富的祸首。人类只要成长，就会有产业的形成和分工的确定，而价值交换是所有商业活动的核心。产品交换和上下游产品的整合就自然有专业和专注的货币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最大效率、最低成本地建立了便利商

业交换实现的市场规则，提升了体系稳定和成长空间，降低了所有参与者的风险。

美第奇家族的成功经营，巩固和保证了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成为欧洲的贸易和商业中心，并有能力吸收当时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乃至教皇的关注。同理，今天金融最发达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上海等，也是最发达的艺术文化中心。

第二，财富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换句话说，什么人能够最有效地将财富用于创造价值和推动人类进步，这是一个容易引发分歧的问题，也是值得不断讨论的课题。

美第奇家族控制了佛罗伦萨的财富和政治，推动了艺术创造，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法国的财富集中于国王手中，在欧洲到处穷兵黩武、争夺地盘。罗马的财富集中于教皇手中，横征暴敛支撑着腐败与奢侈的时尚。威尼斯的财富则集中于商业贵族群体，唯利是图的社会中，盛行商业实用主义。

王权和教权垄断财富，必然剥夺民间的创造性和自由主义激情，分散化的商权也难以超脱竞争压力而关注精神世界。美第奇家族最重大的贡献便是将目光投向艺术创造和科学创新，并且在佛罗伦萨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大众信念，即艺术和文艺复兴才是真正的财富。他们不仅自己长期投资艺术，而且迫使自己的敌手也在这个平台上参与竞争。

不过，多数获得了财务安全的艺术家们却总是刻意拉开与财富的距离，渲染自己的创造力与财富的负相关故事，甚至不断攻击财富给艺术带来商业污染，并使其品位低俗。这种艺术家的不自信恰恰表现了财富对艺术的呵护和宽容。同样，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矫情地批评财富创造和金融家阶层，对现代化社会的浪漫怀旧看上去更像是对早期商业和金融秩序的称颂。

第三，宗教、政治和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艺术的尊重，是美第奇家族传奇得以实现的前提。

美第奇家族成员曾两度被政治流放并经历暗杀的洗礼。但其家族的资产，特别是大量艺术作品和珍藏文献却始终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美第奇长期经营的宗教势力和政治体系都明确保护私有产权，政权和教权的更迭也没有绑架家族利益和市民利益。商人和金融家的社会地位始终是独立和具有尊严的。这与中国历史上将财产包括人身都当政权衍生品和依附物的认知全然相反。制度的稳定与安全造就了美第奇家族在商业经营和艺术推动上的长期信心。

参考中国金融业的同行，如明末沈万三家族、清朝和坤家族、民国孔祥熙家族，我们可以痛切地体会到制度环境不同造就的巨大差异。

金融家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决于金融之外的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观念对财富的认同，政治法律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改朝换代对商业契约和人文传统的继承，等等。没有这样的土壤，金融的发展无从谈起。



沈万三铜像 作为中国与美第奇家族基本同时代的伟大富豪，沈万三结局显然更加悲催。两种社会制度下的豪商截然不同的命运，发人深思。

(1) 马萨乔 (Masaccio, 1401—142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画家，1422年加入圣路加工会（正统的画家行会），1428年秋卒于罗马。原名托马索·迪乔瓦尼·迪西莫

内•圭迪，马萨乔是其绰号，他作风懒散，除了艺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性格放荡不羁，但在艺术上很受同行们的器重。

(2) 意大利境内。

第七章

张居正的银本位和牛顿的金本位

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无意中在中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几乎同时期的科学家牛顿，将错就错在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300年后，采用不同本位制的国家相遇，货币本位制的冲突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货币本位是一种政府认定的货币标准。尽管人们在市场交易中使用货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货币的材质、重量、质量、流通时间和范围等却大有不同，使得货币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交易手段，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扩张，也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只有政府的权威介入后，货币才能从市场交易工具提升为一种标准和货币本位，保证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货币间有一个认可和转换的基础。货币本位的形成是进入现代经济的基本前提。

我们将历史的视野回溯到500年前，当时的欧洲和中国是主导全球经济的两个最大市场，货币本位也是在这个市场上形成的。而且基于不同的货币本位，两大经济体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数冲突和彼此促进。有趣的是，作为这样重要的现代经济基础平台，两大货币本位的建立却是由失败的事件和失败的人物推动的。

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当时，不但国库里没有积累多少财富，而且中央也不清楚国家究竟掌握了多少财富。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在于土地，在张居正之前的1000多年里，土地丈量不清、申报不够准确，一直都是国家存在的一个问题。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动辄上万亩。这些土地中，大部分被地主隐瞒，他们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导致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社会矛盾激化。

面对这种局面，担任首辅的张居正从万历九年（1581）开始，主导了一系列包括吏治、军事、水利等方面的改革。吏治方面，他制定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的情况，并定期向内阁报告，还罢免了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军事方面，他主张与北方鞑靼修好，恢复了茶马互市贸易，以求经济和农业发展免遭战乱破坏；水利方面，他主张治理黄河，开凿运河，便于货物运输。而在张

居正众多改革方案中，力图强化中央集权经济，扩大税收、稳定交易和物价市场的经济改革，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可以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关键，也是整个变法的核心。所谓“一条鞭法”，即在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简化税负，摊丁入亩，以银折税，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将人口计税转向土地计税，将实物和劳役付税转向以银付税。具体来说，它包含了三个要素：首先是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均平。史料记载，仅据部分清丈的结果，全国就增加了土地2.8亿亩。其次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再次是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征税差役全部改为银差。

张居正的变法十分严厉，当时中央直接派遣了几万人到各个地方实地丈量，这是井田制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系统化地丈量全国土地。张居正的改革，使得明朝税收增加了70%，相对于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改革后国库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六年食用。

但是，这项改革在经济上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首先，明朝是银铜双本位制。银两是主币，官员俸禄、税负和大额支付都以银两计算，官方和民间均可以铸造。铜钱则是辅币，不同时期与银两有一定比价，多用于市场消费，只能官造不得私铸。纸币偶有为之，但因前朝通货膨胀太过，政府信誉很差，多不流通。“一条鞭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确定了银本位的制度，这是中国产权确认和货币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工商业者无地无须付税，也推动了城市居民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尽管张居正的改革在他去世不久后就立即被全盘推翻，但银币成为本位币却已经无法倒退了。

其次，因为新的税收要求用白银兑现，导致需要纳税的地方大地主纷纷自己铸银造币，一时中国出现了罕见的银荒，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影响了之后200年全世界白银的走向。

500年前的全球经济还是分割游离的几个板块，基本自给自足，跨国贸易的成本极高而且品种很少，白银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一条鞭法”之后，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白银的需求变成长期和持续的，在中国人眼中，白银不仅是交易工具，还逐渐成为积累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导致金银成为财富争夺的焦点。1493—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曾有学者研究提出：“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中国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中国与西班牙两地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极为丰厚的利润。白银向中国的流动主要有三个路径：拉美直接到中国，拉美通过欧洲到中国，从日本到中国。日本是产银大国，和中国是近邻，白银可直接进入中国；拉美的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的白银，则通过茶叶和瓷器的贸易进入中国；欧洲白银同样通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

中国成为世界白银大国，这对世界尤其是欧洲来说，则是银荒的转嫁。首先，他们的贸易也是使用银币；其次，欧洲教会大量使用银器。这种相互交织的因素，成为后来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之一，也逼迫牛顿在英国实行金本位，最后还导致了鸦片战争。



张居正 张居正无心插柳却实际上在中国第一次确立的银本位制，在其后200多年间，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白银的走向。

几乎与张居正改革同一时期，在地球另一侧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银币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但在白银向东方流动的过程中导致了其稀缺性，稀缺性又导致了金银价格有了更多调整。更多的银币退出了交易市场，被存储熔化，或者流向中国和亚洲。此外，在贵金属本位下，货币磨损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消费者本能地要保留足值货币，使得破损和不足值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指在双本位货币制度的情况下，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如果其中之一发生贬值，其实际价值相对低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那么实际价值高于法定价值的“良币”将普遍被收藏起来，逐渐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于法定价值的“劣币”将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它导致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当人们的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大家都更愿意把旧钱花出去买东西。

为维护国家货币稳定，同时也是为获得更多的铸币收益（铸币面值与铸币成本的差额），英国政府每隔几十年都要进行一次货币重铸。战争引发财政困难等因素导致英国政府在货币重铸上有不同的选择——以足值货币重铸，还是以贬值货币重铸。实际上，这是两种货币理念的冲突，前者是金属本位，后者是政府信用本位。

1696年，在担任财政部长的同学的推荐下，已经成名的科学家牛顿进入英国造币厂担任总监，三年后接任厂长。牛顿是一个科学家，希望能够做出完美的东西，因此在观念上认可货币必须足值。为了提高铸币产量，他在财政部后花园里建起了10座熔炉，分期把旧币熔化成贵金属，再送到伦敦塔造币厂。由于市场上缺少货币，他还不断改进铸造技术，在很短的时间里，英国的造币能力提高了8倍，由起初的每周1.5万磅铸币量，达到了每周12万磅（约5万公斤）铸币量。同时，牛顿还积极提高铸币质量，他利用自己科学家的背景，不断研究改良铸币生产工艺，新币在精度、纯度甚至图案花纹方面都要做到绝对标准化。

在实际操作中，足值货币却遭受到了巨大阻力，例如有人通过刮漆再铸等手段，把足值货币变成不足值，以达到增加金币数量的目的。牛顿对造假者进行了严厉的惩罚，甚至亲自去刑场观看处决罪犯。他还创新性地在铸币的边缘设计一些锯齿状的花纹，以防止铸币被打磨，这种设计在此后的数百年都被沿用。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所处的窘境，除了人为破坏，白银总量不足也使货币的流通无法真正合理地运转起来。于是，牛顿只好重新开始铸造不足值的金币。最终，尽管实行了金本位改革，但真正的金币几乎很少流通，只是作为皇家的奖赏存在。

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是市场孕育的一个必要阶段，金银作为贵金属，除了作为交换的方便中介之外，还具有不断从流通中退出或者不断进入流通的性质，使得金属货币具有自发平稳市场的功能。在早期商业社会中，这种平稳机制是通过金属货币从金属本身到面值本身的不断转换而实现的。

继而，金属货币本身的稳定受到自然存储量和铸造能力的限制，全球贸易和市场的开拓将这个稳定提升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决定平稳的因素也陡然增多并且复杂起来。面值与铸币成本的差距使得铸币利益成为经济强国之间必争的因素。

再者，金属本位向非金属的汇兑本位的转换是最近百年的事情，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挑战。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国家信用等与政府相关，金融创新、网络支付、电子账户等与技术进步相关，消费信用、公益金融等与社会变化相关等。

500年前的货币本位化与百年以来的货币汇兑本位化，都是人类开发金融体系不断创新的产物，无论如何使其神秘化或阴谋化，其历史源头都是最基本的三个交易需求：需要一个便利交易的工具，需要一个稳定的计价标准，需要可以贮藏的财富形态。

在1717年的报告中，牛顿在实践中幡然醒悟，他认为白银短缺成为事实，即便将英国所有的银器用来造币也于事无补。与此同时，黄

金进口导致金价下跌，金银价差使得白银被熔化离开流通市场。分析在欧洲各国以及中国、日本、东印度的金银价格后，牛顿决定将黄金作为本位货币，并且不足值计算。因此，他将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便士。1774年，英国货币重铸便以这个标准实施，白银正式退出流通，黄金成为主要货币。1816年，英国重新调整英镑含金标准，正式明确金本位。由于英国在经济上的强势，欧洲各国纷纷实施金本位，英国这一霸主地位维持到了1914年。

尽管金本位制饱受争议，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均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才从实际上解体。两次大战期间，各国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但黄金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削弱，一些国家实行了金块本位或金汇兑本位，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进一步受到限制。当1929—1933年爆发经济危机时，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霸主。由于国际收支陷入困境，迫使英国在1931年终止了金本位制。

再回过头看中国银本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同一时期，政治强人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将中国带进了银本位，而科学怪人牛顿将错就错，确立了英国的金本位，并且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势地位将这一标准推行到了全世界。一个是一国之相，用政治强权确立货币制度；一个是知识分子，只是制定了金本位的一个比重，最终由市场交易接受和确立。

无论是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科学家牛顿，都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困境中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修补工作，无意中赶上了新时代的上升浪潮，成为弄潮儿。他们被摔得鼻青脸肿，却成就了银本位和金本位，也算是时代的幸运儿！采用银本位的中国和采用金本位的英国，终于在300年后相遇并导致了一个改变全球经济走向的冲突：中国坚持用银支付贸易费用，英国不得不用金来高价购银，而且怂恿商人用鸦片来弥补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当然，这是后话。



牛顿 科学巨匠牛顿在将错就错中确立的金本位，促进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第八章

犹太人与金融阴谋论

在人们无知与偏见的猜度之下，在神秘与辉煌的背后，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隐隐发颤的背影。

我在耶路撒冷圣地、罗马城台伯河畔、佛罗伦萨古桥以及今天的华尔街上探寻金融史迹，犹太人的精明和才干不时隐现，虽筚路蓝缕于初，终成今日全球金融诸多巨头。几乎所有重要的金融事件、机构和人物都与这个民族的艰难成长息息相关。不过，多数人会在高度认可犹太民族的金融智慧的同时，本能地认定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狡诈地操控货币、银行乃至整个资本市场，而且均是出于自私和获得暴利的动机。甚至一些严肃的金融史家都会将道听途说的逸闻作为作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犹太金融阴谋的故事。

几年前风靡一时的一本畅销书，更是将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推举为制造危机并控制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首要黑手，而其唯一的指控是：据估计，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60亿美元的财富，如果以6%的回报率计算，到15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家族资产至少在30万亿美元之上。这可是有点数典忘祖了，按照大清和珅家族在1799年已经积累的10亿两白银算起，以6%的回报率计算，多年前华人早已经统治世界了。

犹太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3000年建国历史中，大部分都是在流浪和被残害的行旅上。从亚述⁽¹⁾、巴比伦到罗马人，每个进攻者都会奴役犹太民族并试图根除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统治世界之后，千年之际的十字军东征、黑死病的罪名承担、15世纪的西欧驱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纳粹的种族灭绝等都是针对犹太人的杀戮。在这样严峻的生存环境下，犹太人居然能生生不息，甚至终于落叶归根地建立现代国家，这本身便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经典写照。

在几乎20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无法进入任何一个社会从事正当的职业并拥有财产和土地，更不能进入上流社会享受声名与地位。如果不皈依或同化于主流社会，犹太人就必须在特定的行业和领域中生存，而且要不断地迁徙。贸易、医疗和出版这些昔时无人眷顾的小生意成了各地犹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幸运的是，中世纪后，伴随

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货币兑换和融资交易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初级农业经济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体现在拥有的产品和不动产上。贸易是充满艰辛和风险的行业，也被视为仅仅用于调剂人类不同需求的奢侈性行业，在主流社会被歧视。而推动贸易的货币兑换和融资行为更被认为是不当获利的卑鄙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Usury（还本付息）在基督教教义中被严词谴责了上千年，从事此业的人死后不能上天堂。这个词汇被错误地翻译为中文的“高利贷”，同样在中国也赋予了其道德评价上的负面意义。

犹太人不得不从事贸易和货币行业，而且通过他们遍布全欧亚非的迁徙网络，将货币汇兑和融资交易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相对宽松的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地区，13—14世纪时，犹太人甚至有机会建立正规的商业银行连锁机构，他们创造了不同分工的银行，一类叫minuto bank，从事当地货币汇兑和珠宝抵押贷款，相当于中国的钱庄。另一类是grossi bank，从事国际贸易汇兑、解汇和给政府教堂等公共机构与商户提供长期贷款，类似于中国的票号。相对于分散经营的其他行业，控制这样的金融网络业态进一步固化了犹太人在捕捉商机、发现市场需求、对冲风险和获得暴利方面的地位。

1394年，基督教徒被禁止从事贷款业。迁徙到意大利的犹太人只能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几个限制地从事贷款业务。不过，到了1437年，佛罗伦萨给犹太人发了四张执照，允许他们在城内建立银行，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消息灵通而且合作精神极强的犹太人立即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可以代理这四家银行业务的分支机构和网络。特别是发明了汇票这个重要交易工具，使得佛罗伦萨迅速崛起，成为取代热那亚的现代银行中心。在当时金融豪门美第奇家族等的阴影下，犹太人的金融业务获得了长足发展。

好景不长，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种相关新教彼此竞争，开始进入商业市场，特别是金融界时，他们将犹太人列为公敌。一个最令人信

服也最为贫苦的基督徒们欢迎的故事便是犹太人通过金钱来洗劫人民，掏空教会和国家的财富。文学家和哲学家们推波助澜，编织了无数故事。小说家薄伽丘、诗人但丁、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等都有抨击犹太人的经典段子。影响最广泛的还数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居然要从借款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抵债。犹太人被从显赫的金融圈中驱赶到地下融资的层面，从事钻石珠宝和大宗贸易的结算。而金融家则低调地在权贵中钻营，以图获得政治庇护。

金融阴谋论从欧洲开始流传，主要针对犹太商人和金融家。其中最传神的是对著名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的描述。这个家族居然深谋远虑地扶植了罗马教皇，还培养了一批打入政府的亲信，从而长时间控制教廷财务和政府金库。特别在欧洲战争中，他们在5个欧洲国家建立分支来控制金融资源和国际借款。甚至在拿破仑战争中控制信息来实现巨额赢利，以致富可敌国。这个故事在几乎任何一本关于华尔街阴谋的书中都会出现，最早的版本却来自20世纪初德国纳粹的出版资料，旨在为没收犹太资产行动进行预热宣传。

金融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长篇巨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详尽描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如何从被隔离的犹太区中走出来，以纺织品生意起家，在100年内使这个家族称雄欧洲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故事。与3个世纪前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一样，他们观察市场，把握需求，果断行动，承担风险，小心翼翼地依靠教权和王权，不断创新金融技术，投资艺术和提高名望，建立广泛的社会资源。这不是阴谋，而是判断力和执行力，还有千载难逢的运气。

根据弗格森的介绍，在强烈的排犹情绪中，100多年前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社会主义者桑巴特和霍布森，纳粹领袖希特勒及其宣传机器都指控并编造了一大批阴谋故事，指认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了教皇，主导了滑铁卢战役，操纵了布尔战争，参与暗杀林肯总统，控制了欧美多个证券交易所，甚至参与建立了美联储系统。弗格

森讽刺道：“这些作家靠重新润色已经成文的神话以及逸闻就能够赚钱。”

自从1791年法国首先实施了解放犹太人运动后，英国、北欧和西欧诸国陆续改变了歧视犹太人的政策。但是民众中的敌意仍然长期存在，也就迎合了东欧、俄罗斯特别是德国始终蔓延的排犹浪潮，酝酿了二战时期的大屠杀悲剧。即便在美国这个开放的社会，金融阴谋论也始终围绕着犹太人演绎出来。每当金融危机之时，各种金融阴谋论便出台，抨击犹太人和金融界的各种书籍就会畅销一时。毕竟寻找一个可以在瞬间获得大多数人迎合的借口要比研究和思考来得便利、安全。

今天活跃在美国金融界的犹太人有对冲基金大王索罗斯、美国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两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彭博创始人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这样一个名单肯定会给金融阴谋论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使他们想到另一批犹太人控制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领域，如英特尔的葛洛夫、计算机巨头戴尔、甲骨文的埃里森、谷歌的佩奇、Facebook的扎克伯格。如果这两批人跨界合作，人类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局面呢？我们不免期待着新的畅销书问世，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这个市场的急切和躁动领先全球，只有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才能让人们拥有理性思考的基础。



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 发迹于19世纪初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金融史上重要的金融家族之一，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在21世纪的中国被妖魔化了。

金融是制度安排，也是生活态度。金融是伴随人类成长的朋友，不是瓦解生活的敌人。但是，金融业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妖魔化、阴谋化的对象，除了金融垄断而形成的居高临下的戾气外，还有对民间金融长期口诛笔伐、横加摧残的后果。正面的金融教育不见，阴谋论就有机会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出于种种计算，以讹传讹，导致大众对金融的理解需要从谬论入手，令人遗憾。以笔者浅见，金融阴谋论主要有这样几种来源：

第一，无知与恐惧。除了极少的创新者，人类天然地恐惧变化，回避风险，希望寻求安全的保障。原始社会中，人们因对风雨雷电的恐惧而形成早期的神灵崇拜。在吕底亚和希腊的时代，金银币也都铸上各种神灵和帝王的符号，希望获得保佑。人们表面上的敬重更是恐惧的结果。金钱崇拜在特定的环境下就转化为对金钱的摧毁，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为与世隔绝而将金银币销毁去使用铁币。法国人在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破产后，洗劫了所有银行机构并限制其发展几乎200年之久。次贷危机后，许多国家对金融衍生产品严格限制或取缔，对金融创新谈之色变。

在一个农业社会体系中，货币、支票、信用和钱庄等都是复杂的交易媒介和资源组织平台。人们难以理解何以有人承担风险提前预订了秋天的果实，何以货币可以买到闻所未闻的物品，支付教育和旅费，甚至提前享受到未来的生活。从事货币交易的人和机构都是神秘莫测的，一定是有目的、有计划，因而是有阴谋的。无知与恐惧下，人们自然要选择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是崇拜继而服从，或者是排斥继而敌视。

第二，偏见与懒惰。人类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对任何变化都会找到一个或一组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旦从大众中得到世俗的解释，又不愿意为难自己，努力学习，弄清逻辑，就容易继续从众来巩固偏见，寻求心理安全感。当偏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时，

维护偏见就成为一种义正词严的责任了，而且有自豪感。所以观念的变化是非常艰难的，没有这个变化，也无从启动制度改革。

把变化归咎于外部力量或他人的作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思维和态度的懒惰。即便已经意识到阴谋论是缺乏逻辑支持的，但建立新的逻辑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观念资源，大多数人没有需求动力和求知欲望来组织资源并架构逻辑，只能期待他人的思维创造来搭便车。更何况，阴谋论往往迎合大众趣味，有浪漫性。多年前，得知陈志武教授要写书批评阴谋论时，我曾称：爱因斯坦如何与跳大神的讨论道理呢？

第三，专制与迷信。前两个问题比较简单，在正常环境中通过开放信息和交流，便可以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逐渐解决，即便有相当多的人仍然敌视金融，也不会成为阻碍金融制度变革的困难。但是，在专制的环境下阴谋论有可能成为舆论主流，形成政府决策的社会压力。在一个简单的造反逻辑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之后，任何细致的思维耕耘演化，即便是为了支撑这个意识形态的提升，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思想者很快就被逆向淘汰出局。留下的都是巩固简单思维的，而且其生存的条件便是尽可能地延长与外界隔绝的时间。

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利用阴谋论来操控舆论，煽动民意。而在缺乏舆论开放的社会中，来自官方的扶植会形成一定气候。特别在中东某些国家中，所有新事务都成为西方势力的操控，甚至近年来，中国阴谋也成为西方政治家彼此博弈的筹码。

金融阴谋论不会被消除，但学习、思考和开放会大大提升公众金融素质，这也是金融制度变革和观念改革的基础。

(1) 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活动时间约有一千余年，大致可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三个时期。

第九章

英国光荣革命与税

商业因素让英国的光荣革命少了许多“革命”的元素，成了商人和国王的和平谈判。反观法国、俄国乃至中国式的革命，往往血流成河，代价惨痛。

201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文章很多。其中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讨论。300多年前的一次不流血宫廷政变将英国推上了宪政国家的道路，也使其进入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其后的工业革命将英国变成了世界霸主，而英国进一步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和国门，这就使得许多中国学者的理性分析和感情表达都有浓郁的英国情结。

一位中国学者在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中将清朝最后皇帝的退位诏书定位为相当于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有些言重，但也道出历经百年暴力革命摧残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反思和期待。须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很不光彩的阶级妥协，没有通过暴力革命获得的政权都是不彻底的，也是缺乏革命灵魂的。前苏联和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对“光荣革命”的评价都不高，故而，当下的反思也多从宪政的角度来考察，说明英国革命远比暴力流血的法国大革命来得成功和符合现代性。

不同的专业立场对“光荣革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相映成趣。大众的版本多是集中于借助宗教力量的权力之争，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上台后大肆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迫害清教徒，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结盟。而以清教徒为主体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集团则扶植不信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和她丈夫荷兰执政王威廉联合执政。1688年，威廉夫妇带领军队逼迫詹姆斯二世下野并将其流亡法国，之后夫妇两人联合统治英国，宣布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国王，国王也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这种血亲为仇、宫廷政变、国教改宗的故事一直是文学剧本的焦点。

政治家和法律学者则再上溯400年历史，在英格兰贵族的劫持与胁迫下，英国国王约翰不得不在1215年订立了《大宪章》（Magna Carta），这是封建贵族与王室的政治权利契约。而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三十九条，由它衍生了人身保护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

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以法律规则高于国王个人意志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国王在以后几百年中不断扩大权力，但这一条始终没有变化。“光荣革命”后，新国王不得不与支持他们上台的英国资产阶级代表的议会签署了《权利法案》。这是英国政治性法律中重要的一部法案，由威廉三世于1689年签署。

《权利法案》规定了英国人民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民事与政治权利，包括：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佩带武器用于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人民有不遭受残酷与非常惩罚的自由；人民有在未审判的情况下不被课罚金的自由等等。直到今天，地球上许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这样一些基本的权利。相对于几百年来全球各地的血腥暴力与革命，英国人民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却是不流血的政变产物，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光荣所在。

宗教版本直指人心信仰，不过宗教无法避免甚至鼓励杀戮，却是历史事实，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何以光荣。法律和宪政版本则是巩固了“光荣革命”的结果和将其制度化。相对于以后的法国、美国等制度改变都经历了战争与暴力而言，英国“光荣革命”还需要更多解释。托克维尔等学者在此后的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英国人的性格和理性能力等都带进了分析要素。不过，他这样做是基于要批评法国知识分子的浪漫激情和暴力倾向。



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 这是亲历“光荣革命”的两位英国国王，也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后的两位国王。

多年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则从经济制度和金融能力的角度专门著述，分析了英国“光荣革命”背后的商业背景。与中国的一统江山不同，中世纪的欧洲是教权和王权博弈的时代，各国国王都在有限的疆土上不断扩大王权的经济力量，增税、贷款、卖爵位、印币和征用便是扩大王权也是政府权力的主要渠道。不过，王室的权力还是被教权支持下的新贵族领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势力所制约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看光荣革命的背景和经过，包括《权利法案》的出台，就有另外一番启发。

在13世纪以前，英国的多数土地控制在私人 and 教会手里，王室只拥有较少土地。在1436年，英王室只拥有3%的土地，而私人拥有约45%的土地（多数由贵族和绅士拥有），教会拥有其他20%~25%的土地。王室也没有权力随意决定在别人的土地上收税。1215年，封建贵族给国王施压，颁布了《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一些英国贵族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亦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同时改革了法律和司法，限制了国王及王室官员的行为。最初的《大宪章》有六十三条条款，当中大部分是针对13世纪当时的状况而定，例如限制王室狩猎范围等，而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三十九条，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由它衍生了人身保护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根据这个条文的规定，国王若要审判任何一个人，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以他的私人喜好来进行，王权因而受到了限制。实际上，《大宪章》是在明文规定王室必须承认并保护私有土地产权。这是对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基础。有人形容为：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对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的处理，都比法国对那些最可尊敬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法国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郑重得多。

尽管有了《大宪章》的约束，但一些英国国王不断背信弃义地扩张王权，试探议会和新贵族的底线。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政府在财政、税收和贷款等问题上，就经常与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发生矛盾。由于战争和奢侈等原因，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一直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英国常常出现违背《大宪章》精神的现象，国王单方面发号施令，没有经过议会批准就对公民强行征税。同时，王室还用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斯图亚特王朝采用了以威逼利诱为主要方式来获得贷款的办法，强行向新贵族借款，不仅如此，国王还经常违背契约，不按照规定时间还款甚至故意拖欠抵赖。通过1604—1605两年间的强行借款，国王1年就借到了111891英镑。这些钱尽管最后都偿还了，但其中20363英镑是到1609年12月才还清的。1617年的强行借款直到1628年才得以偿还，从1611—1625年，国王一直通过相同的办法来借款，逐渐这种借款开始成为惯例，形同税收。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们还通过出售垄断权的方式增加收入。国王以一种新的方式利用了专利权。专利权原本是用来保护并促进新科技发明的，但在当时却被用来“阻止现有产业披着技术进步的外衣进行垄断”。垄断权一般都会出售给从事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者，即那些新兴的地主和贵族，他们更多时候有拥有专利权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国王为了收入，已经干涉到了他们最基本的经济活动。

1640年，国家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没收了商人出于安全考虑储存在伦敦塔里的金条，这不但导致了很多商人破产，而且完全触及了他们的底线。传统封建主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议会与国王权力之间的矛盾开始积聚。在此期间，国王还曾多次解散议会，架空普通法庭，成立了皇室法庭，这种法庭可以撇开议会的立法权而动用专权立法。皇室法庭全部由国王的亲信构成，集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于一身。



玛丽与威廉三世听取《权利法案》 国王具有崇高的权力，而议会则代表了国家和法律的权利，所以才有了大臣跪着向国王宣读约束王权的《权利法案》。

17世纪中后期，英国与荷兰关系紧张，为了得到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应付战争，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成功游说议会，于1662年立法开征“灶税”，规定凡是房屋中有灶者，都得缴税2个先令，不管有多少人用一个灶吃饭，也不管居住面积有多大，只要有灶就必须纳税。根据统计，当时英国政府一年有200万英镑灶税进账，本质上，这是带有人头税性质的财产税。1683—1684年，查理二世直接控制了对炉灶税和货物税的征收，使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到1684—1685年间，已经达到137万多英镑。对于新兴阶级来说，这种“漫天要价”显然是不能够接受的。

到了詹姆斯二世执政之时，国王已经近乎为所欲为了。詹姆斯二世为了应付战争，不断增设新的税种，提高税率，完全绕开议会推进，导致议会怨声载道。同时，不断通过买卖官职来制造寻租⁽¹⁾的机会，造就了只对国王负责的官僚体系，大大削弱了议会对国王和政府的监督能力。

更有甚者，国王不断透支自己的王室信誉，为战争筹款而不断发行政府债券，向富裕阶层借款。这些债券经常违约甚至无限期拖欠，事实上形成了对贵族的财产剥夺。王室使得政府的信用崩溃，也使得民间融资空间萎缩，不仅政府融资能力消失，民间经济和新贵族发展的空间也没有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怨声载道，整体转为詹姆斯二世的敌对势力，造就了英国革命的商业基础。

“光荣革命”后，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行征税，大大制约了国王的权力，形成了稳定的谈判机制。这种不断谈判和议价过程提升了人民预期的稳定和经济运行的透明度，也降低了灰色成本。反过来，经济能力的提高事实上大大增加了纳税能力，巩固了国王合理的经济实力。同时，议会的制约也使得国王的贷款被限制在合理的利率和返还承诺上，从而公债市场发展起来了，英格兰银行的业务也发展起来了，英国金融制度得到了完善和保障。

“光荣革命”确立的宪政制度，保证了政府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政府从此能够以低利率大举借债，获得史无前例的财政资源。19

世纪初，首相小皮特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都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债务很少超过200万英镑。而到了百年之后的1790年，英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2.44亿英镑，相当于当年岁入的15倍。坚实的财政基础令英国在与法国的争霸战争中获胜并迅速崛起。

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的辛亥革命百年。笔者并不打算在辛亥革命和“光荣革命”，孰是孰非间做一个判断，只是希望提出一个思考，“光荣革命”背后的商业因素，让其形成了一个可以议价的空间，这意味着议价双方只要能够达成协议，就不会发生矛盾，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取得商讨税收的权利，国王最终妥协，革命也宣告成功，这在西方革命中并不罕见。反观东方式革命，出发点往往是民族与民主，这意味着，只有一方从根本上被消灭，才能最终实现妥协，没有更多弹性的空间。从这一点出发，英国、日本式的渐进革命，与俄国、法国，乃至中国式的革命，确有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1) 寻租：企业等寻求经济收益，如利润最大化机会，或政府寻求政治收益，如政治局势稳定、政治关系牢固最大化机会的行为或过程。

第十章

高利贷与现代金融的起源

在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挤压之下，高利贷者顽强地发展出现代金融，为工业革命提供润滑剂。如今高利贷已经远去，道德的诅咒依然如影随形。

高利贷是金融业始终摆脱不开的道德符号，文学和情感的渲染永远比价值分析和事实判断更拥有人心。事实上，高利贷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多高利息才符合正常的标准，而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或因时而异的主观判断。显然，一旦用了高利贷这个词汇，无论事实如何，道德谴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历史上很少有人对高利贷正面评价，尽管它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而生生不息的现象。

高利贷的英文是Usury。这个词汇内涵是有变化的，在欧洲中世纪之前，它是指一切基于贷款的利息和付息行为，在15世纪之后，一般指高于市场利息的额外利息。在今天的市场上，高利贷是指贪婪和欺骗行为。

在古代的农耕时代，由于生产周期和环境变化等原因，农民和村落之间彼此接济、互相贷款是经常的交易行为，支付一定利息也是民间商议的结果。尽管有道德评价和纠纷时官府介入，但至少在百年前的中国，高利贷并不是法律和政治问题。不过，欧洲社会则有不同的历程。

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是接受利息概念的，犹太人则禁止族内交易中支付利息。在罗马时代，商业经济和市场交易已经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政府与民众之间、军人之间、国际交往之间，借钱要付利息天经地义，根据记载，年利率一般在4%~12%左右。

随着基督教教义的普及，旧约和新约都明确表明了对支付利息的厌恶。传统教义认为，任何成果必须出于劳作，不劳而获是罪恶的。有钱人通过贷款收取利息是基于贪婪、欺骗和操控，是不道德的。当时的学者名流如柏拉图、西塞罗、亚里士多德等都专门写文章谴责高利贷行为。同样，主导东方宗教的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也反对高利贷。

325年，罗马教皇正式颁布法律禁止教徒使用高利贷，明确任何高于1%的贷款都是高利贷，这条禁令后来被推广到平民。1179年，天主教会不允许为高利贷者安排宗教葬礼。克莱门特教皇在1311年公开谴

责高利贷并要求法律禁止它。意大利诗人但丁在著名的《神曲》中也出言尖刻地挖苦高利贷人：“脖子上挂着钱袋子，装饰着五颜六色的挂件，满眼都是饥饿。”

在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打击下，只有到处被排斥的犹太人才进入了这个领域。他们迁徙流浪，不能从事农耕或制造等这些被认为可以拥有稳定财产而且与上帝距离最近的行业。犹太人只能从事受托收税和放贷这些“不道德”的营生。事实上，当时所有的高利贷形象和人物都是与犹太人相联系的。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也描写了一个贪婪的犹太商人从事高利贷的故事。在诚实的安东尼奥无法还款时，不得不按约定给犹太人夏洛克割下自己身上的一磅肉，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还调动着大众对高利贷商人和犹太人的双重仇恨。

13世纪时，东方宗教兴起，基督教也开始走下坡路。意大利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对于混沌初生的贸易市场有更多切身感触，在自己后来广为流传的神学著作中曾对高利贷加以分析。他指出，如果出现坏账，贷款人应当得到利息的补偿，适当收取利息是合法的。后来，许多学者也将银行家与高利贷者区分开来，认为为发展经济而收取利息是银行的本分。这些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给从事收息的贷款人以道德安慰和世俗支持。

其实，高利贷从来没有被真正抑制过，这就是整个中世纪的1000年里，不断有教皇反复颁布禁令的缘故。不仅犹太人，基督徒们也制造了各种不同的信贷工具，通过其他费用和服务来收取利息。最普遍的是将一份合同分为两份，以其他不存在的服务来收息，也就是阴阳合同的起源。



但丁《神曲》中的地狱 《神曲》中有一部分专门描写高利贷者，但丁把他们放在了第七层地狱：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每个钱袋都有某种颜色和某种花纹，他们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钱袋一味地看个不停。

1394年基督教徒被禁止从事贷款业。迁徙到意大利的犹太人只能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几个限制地从事贷款业务。不过，到了1437年，佛罗伦萨给犹太人发了四张执照，允许他们在城内建立银行，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消息灵通而且合作精神极强的犹太人立即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可以代理这四家银行业务的分支机构和网络。特别是汇票这个重要交易工具的发明，使得佛罗伦萨迅速崛起成为取代热那亚的现代银行中心。

犹太人生意发达又导致基督徒们的仿效，加上宗教改革的兴起，中世纪对高利贷的禁令名存实亡。美第奇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真正的发起者，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共同将佛罗伦萨打造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其实这个文艺复兴的通译并不准确，它包括了文化、宗教、法律和商业在复兴名义下的全面变革。高利贷等金融观念也经过彻底洗礼，从道德约束变成了日后欧洲工业革命的润滑剂。

需要提及的是，犹太人在金融上的成功也导致了其他族群的嫉恨。在美第奇家族没落后，从事高利贷的犹太人被要求胸前佩黄环带标志，除非给予特殊的好处。这样的环境迫使犹太人渐渐淡出意大利的金融界。二战时，希特勒政权重新采用了这套歧视措施，几乎导致了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悲剧。

有意思的是，1642年，教会为了与高利贷者抗衡，还特别设计了当铺，允许消费者和生产者用商品和土地抵押获得贷款，仅仅支付成本性利息，与今天孟加拉国的亚努斯银行相似。教会的干预和世俗的抵制始终没有消灭高利贷的经营。在越来越多的现代银行建立之后，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创新之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解金融并学会了选择和讨价还价之后，高利贷产业渐行渐远，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就演变成为道德词汇了。

第十一章

所谓三大金融泡沫事件的真相

三大金融泡沫事件，并非人云亦云的少数骗子做局、大众跟风的泡沫事件，而是政府操纵的利用垄断和权力对民众进行的赤裸裸的掠夺。

每遇金融危机，传媒界就喜欢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三次金融泡沫事件来教育公众：荷兰的郁金香炒作、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三大事件在教科书和传媒中都被归结为少数骗子做局，政府监管不力，大众疯狂跟进，结果人财两空，经济遭到破坏而造成金融与社会的悲剧。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得出加强政府监管，严防死守地打击任何不规范的金融行为的所谓历史经验来。不过，这三大泡沫事件已经被宣传了近百年，却并没有避免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悲剧重演。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认真重温一下历史。

1635—1637年间的郁金香泡沫事件，发生在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当时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早年间，土耳其人从天山山脉将郁金香花种带入君士坦丁堡，使郁金香进入宫廷，成为东方时尚。后来的德国植物学家进行人工栽培，发现病毒突变会导致郁金香球根有美丽的变种。这些变种的郁金香投入市场，大受欢迎。

到17世纪初期，郁金香中的一些珍品已经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富人们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植物爱好者和商业新贵们以培育不同变种花朵为荣。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观赏，而是希望牟取暴利。

很快，一些投机商就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以待价格上涨。在舆论的宣传之下，普通民众也开始对郁金香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倾慕与热忱，竞相抢购郁金香球茎。到1634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荷兰的全民运动。

为了方便郁金香交易，1636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内专门为郁金香开设了固定的交易市场。当时一名历史学家描述：“谁都相信，郁金香热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会向荷兰发出订单，无论什么样的价格都会有人付账。在受到如此恩惠的荷兰，贫

困将会一去不复返。无论是贵族、市民、农民，还是工匠、船夫、随从、伙计，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都加入了郁金香的投机。无论处在哪个阶层，人们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投资于这种花卉。”

“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2吨奶油、1000磅乳酪、一个银质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这样的市场显然无法长久维持。

郁金香花的培育速度很慢，需要六七年，无法跟进市场需求的变化。这就给期货交易开辟了空间。大家都在酒店大堂进行交易，买卖单据都通过背书而流通，无法明确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在投机者的操控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交易，哄抬价格。许多郁金香品种可以在一年内价格上升百倍，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当价格哄抬到击鼓传花结束时，危机便悄然来到了。

1637年2月4日，卖方突然大量抛售郁金香，公众开始陷入恐慌，郁金香市场一夜之间崩溃。虽然荷兰政府发出紧急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一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已平均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的品种甚至卖不到一颗洋葱的价钱。绝望之中，人们纷纷拥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挽回损失。但在16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这次事件不了了之。郁金香泡沫对当时荷兰的经济影响不大，只是后来崇尚节俭生活的加尔文主义兴起，教士们喜欢用郁金香事件抨击人性的贪婪。200年后，才有畅销书将这个事件列入史册。

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则是由著名的金融家约翰·劳一手造成的。约翰·劳（1671—1729）是苏格兰经济学家，父亲是银行家，拥有大量地产。劳14岁就跟着家族从事金融业务，父亲去世后，他去伦

敦冒险，在赌博中损失巨大，后来，劳在为女人的决斗中打死对手，被对方家族纠缠，不得不跑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客居避祸。

劳一直主张建立国家银行，用金银、土地抵押发行货币，国家垄断资源，用国有公司的经营利润支付外债。尽管他一再上书，但苏格兰政府不接受这个建议，劳便穿梭于法国和荷兰之间，一边从事金融投机交易，一边结交上层社会等待时机。

法国路易十四去世后，国库空虚，情急之下，法国摄政王腓力二世邀请劳担任法国财政大臣。这是1716年5月的一天，约翰·劳在法国成立了一家银行，名字叫作“通用银行”。这家银行除了像荷兰银行那样开展储蓄与贷款业务之外，还有一项独特的功能，那就是发行货币。

从这一天起，由约翰·劳本人亲自坐镇的法国货币革命在一片喜悦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货币制度改革，法国的货币体制在约翰·劳的改革下，从贵金属货币时代瞬间过渡到了纸币时代，政府规定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整个国家开始流通以“里弗尔”为单位的纸币。

几年后，当约翰·劳的通用银行给政府带来了大量利益，法国政府当仁不让地吞并了它，但仍聘约翰·劳为银行管理人，这让约翰·劳感到了鸟尽弓藏的悲哀，他不甘心就此结束，于是他将大量精力投放在了他一年前成立的那家公司身上，即“密西西比公司”。

法国政府在这家公司成立之初，便给予了其许多特权，允许其对许多种类和地域的贸易进行垄断。而这一年，法国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安慰约翰·劳，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决定将东印度一带的贸易交一部分给密西西比公司打理，使这家公司有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期。约翰·劳取得贸易上的特权之后，以密西西比公司的名义发行了大量股票，这其中有替政府解决庞大债务问题的动机，也有他为自己谋求私利的想法。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不同的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交易模式，那就是国债债券可以用来直接购买公司的等值股票，而当时500里弗尔的国债债券在市场上只能兑换到大约150里弗尔，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却由于其在贸易上的不断扩张而在不停地升值，这个时候，几乎所有持有国债债券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交易所，将自己的债券兑换成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然后如释重负地坐等股价上涨。

由于市场上的买气越来越旺，股票价格一时间水涨船高，渐渐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投机游戏，玩法如下：

A君以150里弗尔的价格从相对偏远、信息闭塞的地区购买到500里弗尔的国债债券，然后去交易所将它兑换成价值500里弗尔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再将股票卖掉，即使股票没有上涨，A君也能够从中得利350里弗尔。

这种投机行为在法国迅速弥漫，过了没多久，全法国的人都知道国债债券可以用来买一种股票，而这种股票可以升值并兑现，于是国债投机戛然而止，民间持有的国债数量大幅缩减，密西西比公司则成为了法国国内最大的债权人，而密西西比公司的掌门人是约翰·劳，他同时又是法国皇家银行的管理人，掌握着货币发行的大权。虽然此时看似整件事情做得非常巧妙，但事实上这驾马车离悬崖只有咫尺之遥。

在各方的炒作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市值不断上升，而约翰·劳为了满足市场，亦不断增发新股。往复循环之下，使公司股票最终上升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每股价格达到了9000里弗尔。这时候，约翰·劳为了再次推动股价上涨，居然决定增发货币，这件事情让约翰·劳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他做出任了可决定，结果都不会改变。因为对于这种泡沫问题，时至今日也无任何人能够找出得救之道。



约翰·劳 如果不是因为密西西比泡沫，他作为货币学者的荣耀将被人们所铭记。

毫无悬念的，泡沫破灭了，境况同近一个世纪前的荷兰没有太大分别，同样是哀鸿遍野，所到之处阴风惨惨，交易所挂牌歇业。不同的是连银行也被强行关闭了，又是一次从天堂到地狱的瞬间坠落。这种感觉大概就像是蹦极的人被弹到最高点的那一刻，突然发现绳子断了。

与郁金香事件有所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交易市场大崩盘，更是一次货币体系大崩溃。法国的股票市值从1719年5月开始持续暴涨，到了1720年的5月，涨幅与13个月前相比约高达20倍，同月开始下跌，持续狂跌13个月，最终股价只有大约13个月前的5%。不得不说如果将它画出来，将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二次函数，这种极其对称的抛物线式的起落在金融史上还是第一次，且于日后亦不多见。

密西西比泡沫破灭后，劳一时成为公敌，不得不化装成女人逃到布鲁塞尔。后来他在欧洲各地赌博为生，最终穷困潦倒死在威尼斯。

与之类似的南海公司泡沫则是基于英国政府的国策制造出来的。与法国处于同样的困境，英国政府无力承担西班牙王位继承引起的战争导致的巨额借款，于是采用了国家垄断经营来支付政府债务的方式。英国财政大臣哈利建立了南海公司，垄断了南美洲和太平洋群岛的贸易和商业经营。

南海公司仿效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模式，发行巨额的南海公司股票收购政府国债。他们认为这样做一来政府可降低利息支出，二来公司可用注水股票换取收入稳定的国债。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相继担任南海公司的总裁。事实上，南海公司基本没有多少业务，只有几艘船而已。公众投资和追捧这个公司主要是基于它的垄断经营权、政府信用和对未来的预期。政府官员和内部关联人彼此交易股票也大大刺激了股价的飙升。

在南海公司股票의诱惑下，全英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都成了投机对象。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军人和家庭妇女，甚至物理学家牛顿都卷入了旋涡。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在乎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只相信发起人说他们的公司如何能获取巨大利润，股票价格平均涨幅超过5倍。大科学家牛顿在事后不得不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1720年，南海公司的股票从128英镑升到1000英镑。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模仿南海概念的各种公司，一些不法商人和骗子公司乘机浑水摸鱼。1720年6月，为了制止各类“泡沫公司”的膨胀，始作俑者英国政府通过了《泡沫法案》，许多公司被解散，公众开始清醒过来，对一些公司的怀疑也逐渐扩展到南海公司身上。从7月份开始，首先是外国投资者抛售南海股票，国内投资者纷纷跟进，南海股价很快一落千丈，9月份跌至每股175英镑，12月份跌到124英镑。南海泡沫破灭后，国王不得不取消度假，回国主政。国会建立调查委员会，抓捕了财政大臣等几十个高官，没收资产，对股东进行偿还。

今天看来，所谓的三大泡沫事件中，郁金香只是一个商品品种的炒作，在影响力上远远不及其他二者，只是道德说教的案例，将其提升到金融层面实在风马牛不相及，此类事件以后也层出不穷。当代中国也有君子兰炒作和蚂蚁以及树苗炒作等类似事件。

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是政府直接操盘的运作，应该是一种超越环境的粗糙的金融创新，是初步理解了货币实质和市场交易机制后的政府债务重组安排。特别是约翰·劳，更是早期凯恩斯主义者，通过政府经营来刺激需求。不过这些救急措施在国王和贵族的贪婪与垄断权力操作下成为了掠夺民众的手段。因此，这不是骗子做局、大众跟风的泡沫事件，而是政府操控的利用垄断和权力进行的赤裸裸掠夺。

泡沫事件导致了公众对金融制度的审视和对透明监管的关注，特别是英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和追究行为，惩罚了贪官污吏，尽力补偿股东的损失，立法要求建立第三方审核制度。这是泡沫事件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的跟进，政府的权力不能被制约，自由市场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反思历史，我们更应该关注对政府权力的监控。正确理解三个泡沫事件的真实意义，才能帮助我们吸取教训，调整监管方向，而不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地将所谓泡沫事件天然地与骗子和大众疯狂联系起来，忽略了真正的始作俑者。

第十二章

奴隶贸易与金钱

罪恶的奴隶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基础。

奴隶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群体的一个自然产物，今天仍然在世界许多国家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古代社会中，奴隶多由在战争和劫掠中丧失基本人身自由的人构成，他们不计报酬和生死地为控制人劳作。这些控制人并非都是豪强恶霸，很多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平民。在希腊社会中，奴隶被视为正常的社会阶层，根据拥有者的吩咐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家务劳动，可以有自由的交际活动，只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奴隶可以在市场上被交易，也可以被解除奴隶身份。

当梭伦⁽¹⁾建立起雅典民主制基础的时候，奴隶制非常普遍。古希腊人分为不同的阶层：自由公民、奴隶、农奴、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重获自由的奴隶等。一个无力支付债务的平民也会成为其债主的奴隶，在完成约定后恢复平民身份。我们曾习惯于将存在广泛的奴隶劳动的社会定义为“奴隶社会”，甚至将其规定为人类进化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看，这其实只是一种批判情绪的表达，人为地将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简化为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

奴隶制度曾广泛地存在于地球各个角落，更多是农耕社会和游牧族群早期发展阶段的现象。在商业市场成熟、人们发现交易可以取代战争和掠夺给社会提供更多价值，而且也建立了基本的契约和法律保障后，奴隶制度便开始急剧衰落。不过，在本国或本民族内被视为一种恶行的制度，并不妨碍在国际贸易中转移到别国。正是由于这种“易子而食”现象的存在，奴隶贸易一直延续到近代。

最早的跨国奴隶贸易出现在中世纪之前。非洲黑人经撒哈拉商道、尼罗河及印度洋被阿拉伯人贩卖到南欧、阿拉伯世界以及波斯甚至南亚等地。奴隶并不仅限于黑人，也有白人被卖为奴。花刺子模帝国⁽²⁾时代，白种的俄罗斯人是奴隶贸易者的最爱。至少在100年前，许多中国人被卖到美国从事艰苦的淘金、筑路和开矿劳动，被称为“华工”、“猪仔”等，也被看作奴隶贸易的一部分。

1492年，在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人纷纷到美洲发掘财富，圈占领土，经营殖民地。他们种植烟草和棉花，开发金银矿等。最初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的多数是白人契约工，契约到期后，便成为自由人。欧洲殖民者曾试图奴役美洲本土印第安人为奴，效果不佳，便到非洲购买并抢掠黑人。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这些地区的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绑架等手段贩往美洲大陆。从15世纪以来的400年奴隶贸易中，保守估计约有1200万黑人被强制迁徙到美洲大陆。

18世纪晚期，欧洲大陆出现的启蒙运动将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等的观念传播开来，废奴运动开始兴起。英国1772年率先在本土废除奴隶制，法国在1774年开始实行相关政策并陆续推广到海外的殖民地，整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体系1838年实行废奴，美国则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年实现了奴隶解放。

有学者将以上奴隶贸易的过程详尽归纳为三个阶段：



奴隶贩子殴打奴隶 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度的核心还在于剥夺人的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和生存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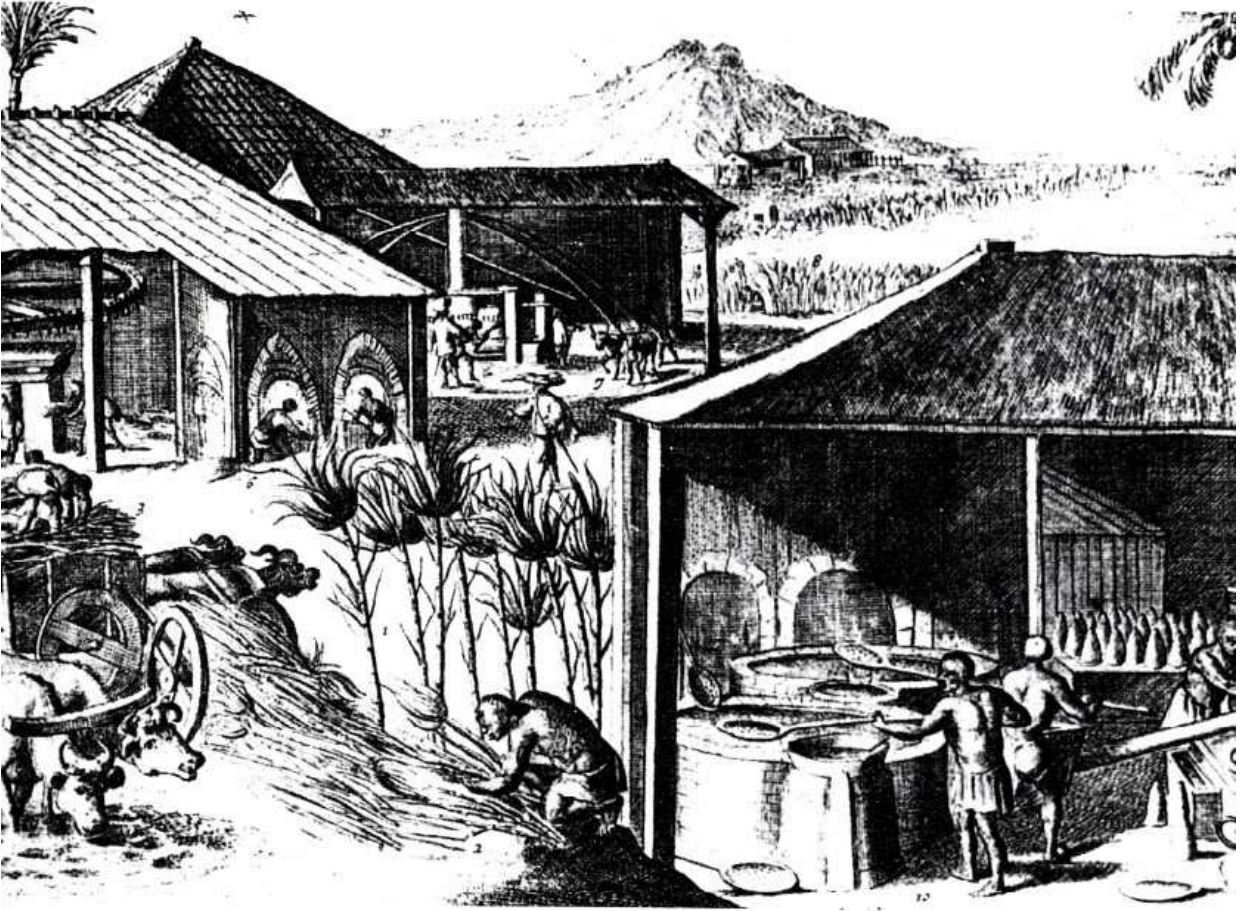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15世纪中期—17世纪中期。这一阶段的贸易主要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垄断。15世纪中叶，葡萄牙航海家亨利鼓励海员沿非洲西海岸由北往南航行，以探索通往东方的海路，并寻找黄金和香料产地。1441年，葡萄牙人A. 贡萨尔维斯率领一艘船沿非洲西海岸向南绕过布朗角上岸，从那里带了10个黑人回到欧洲。从此，葡萄牙经常派出一些船只去西非海岸进行掳掠。1482年，他们在加纳的埃尔米纳城建立了最早的奴隶贸易据点。不久，又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进行殖民开发，建立和扩展甘蔗种植园。当时他们掳走的黑人不多，大约有1000人。进入16世纪，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在征服新大陆期间，杀害了大批印第安人，因此迫切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来开发殖民地，于是公开鼓励从非洲输入奴隶。1510年，最早一批非洲黑人被带到西印度群岛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人数在250名左右。从此，贩卖黑奴的规模越来越大。16世纪中叶，非洲西海岸每年输出奴隶达10000人。葡萄牙人也像西班牙人一样，不断贩运非洲黑奴到巴西。16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在海上称霸的时代，奴隶贸易为他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因此欧洲其他国家也跃跃欲试，英国、荷兰和法国力图打破西班牙、葡萄牙的垄断。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歼灭。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优势一落千丈，荷兰乘机取而代之。荷兰从16世纪以来一直是葡萄牙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最大中间商，被称为“海上马车夫”。16世纪末，荷兰夺取了葡萄牙在非洲的重要贸易据点和军事要地，紧接着，又成立了荷属几内亚公司、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等，夺取了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垄断权。到17世纪中叶，荷兰几乎垄断了海上的奴隶贸易。

第二阶段：17世纪中叶—18世纪下半叶。这个阶段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高潮时期，奴隶贸易体系逐渐形成。此时奴隶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赚钱最多的行业，奴隶成为非洲可供输出的“单一作物”，奴隶贸易成为非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唯一贸易活动。参加奴隶贩运的国家，除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外，还有英国、

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以及美国、巴西等。他们不仅在西非海岸，还在非洲内地和东非海岸大量猎捕黑奴。到18世纪80年代中叶，从非洲输出的黑人奴隶平均每年近10万人。

第三阶段：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下半叶。这个阶段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衰落，尤其是1807年英美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走私奴隶贸易时期。18世纪末，欧洲废奴运动蓬勃兴起，英国于1807年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但是，暴利不可能让疯狂的贩奴者罢手，走私贸易随之猖獗起来。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成为主要贩卖黑奴的国家。在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经营的奴隶贸易，此时也异常活跃起来。贸易中心主要在桑给巴尔⁽³⁾和奔巴岛⁽⁴⁾一带，大批非洲黑人从那里被贩卖到红海、波斯湾沿海国家，并长途贩运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与此同时，葡萄牙、荷兰、法国和美国等国的奴隶贩子，也到东海岸进行贩卖非洲黑人的勾当。19世纪50年代，非洲每年向古巴、巴西等地输出的奴隶达5万人以上。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势头基本被刹住，但并没有最后绝迹，零星的贩卖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初。

奴隶制度的废止无疑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检点奴隶制在历史上的作用，会发现不少新的角度和观点。至少从奴隶贸易对早期全球化的推动上，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点：



黑奴在巴西、西班牙人的种植园里制造蔗糖 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黑奴，用自己的血汗为种植园主赚取巨额利润。他们的坎坷命运链接了全球航运、造船、金银等多个产业链的跨国延伸和大发展。

首先，据维基百科描述，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航线，其形状呈三角形。

贩奴船满载着枪支弹药和廉价消费品，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仅需一次便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1000%的利润。尽管建立在罪恶的摧残人权的奴隶贸易基础上，但三角贸易刺激了消费品、航运、保险、军火、金银、造船等多个产业链的跨国延伸和交易，也将技术和消费方式传递到全球各个角落。

其次，整个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相当于1800年的非洲人口总数。

通过奴隶贸易，美洲大陆由于人口的输入得到了高速成长的机会，金银矿和种植业得到全球市场的支持，长期发展了300多年，获得了坚实的财富基础和市场制度基础，使其在奴隶贸易废止后，成为近百年来全球优秀人群移民的首选之地，特别是美国和北美地区。

当然，对非洲来说，奴隶贸易带来的影响恰恰相反，这也是目前美洲大陆对奴隶贸易的反思远远不及非洲大陆愤怒的原因。有研究显示，奴隶贸易决定了非洲经济畸形发展的趋势，影响至今。早先，因为奴隶贸易而发财的酋长、头人及部落贵族开始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因而，他们竭力想获得更多的武器与商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并因此更加扩大奴隶贸易，加强同欧洲人的贸易关系。当时，权力已逐步地集中到了奴隶贩子的手中，所以非洲人的生活已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奴隶贸易的需要，通过奴隶贸易被动地卷入国际市场，只有这样，非洲人才可获得必要的商品。进一步的影响是，在大型奴隶买卖转运地区，人们抛弃了传统的手工业与农业，积极投入奴隶贸易，因此，非洲农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阻碍。很多手工业工艺，如织布工艺、编织工艺、珠宝首饰工艺等都相继失传，或者质量大为下降。

当然，通过奴隶贸易，非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发展了起来，奴隶输出经济逐渐向殖民地经济转化，并奠定了殖民地经济的基础。英国学者费奇认为，奴隶贸易对非洲带来的收益不仅如此，他列举了西非富国卡诺。该国国内收入每年仅2万英镑，却因输出奴隶每年收入1.3万英镑，欧洲人为换取奴隶，给西非商人提供了许多货物，如纺织品、武器、火药、子弹等。

再次，奴隶贸易给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孕育和发展，加快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不仅如此，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独立也与奴隶贸易带给北美特别是南部种植业的财富积累密切相关。廉价劳动力大大弥补了资源开发和工业革命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原始推动力。

有英国学者认为，奴隶贸易是欧美国家殖民工业与殖民商业的基础，支配着西欧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奴隶贸易使大量劳动力投入殖民地去生产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料，这样就产生了同样为工业所必需的世界贸易。商业活动又使商业资本的积累不断加大，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基本条件。加上奴隶贸易本身所获取的利润，推动了欧美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以西印度群岛为例，它是英帝国的殖民地中心和主要经济来源地。奴隶贸易与世界贸易又使许多大城市发展起来。英国的利物浦、伦敦，法国的南特等，几乎西欧每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都与奴隶贸易有关。奴隶贸易使西欧、北美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在拉美，黑人开发了矿山，发展了庄园经济与种植园经济。欧洲的资本、非洲的劳动力、拉美的土地三种因素的结合发展了拉美，使拉美成为欧洲当时主要的海外经济利益所在。同样，在北美，奴隶贸易奠定了美国的财政基础，奴隶制使南方得以开发，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北方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就连马克思也认为：若没有黑人直接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就会看到一片无政府状态，以及现代贸易与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

最后，翻检了许多有关奴隶贸易的资料，除了在早期三角贸易过程中用暴力和劫掠手段从非洲迁徙千万黑奴去美洲之外，后期的人力贸易还是有自愿协议和一定报酬作为补偿的。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那些报酬非常低廉，无法与其历史贡献相匹配，例如中国华工对美国铁路和矿山开发的贡献，不过将这些廉价劳工贸易都纳入奴隶贸易的范围恐怕并不确切。如此类推，欧洲早期的圈地运动，现在仍时有发生“血汗工厂”等也同理。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核心还在于剥夺人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和生存权。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12年6月18日全票通过对130年前颁行《排华法案》这一事件进行道歉。这一法案正是由于横贯北美的太平洋铁路建成后，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中试图驱赶大批来美国修路开矿的中国华工而通过的。它使得在其后的61年里，已经移民美国的华人不能成为公民，不能购置房产，不能担任公职等。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特定民族的歧视法案。

(1) 梭伦（Solon，公元前638—前559），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2) 花刺子模帝国：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

(3) 桑给巴尔：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桑给巴尔岛南北长85公里，东西宽40公里，面积1658平方公里。

(4) 奔巴岛：位于桑给巴尔岛以北40公里，面积984平方公里。

第十三章

中英鸦片贸易冲突是源于鸦片或 白银吗

我们可以仅仅用善良和道德来评价历史吗？我们是否还在用阴谋论或者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

2011—2012年大体是鸦片战争170周年的纪念，我们有理由认真反思。中国金融博物馆特别与中国金融学会联合主办了“中英金融史：1841年以来”的特展，分别在天津和北京展示，吸引了超过3万人参观。举办这一展览的一个缘由是，英国前首相布朗先生来天津的金融博物馆参观时，我提到了鸦片战争，他颇为诧异。他认为英国与清朝主要是贸易冲突，谈不上战争。于是，我们商定一起来推动一个历史展。我们也得到了大英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协助。鸦片战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它成了一个深刻的外交屈辱和民族仇恨的烙印，甚至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试金石。

在我们的主流记忆中，帝国主义用源于印度、孟加拉的鸦片来掠夺中国的白银，弥补获取中国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巨大贸易逆差。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英雄行为更是凸显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薄情寡义。道光皇帝对鸦片深恶痛绝的讨伐檄文、战后的割地赔款、通商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对于前工业社会的“不平等”条约，都让我们中国人痛心疾首地铭刻于心。

在国际语境中，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更多被称为是英华战争（Anglo—Chinese Wars），被归结为是通商与外交的战争。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在澳门租赁港口并建立码头，从事连接欧洲、中东、中国、日本等国商品的海上贸易。基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傲慢与偏见，将国际贸易归结为有限的赏赐与进贡，大量的通商活动还是政府管制之外的民间走私。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活动始终是在民间主导的环境下进行，政府并无过多的关注和干预。所谓的严刑苛法多流于形式，不过是鼓励了地方大员的贪污和贸易垄断。

尽管我们长期认为明清经济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官方史料也很少对海外贸易进行记载和整理。但是，近代欧洲的大量文献表明，中国商品和远东贸易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孕育和兴起有不可估量的贡

献。中国的丝绸与棉布对欧洲纺织业的激励极大，同样，欧洲的商品和科技也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启蒙。在日本的文献中，我们认定的日本倭寇进犯大多是中国江浙沿海的民间贸易走私活动，间或有日本浪人参与。体现中国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中国白银货币制度曾高度依赖于全球白银市场的变化。

明朝时期，与全球的白银世纪一致，中国也进入了用白银作为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阶段。1581年，明朝正式推广名臣张居正倡议的“一条鞭法”改革，鼓励民众用白银支付税款，直接导致长期在民间流通的白银登堂入室成为国家货币。不过，中国自身的白银产量和存量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的货币需求量相差很大，外国白银向中国流入就成为当时贸易和走私的重要目的。据学者朱嘉明的分析，明末中国累计生产了4.6亿两白银，而同期却进口了3亿两。

绝大部分的白银进口都转换成为流通的货币，只有少量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依据白银进口的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中国货币流通和市场的规模，也可以推算出中国民间与海外通商的规模。白银持续进入中国成为明清商业经济稳步发展的动力，刺激了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的发展，导致铁、造船、建筑、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等工业在15世纪遥遥领先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玉米、红薯、花生、土豆、辣椒等洋作物引进也大大改善了中国农业的生产结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美经济特别是墨西哥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进口中国丝绸达到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0%以上，墨西哥银矿开发和纺织业都获益巨大。墨西哥银圆也长期成为中国广泛流通的货币。

不过，风水轮流转。1618年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导致全球白银生产急剧下降，1639年日本的“锁国令”停止对中国出口白银，这都沉重打击了中国货币流通与政府支付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推动了崇祯政权的倒台。这种历史记忆自然让此后长期纠结于白银匮乏问题的清政府坐立不安，芒刺在背。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全球最大

的白银进口国。1700—1840年，从欧洲和美国运进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正在急剧扩大全球的殖民地版图，争夺原料和市场资源，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在清朝实施20%进口统一关税的情况下，除了玉米、烟草等少量商品外，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通过获利来平衡贸易逆差。况且，英国当时已经实施金本位，向中国支付白银还需要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增加额外成本。

全球市场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当时最大市场的闭关锁国政策、军事与通商的联盟等宏观背景导致全球政治、军事和商业霸权需要不断地洗牌。这就是中国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南美殖民地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性征服行动的动力。放在更大的历史格局下看，鸦片战争可以有更多的解读。对当时和今天的英国人而言，很少有人了解由于鸦片贸易居然导致了一场海外战争，甚至不知道英国曾经与中国有过这样的战争。

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牟利和平衡进出口贸易收支，便与中国走私者和地方低级官吏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将印度和孟加拉种植的鸦片通过广州违禁输入中国市场。鉴于巨大的利益诱惑，鸦片在中国民间甚至军队中蔓延很快，特别是南方各地几乎明火执仗地交易。白银流失甚巨，政府财政面临困境。

战争由鸦片而起，迎合了清廷的道德正义，也符合将帝国主义与毒品鸦片捆绑在一起的革命思维，捎带着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定义为“精神鸦片”。从大格局上观察，鸦片和白银都不过是中国与欧洲两种全然不同的观念与制度激烈对抗的表达工具，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长期纠结在器物层面的记忆和宣泄，将不断巩固制度层面的怨恨和偏见，无助于我们面对新的观念、制度与文明的融合。

多年前，我去日本东京的江户博物馆参观，那天正巧是美国的佩里将军带四艘军舰强行驶入日本横须贺的东京湾事件150年纪念日。博物馆为1853年用军舰打开日本国门并迫使日本签下“不平等”条约的这位洋人写了一份充满感激之情的简历。仔细看了与《南京条约》基本一致的开埠通商、治外法权、降低关税、派驻使节等日美条约之内容，很是感慨。中日两个民族对这样被动开关的记忆和反思竟然如此不同。

以主流观念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几乎使国家濒于破产。不到200年的光景，这个“东亚病夫”居然顽强成长为全球新的经济大国、强国。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得到了今日之光荣呢？

第一，鸦片战争是简单地源于帝国主义强制向中国销售毒品吗？帝国主义仅仅是掠夺中国的白银吗？当时清朝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选择吗？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场“文化冲突”，它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无正面的影响？

第二，中国明清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否真正实行过？中国民间海外通商被封杀了吗？中国近代文明是封闭发展的文明吗？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和资本化对欧洲工业文明的发育和美洲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到底从何发端？



日本为佩里将军竖立的雕像 对于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将军——佩里，日本人顶礼膜拜的态度耐人寻味。

第三，影响大国崛起的各种变量仅仅用善良和罪恶这种站在不同价值观上的道德评价就可以标示吗？用阴谋论思维和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可行吗？

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太多的过程，但可以开放视野，调整观念。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倚重眼前人。

第十四章

中国本土钱庄与票号的衰败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与现代银行擦肩而过？

多年前一部以山西票号日升昌兴衰史为线索的电视剧热播，让大众了解了中国曾有的相当于现代银行的票号这样一种形式。加上曾经热销的长篇小说《胡雪岩》，钱庄也回到了商家的视野中。到底钱庄和票号是什么机构？是否自然发展成了当代的银行？是否被外资银行打垮了？这些问题始终是金融史界人士的纠结处。

钱庄起源很早，主要是在明清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货币并存使用的环境下，专事多种货币间鉴定与兑换交易，继而提供存款和放款的业务。中国古代向来是个比较割裂的社会，尤其是在通信不发达的明清时期，政令往往很难到达地方，通常各省、各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几乎每个地方的军阀和重要商家都会发行。这些货币以银为主，重量、成色均不相同，造成了一跨省就要频繁兑换的问题，钱庄主要的业务就是在短短十几秒钟内，实现多种货币之间的兑换。

钱庄以客户的存款为依据印制发行的不记名庄票，可以流通转让，事实上形成了以商业交易活动为依托的民间货币。在民间经济和市场交易活跃的江浙地区，钱庄形成了强大的金融网络，也推动了早期初级工业如瓷器、纺织、五金矿业等发展的资本积聚。

当时中国有三大商帮，广东商帮以十三行为代表，从事沿海外贸和走私，浙江商帮则主要以钱庄、丝绸、手工业为主，而山西商帮由于离京城较近，与官府关系密切，垄断了官府库银的押运。

在钱庄形成区域网络的基础上，晚清时期，山西商帮在长途贩运和镖局（护卫资金安全）以及账局（异地大额贷款）的增值服务过程中建立了票号，将跨域的汇兑和存贷业务与货物贸易分割开来独立经营，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金融机构，汇票也成为特殊的流通货币。

山西最早的票号为日升昌，它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大量货币的流通，西裕成颜料庄最先在京晋间尝试汇兑，并接收汇兑业务，这种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道光年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

从道光到同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日升昌大财东从票号的分红超过了200万两白银。它的迅速成功，导致众多的山西商帮纷纷建立自己的票号系统，并将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日本、朝鲜、南洋、俄罗斯等地，一时山西票号名扬天下。

钱庄和票号在具体信贷业务上区别并不明显，但从整体功能上却各有不同的发展领域。一般而言，钱庄重在本地商家的汇兑与居民存贷业务，票号则重在跨域的钱庄之间汇兑与机构存贷业务，类似于零售与批发的关系。因此，在晚清经济中，钱庄的发达直接便利商业和民众的生活；票号的发达则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积聚。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以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为代表的浙商票号等对近代中国的本土金融能力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我们的主流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对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的成长给予了积极评价，归结于初级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才智努力的结果。它与500年前佛罗伦萨地区近代金融的发展起点基本一致，同样起源于商家的货币汇兑和存贷服务。不过，我们的钱庄、票号群体发展不到300年，便崩溃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令人遗憾地与现代银行擦身而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关，接受广泛的国际贸易。开埠之初，易货贸易还是主导形式，即中国的丝、茶出口与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虽以银钱计价，但大多以货物交割，并无多少银钱出入。为便利大宗交易，各种专营贸易进出口的洋行便说服并推动外国银行接受中国钱庄发行的庄票。同时，外国银行也在庄票基础上给予中国商人和钱庄以抵押或信用贷款，即“拆票”。

钱庄与外国银行之间的金融往来逐渐成为主要业务，使得原来钱庄仅仅依赖票号的格局有所调整。在当时的半封闭经济格局下，外资银行、本土的票号和钱庄构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局面。“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这种格局在晚清持续了大约50多年，也支撑了整个洋务运动和

同光中兴期间中国近代产业的孕育，当然也承担了太平天国内乱融资、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等。

地区间往来的汇兑，以及依靠吸收官款得到的支持，让钱庄与票号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经济支柱，稳定着社会金融秩序。尽管与外国银行有着日趋紧密的合作和竞争关系，但它们早期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直接发生联系，仍然处于支配地位。

甲午战争后，票号还同外来资本展开过竞争，例如当时的合盛元票号，为了抵制日本的扩张，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了3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拉萨和加尔各答等地设庄。

钱庄和票号这种早期的汇兑业务之所以能够生存，还依赖于传统的操作方式。当时，铁匠的学徒期通常为3年，但钱庄学徒则需要7年。不同地区银两在成色和分量间的差别，要求伙计必须通过用手掂量的方式迅速折出相应比例。

伴随着近代流通货币的迅速标准化，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鹰洋和“袁大头”等银圆以及庄票和银行钞票的广泛流通，让“天平”逐渐取代了“手工”，传统模式必然会失去生命力，以信贷服务成为主业的钱庄显然无法与20世纪初期大量兴起的外资银行和本土银行相竞争。除了一部分钱庄改组成为民间银行外，几次金融风潮便将坚持守旧的老钱庄彻底淘汰了。

山西票号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对手。首先是官商建立了垄断的商业银行，如户部银行。清末，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相继成立，而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更是凭借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行政职能和雄厚的资本，将过去票号承办的跨域汇兑和官款存放业务悉数收回。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还强制要求民间钱庄和票号提高存款利率和降低放款利率。同治以后，与封建官僚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还形成了南帮票

号，其中严信厚创立的源丰润票号店和李鸿章家族经营的义善源票号店都有很大规模，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

其次，山西票号一度辉煌的历史也滞阻了它向现代股份银行制度的转变。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就曾因为管理权问题与财东发生过激烈矛盾，另立门户。这些问题在后期促使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一大批新兴本土银行脱颖而出。

最后，山西票号曾依赖于给各地政府财政和军需提供信贷支持，其后在战乱特别是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难逃倒闭的命运。山西22家票号除了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为资本雄厚，能够拿出大量现款应付挤兑风潮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均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

实际上，在庚子国难前后，发展到高峰时，中国票号的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总额已经接近2亿两。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使得票号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失去政府资源的票号存款被提，放款又无法收回，周转困难。1914年，有90多年历史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大公报》在分析其倒闭原因时曾总结，日升昌营业中心首先在南不在北，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革命后各省发行纸币，日升昌现金缺乏，白银调运导致大量亏损，此外，在外资银行的欠款也十分惊人。



日升昌票号旧址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对近代中国本土金融能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笼统、轻松地将钱庄票号业的衰败归结于外资银行的压迫与本国腐败而垄断的金融制度，如同主流教材和影视作品一样，从而激发出莫名的民族主义惆怅和悲愤。我读过许多将中国的钱庄票号描述为祖上传承的国粹的文章，其功能甚至胜过华尔街。其实，想象并没有事实的支持，而这样的悲情也无助于我们客观认知历史进程。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地区是近代银行的发源地，银行这个词汇就源于拥有从事货币兑换的板凳柜台的专门机构。而且当时也有两类不同分工的银行，一类叫minuto bank，从事当地货币汇兑和珠宝抵押贷款，相当于钱庄。另一类是grossi bank，从事国际贸易汇兑、解汇和给政府教堂等公共机构与商户提供长期贷款，也类似于我们的票号。不过，经过200多年的运转，这两类金融机构都在18世纪互相融合发展成了现代的商业银行。后者更集中于提供长期资本筹集而成为商人银行（投资银行）。

1580年，意大利创立了近代最早的威尼斯银行，随后，1593年的米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1621年的纽伦堡以及1629年的汉堡，也相继建立银行。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银行则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规模巨大的股份银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银行的主要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稳定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于1844年改组，成为国家中央银行的鼻祖。

西方社会中政教之争和诸侯割据导致契约关系稳定，给商业机构和金融业提供了稳定的自发组织成长环境。贸易、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动进一步巩固了商业银行作为聚集大规模和长期资本的功能；股份公司的创造在客户群层面上保证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投资的安全底线；而最终银行股份制的引进则奠定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基础，即股东与管理层的公司治理规则、财务透明与安全经营的约束，保证了金融体系能始终平稳，经受商业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考验。

反观中国的钱庄与票号，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始终没有独立自发成长的空间，尽管300年前中国商业经济 and 市场规模并不比欧洲

差，而且金融技术与手段或许比意大利同行还要复杂先进。实际上，山西票号曾经创立过十分严谨的管理模式，其密押制度、总分号报告制度以及总号独立出票制度都曾显露过现代银行的雏形。

但这不足以让他们跟上时代，由于中国的产业革命不能形成，大的资本积聚并没有市场需求。融资只能是供政府做非商业支配。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观念的革命，钱庄和票号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政治动乱。内部争斗和规则颠覆也导致其无法稳定成长为集团结构。

我在观看中国的外资银行历史资料中特别注意到，他们与本土银行的相比，除了观念差距和技术手段不同外，政治上的特别优惠或歧视并不存在。事实上，最早进入中国经营的许多外国银行也在不同的金融风潮中倒闭、破产，如1850—1860年期间，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所属丽如银行、汇隆银行、呵加刺银行、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等，倒闭的还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日本、俄国的一些银行。而票商对同官办银行的合作表现得也并不积极。光绪年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曾邀请山西票商入伙天津官银，却遭到票号财东们的果断回绝，户部尚书鹿钟霖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也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出于各种考虑，明令无论票号还是个人都不得入股。

值得一提的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百年里更多是与钱庄、票号合作，彼此融资联合服务客户，也为中国本土银行引进了全套的金融技术和管理模式。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银行很多主管都是从外资银行挖脚而来，有些主管甚至就是洋人。他们互相帮忙渡过金融危机。

例如，1916年北洋政府印钞过度导致纸币大幅贬值，全国挤兑风潮骤起，段祺瑞政府颁布停兑令，导致全国银行危机。中国银行为自保而抵制停兑令，与英、日、德、美十几家银行商借巨款而渡过危机。同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英资、日资银行立即遭到全民挤兑，汇丰银行和横滨正金等银行不得不向中资银行和钱庄、票号求救，得到中国当时的民间银行“北四行”和大量中小钱庄的借款支援。金融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产业，银行破产倒闭将形成连锁反应，

中国的金融业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对钱庄和票号来说，先天成长和后天发育，都注定它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

第十五章

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金融的激励

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与那数千家外资洋行和数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

1757年，清朝再下锁国令，仅保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了第一家洋行柯克斯·理德行，专业从事代客买卖。此后，各国洋行陆续进入广州营业，白银、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与农产品成为主要商品，当然也有鸦片贸易。

洋行初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集中在广州的所谓“十三行”，即得到政府特许经营外贸业务的中国商行。尽管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办民营贸易垄断集团在从事国际贸易中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清朝最有财势的山西晋商和两淮盐商成为民商的鼎立三足。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富可敌国，以拥资2600万银圆成为当时世界十大首富之一。

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十三行的职责包括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款，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政府曾于乾隆十年（1745）从广州20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5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因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的权利，所以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十三行的专营权也被废止，洋行纷纷入华。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了香港、华记等大洋行，几乎既经营货运，又兼营银行与保险业务。到1860年，洋行已经有200多家，控制了国际市场的对华贸易。而广州是在1858年出现的地区性专业轮船公司——枣省港小轮公司。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尽管少数洋行已经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但投资仍主要限于贸易和船运等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未取得大的进展。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无论已开口岸还是新开口岸，都出现竞设行号的高潮。在全部洋行中，英商最多，这些洋行已开始从商品贸易转向经营轮船、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等各种行业。

各个企业行号大都由多家洋行联合集资创办，独资创办者很少。竞争导致联合，交叉投资促进垄断，垄断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在一些大洋行资本的支持下，有些企业一开始就是在兼并其他企业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有的则是在创办以后从事兼并活动，从而形成若干洋行资本集团。与此同时，提供结算和汇兑服务的外资银行也陆续进入中国经营，这种完全不同于票号和钱庄的现代融资业务开启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对金融业的理解。

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是英国的丽如银行，它在1845年进入香港和广州，1847年进入上海营业。此后，以英国系为主体的银行主导了第一波银行建立潮。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11家银行进入上海，10家属于英国。这与当时英国在全球的经济、产业和贸易的地位相关。不过，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纺织业严重过剩引发了首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参与金融投机的在华银行纷纷倒闭，包括汇隆、呵加刺、利华、汇川和利生等银行机构。只有丽如、有利、渣打、法兰西和汇丰犹存。

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及贸易方式的变革，以及对华贸易难以全面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在华洋行特别是资力雄厚的老牌大行，开始实行代理华商经营制度，调整原有的经营方向。到7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洋行都把各自的力量从商品贸易的投资及收取佣金的代理业务转移到加工制造、航运、保险、金融等贸易的辅助业务上去。所谓代理经营，就是既不承担风险又可自营，并以代理华商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华商或出资购买轮船由洋行代理经营，或置货由洋行代理订购运销。在这个阶段，轮船运输业仍然是洋行商

人扩张势力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洋行商人向生产领域增加投资。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55年中，洋行商人投资创办的各类工厂企业共计191家，其中1870年以后创办的有116家。

在清廷启动洋务运动的30年间，洋行商人多以天津为跳板，与北京的大清政府打交道，通过安排政府借款来获取铁路、邮政、水电、海防、市政等建设项目的投资权。

辛亥革命前，进入中国经营的外商洋行已经接近3000家，英商和日商占据了主导地位，投资领域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实业领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总资本额近1亿元。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有的企业资本则超过了千万元，获得了一些地区和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同时，在中国铁路权益的争夺中，一些洋行还参与了外国在华铁路投资，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洋行势力的扩张达到了巅峰，并且已经从贸易服务过渡到项目投资，与大清政府建立合资企业进入长期经营的新阶段。

同样，外资银行也开始规模化进入中国。基于早期开放和江浙民间资本活跃等因素，上海一直是外资银行的首选之地。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上海有外资银行27家，同期武汉有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不过，到1936年，外资银行的重心已经有所调整，上海外资银行27家不变，而天津也有了总、分行21家。外资银行最初北上天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想参与政府的融资和银团贷款项目。袁世凯和历届北洋军政府也是依赖外资银行融资来安排财政运转和军事作战计划的。同时，现代产业投资的银团贷款也多在与政府部门往来方便的天津进行。

早期的外资银行基本业务是汇兑、头寸融通、商户担保、货物抵押等贸易融资，基本是依赖为外商客户提供与中国洋行贸易的金融服务。面对外资银行的渗入，中国传统金融业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大清政府和北洋军政府，积极筹划应对。长期操控中国海关系统的英国人赫德提出建议，希望能借助海关贸易融资的市场筹备一家海关银行，

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直接推动了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在上海建立中国通商银行（1897）。

考虑到大清对财政的控制和力图主导中国金融格局的设想，大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户部银行（1905年设立，后改名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1908），在全国各个行政辖区建立了分支机构，除了公款存储、汇解等财政性金融业务外，还承担发币、对外国债、对内公债和长期产业项目的融资等大宗金融业务。从该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也是在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中诞生的，而且中国早期银行的几乎所有业务都与外资银行接口，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合作多于竞争。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英资汇丰银行（HSBC）1864年在香港发起，1865年同时在香港、上海、广州和伦敦开始营业，2010年总资产超过5万亿港元，居全球金融500强之首。汇丰银行创始人汤马士·修打兰是长期活跃于中外贸易的洋行商人，他敏锐地感受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洋务派要求改革和开放的大趋势，特别体验到金融本地化服务在提升效率和把握需求方面的优势，执意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从事汇兑结算和贸易融资的现代银行，从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商服务逐步调整到为中国商人和政府服务。



上海外滩汇丰银行旧址 汇丰自诞生之日便起到了联系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汇丰银行决策委员会中的14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是对华贸易的主要操手。很快，汇丰成为香港地区政府往来账户的官方代理银行，同时得到了在香港的发钞权，并成为第一家大规模给清政府直接放贷的国际银行。清末淞沪铁路、开平煤矿等项目都曾向汇丰贷款。汇丰银行也一度取得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至于甲午战争赔款、大清西征、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等各项重大项目也都少不了汇丰的身影。到20世纪初，汇丰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即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汇丰银行也是少数几家维持中国与全球联系的国际银行之一。在香港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空前的金融危机局面下，汇丰银行运筹帷幄，稳定了局面，得到了历届政府的高度评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洋行介入中国传统经济，催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买办。买办意义众多，鸦片战争后，洋行时期的买办多指帮助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类被外商雇用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帮助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间形成双向沟通。而且，此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买办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买办最初产生时，社会地位低下，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地位迅速提升。他们既盘剥中国的本土商人，也从外国商人身上渔利。买办是中国最先直接接触到西方资本市场和商品贸易的一群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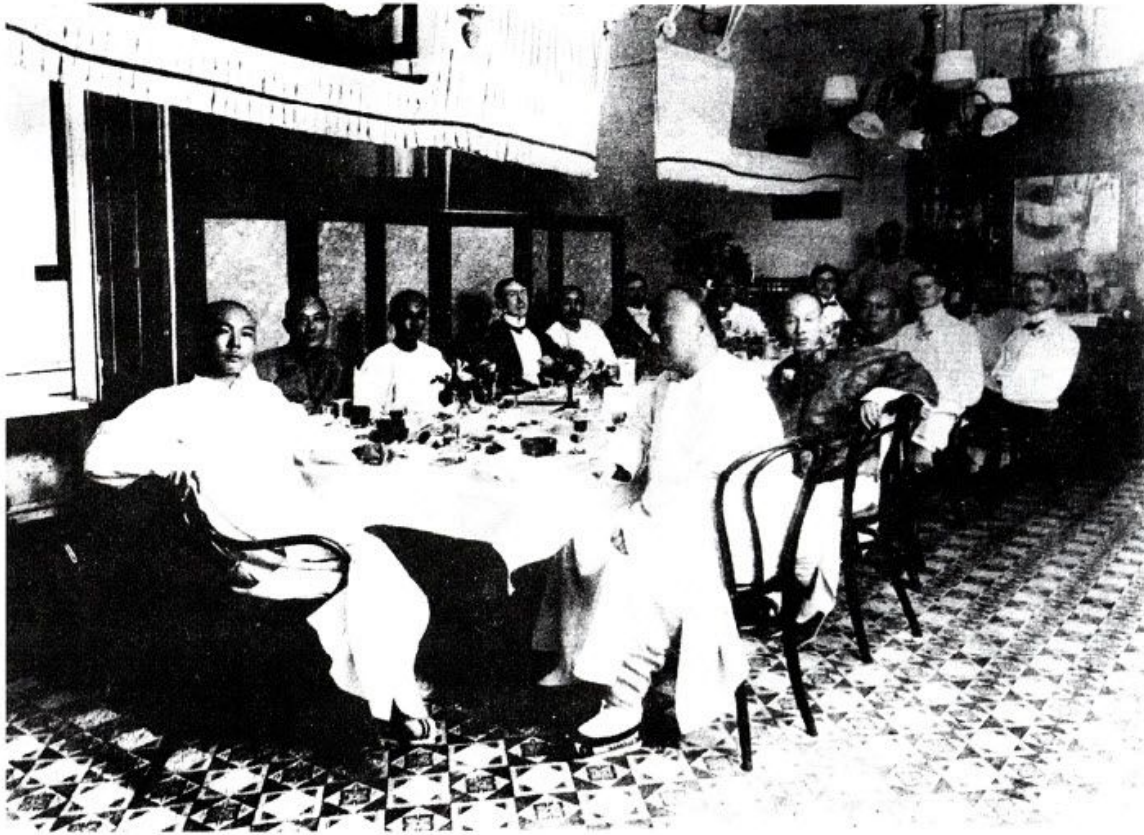
洋行和外资银行在过去百年里都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大患。价格剥削和市场压榨自不必言，互相勾结掠夺中国核心产业的利益、长期压制并扼杀民族产业发展更是延续到今天的罪状，特别是从事鸦片贸易的历史，更是让沉迷于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人士理直气壮地谴责国际势力的万恶不赦。尽管最近30年来，洋行和外资银行

已经成为创造中国财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历史的客观评价依然，很少有机会得到正视。

洋行和外资银行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现代企业，他们借助军事霸权和产业技术优势残酷地打碎了大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和自然经济的全部屏障，用西方殖民霸权和市场经济的规则对孱弱的经济体系和民生格局进行洗牌。

的确，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不应该忽视的是，近代的铁路、桥梁、公路、电力、纺织、水泥、矿山、钢铁、制造、城市建设等硬件，邮政、教育、法律、金融、财务等软件，甚至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都与早期的几千家洋行和几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洋行和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是不能因掠夺和剥削而矢口否认的。

笔者特别举出汇丰从洋行到外资银行，再到今天全球金融巨头的经历，希望表达一个历史的逻辑：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文化传播机制。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有成本的，商业与金融作为进步的杠杆远远比武力和垄断更为有利、有益。与动辄几百年历史的全球金融集团相比，汇丰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洋行迅速成长为执全球牛耳的金融大鳄，说明其不仅是中国经济历史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商业和金融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清末上海买办的一次聚会 买办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并不光彩的角色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六章

墨西哥鹰洋与货币的全球化

大量流通的鹰洋，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自此，中国废两改元，“银两”在历史上逐渐消失，“圆”时代到来了。

30多年前读书时，得知墨西哥鹰洋曾在中国市场广泛流通，继而被告知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和弱国的悲哀与耻辱。多年前在日本的货币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明朝的铜钱曾是日本唯一使用的官方货币，多少有点莫名的欣然。再后来，发现在英国博物馆选择的体现世界历史的100件文物中，墨西哥鹰洋的正宗前身西班牙银币位居其中。

在经历了皮毛、贝壳、盐块等一系列交换媒介后，古罗马帝国启用了金币作为主要的兑换、交易和经济储备工具，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尽管中国曾在1000年前的宋朝使用过交子等纸币，但铜币和银两始终是货币的主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洋人的货币也就势进入中国市场，一度主导了相关领域。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为黄金而来，但在印加帝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特别是玻利维亚波托西地区（Potosi）的丰富矿藏，使得殖民者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西班牙人开发矿藏，提炼银金属并向欧洲和各国输送。从1520年首次出口到欧洲的148公斤开始，到1590年时每年出口达到300万公斤。

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意指一个银币值八个里尔）首次铸造于1573年，到16世纪末的25年内，便迅速流通到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流通银币，并且将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大转移。依靠这些财富，西班牙成为一时的霸主，组建了强大的军队，打败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西班牙银币通过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进入中国，初期由于成色好、含银高，深得中国民众喜爱。商人们大多将进口的银币立即熔化，改铸纯度较低的银两或打制成各种银器。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体现。西班牙银币的进口给当时明朝银本位制度的监管带来了许多困扰。

充裕的白银进口也给西班牙经济带来了问题——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政府挥霍无度，人们奢侈浪费。另外，刚刚进

入的白银立即交予国外收购，很少投入本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这使得西班牙丧失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机会。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继续制造与西班牙银币同值的墨西哥银币。1823年开始在银币上刻上墨西哥国徽上的雄鹰，以后改称比索。由于其成色稳定、品相好，加上西班牙在欧洲30年战争之后的衰落，迅速取代了西班牙银币的地位。很快，墨西哥鹰洋在全球各地都成为了流通货币，16—19世纪，墨西哥大体制造了30亿枚鹰洋。

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衰落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中国自主货币的成长史。

墨西哥鹰洋从1854年流入广州，开始成为流通货币，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发展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皆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圆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墨西哥鹰洋主要的流通地区是上海，几乎成为主币，在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等地也流通甚广，基本超过了银两。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在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鹰洋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圆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墨西哥鹰洋 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衰落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中国自主货币成长史。

据1910年的统计，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圆有11亿枚，1/3是墨西哥鹰洋。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曾提到，“中国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铸鹰洋为最多……前经饰查上海进口之数，每年不下千余万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约九亿六千万元，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与之对应的是，清朝末年全中国的货币总量折合银圆还不到21亿元，鹰洋占到近1/5，全国银两总额2.5亿两（合3.47亿元），与鹰洋数量相当。

货币对于老百姓来说具有交换和保值等基本功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除非在政府强制的约束下，老百姓都会选择最便利的货币，但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是一个权力的工具，通过货币的确定与管制来实施强制分配利益和资源，美其名曰为货币主权。

明清以前，中国的商品市场水平很低，行政分配和非货币交易主导资源配置，货币管制也不多，官方和民间均可以根据本地需求自行铸币和熔币。各地银两成色和品种繁多，各行其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更不必谈现代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孕育了。

西班牙银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不仅将西班牙打造成了全球经济时代第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将分散在欧美亚等不同大陆的商品和资本市场通过货币的流通联结起来。之后的墨西哥鹰洋则是推动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最重要货币工具。它不仅开创了与本土农贸市场并行的洋行洋货市场，而且统一支付的兑换与储藏价值手段也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逼迫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

光绪年间，一些政府官员意识到鹰洋对中国货币制度的侵蚀，同时也看到西方银圆制度的先进性和币制改革的迫切需求。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鹰洋，“便民用而挽利权”，奏准在广东开铸新式银圆（龙洋），各省纷纷效仿，累计铸造约2亿元，中国银圆制度初步确立。宣统二年（1910）公布的《币制则例》采取鹰洋的标准——

库平七钱二分、纯度0.90为银本位的基础，七钱二分的重量由此成为中国银圆的定制。但此时，龙洋仍未能撼动鹰洋在华东、华南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一方面，中国银圆制度逐渐成熟，另一方面，墨西哥实行金本位，银圆停产，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数量日益减少，开始没落。袁世凯当政后，在天津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政府造币厂，1914年决定统一币制，通过《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大量铸造以袁世凯头像为标志的民国银圆，俗称“袁大头”，仅一元币便制造了7.5亿枚。受到鹰洋的影响，“袁大头”重量仍是七钱二分，成色稍减为0.89，由于其铸造精良，重量、成色严格一致，很快成为全国性银币。到1928年，“袁大头”铸造额已经超过11亿枚。铸造和推行“袁大头”时，大量鹰洋被收购重铸。民国三年（1914），天津造币厂熔化的鹰洋达1800万元之多，中国、交通两行也“襄助政府在上海等市收回墨洋及其它杂色银圆，改铸国币”。到1931年，“民国币由外币熔银铸造者”有2亿元左右，大部分是熔化鹰洋。此外，我国民间有收藏白银的传统，鹰洋被收藏的数量也十分巨大。

墨西哥鹰洋在上海的衰落始于1918年的“盐余”之争。当时，两淮、两浙盐税要经中国银行分行汇至上海转解，而汇丰银行一向非鹰洋不收。由于鹰洋越来越少，迫使中国银行通过钱庄向汇丰购买，双方屡次产生争议。最后，北洋政府与银团商要求一次性发还盐余数百万元，汇丰由于库存鹰洋不够支付，只得决定以0.73006作价（市面0.72），鹰洋和中国银圆并用。借此机会，中行上海分行在当年5月发行国币兑换券，国币在上海开始与鹰洋平起平坐。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发生罢市风潮，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难以兑换鹰洋，中国银行再次抓住机会，促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会商取消鹰洋行市，并由钱业公会通告，“沪市现因鹰洋逐年减少，已属供不应求。吾国旧有龙洋及续铸新币，流通行用，商界称便”，至此新币、鹰洋、龙洋（大

清、江南、湖北、广东四种）“一律并用，无分轩轻”。鹰洋失宠的同时，中国银圆制度的统一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光绪龙洋 为对抗墨西哥鹰洋对中国货币的侵蚀，晚清政府自制龙洋，重量七钱二分，与鹰洋一致。从此，七钱二分的重量成为中国银圆的定制。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了全国19个省48个商埠流通货币的概况，鹰洋只在18个商埠行使，在其中6个商埠还要对成色稍低的袁头币贴水，而“袁大头”在各地均“流通最广”、“最通用”、“最受欢迎”、“最为流行”。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最终下令禁止鹰洋等外国银圆进口，1934年驻纽约总领事馆函询“墨洋在华，是否仍合法通用而无限制”，财政部又重申前禁，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鹰洋在华流通的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的红军造币厂和1932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央造币厂所用的模板均是墨西哥鹰洋的铸版，只是在币面上戳凿“工”或“工人”字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墨西哥鹰洋信誉好，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私铸墨版鹰洋十分流行。1928年5月，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造币厂迁到井冈山的上井村，红军造币厂用打土豪和战争中缴获的银饰品和银器铸造银圆，由于银圆版式只有直线形边齿的墨版鹰洋一种，为了表示工农苏维埃政权铸造的银圆与市面上流通的各种墨版鹰洋假银圆的区别，红军造币厂在铸好的墨版鹰洋上凿下“工”字印迹，被称为“井冈山工字银圆”。1932年3月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击败国民党军队钟绍奎部，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迅速送到瑞金。从此以后，中央造币厂开始采用机器铸币，但铸造的仍然是墨版鹰洋、孙中山头像银圆和袁世凯头像银圆，铸好的银圆上仍用钢印戳凿上“工人”二字，铸好的银圆以500块一箱向中央输送，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用这些银圆从白区换回大量急需的物资。革命者用这些银币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直到1949—1951年为便利进军西藏，新中国还制造了一批“袁大头”银圆。

回首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尽管银币早已经退出历史，但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的影响还需要客观认定。西方不仅仅带来了鸦片、战争和殖民地，同时也摧毁了我们自我陶醉的天朝梦幻、愚昧和自然经

济。墨西哥鹰洋、“袁大头”银圆等都在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构建中发挥了独特的职能。

第二，在政府介入下，货币的职能比原始的定价、交换和储藏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它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创造出新的金融生态，而且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都导致了资源和货币本位制度的跨国转移，也推广了普世价值观念，使得后期观念的革命者也要继承现存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和货币制度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论管制者是否喜欢，是否制造障碍。货币的全球化更是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不容割舍。从当年墨西哥鹰洋等迫使中国放弃银两制度，废两改元，到当下中国的人民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这种历史变迁自然令人感慨，但个中的大趋势更令人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力和人民币的支付能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的国力相匹配，令人炫目的中国购买力能否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老百姓的生活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第十七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

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大大超过了日本，中国甚至被英国媒体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小的金融技巧足以倾覆整个制度。

谈及百年之前的洋务运动，主流学术界仍然是不屑一顾的否定态度。当代史学习惯性煽情，也是轻薄地将一场复杂深刻的中国近代产业奠基过程归结为两句流行语：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主要领袖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长期被丑化或矮化，洋务运动被归结为所谓回避制度改革、社会改造的一场闹剧。甲午海战的失败和权倾一时的盛宣怀发迹史等更是增加了民众对洋务派卖国求富的道德憎恨。至今，洋务运动俨然是攻击贪官污吏和抵制开放中很有分量的帽子，不时被翻腾出来。笔者看来，这桩公案值得一提。

洋务运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确认两年前的《天津条约》，同时进一步签下更为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也就是洋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三十几年，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民族发展的观点，但命运不济，在当时都充满争议。1894年，中国海军出乎意料地被日本海军打败，几十年的备战努力付之东流，权臣李鸿章屈辱下台，这标志着寄予中国复兴厚望的洋务运动草草收场。

洋务运动发轫于“自强”的立场，面对海外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力图大规模引进机器与技术设备建立近代的军事工业。其内容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洋务运动的诸种开拓之举多是依赖地方诸侯武装自己队伍的初衷。如曾国藩在安徽建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兵工厂，左宗棠在西安建立的西安机器局等。这些军事工业是官办性质，投资主要来源于海关关税和军饷拨款等，并无其他市场渠道。

伴随政府资金的困难以及诸侯彼此竞争的激烈，洋务运动后期开始面向市场，投资民用工业，以“求富”原则立业，企图形成独立和稳定的利润来源。同样，这一投资仍是围绕这些地方大臣形成工业布

局。如李鸿章在河北和上海支持的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开办的湖北织布局和汉阳铁厂，左宗棠在甘肃开办的甘肃制造局等。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在李鸿章担任总理大臣之后，洋务运动达到极盛时期。其他大员不说，单单李鸿章本人就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江西兴国煤矿（1876）、湖北广济煤矿（1876）、开平矿务局（1877）、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山东峰县煤矿（1880）、天津电报总局（1880）、唐胥铁路（1881）、上海电报总局（1884）、津沽铁路（1887）、漠河金矿（1887）、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左宗棠则在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不同的是，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创办洋务的思想特点。另一位洋务重臣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了《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即从中来，这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他在1889年任湖广总督时，在湖北建成了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1908年还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



张之洞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即从张之洞来，这是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

据统计，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洋务运动期间中国通商口岸从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6亿两。兴办洋务期间，中国进口货物中，19世纪80年代后的棉织品取代鸦片跃居第一，而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成为西方国家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洋务运动将中国的传统内生经济与当时全球的产业化直接对接，迅速填补了大机器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空白。这期间，清朝政局相对稳定，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几位强臣当政，太平天国被镇压，外国列强也忙于内部事务而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便是所谓的“同治中兴”。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都大大超过日本，以至于英国传媒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也是甲午战争前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甚至日本，都看好中国取胜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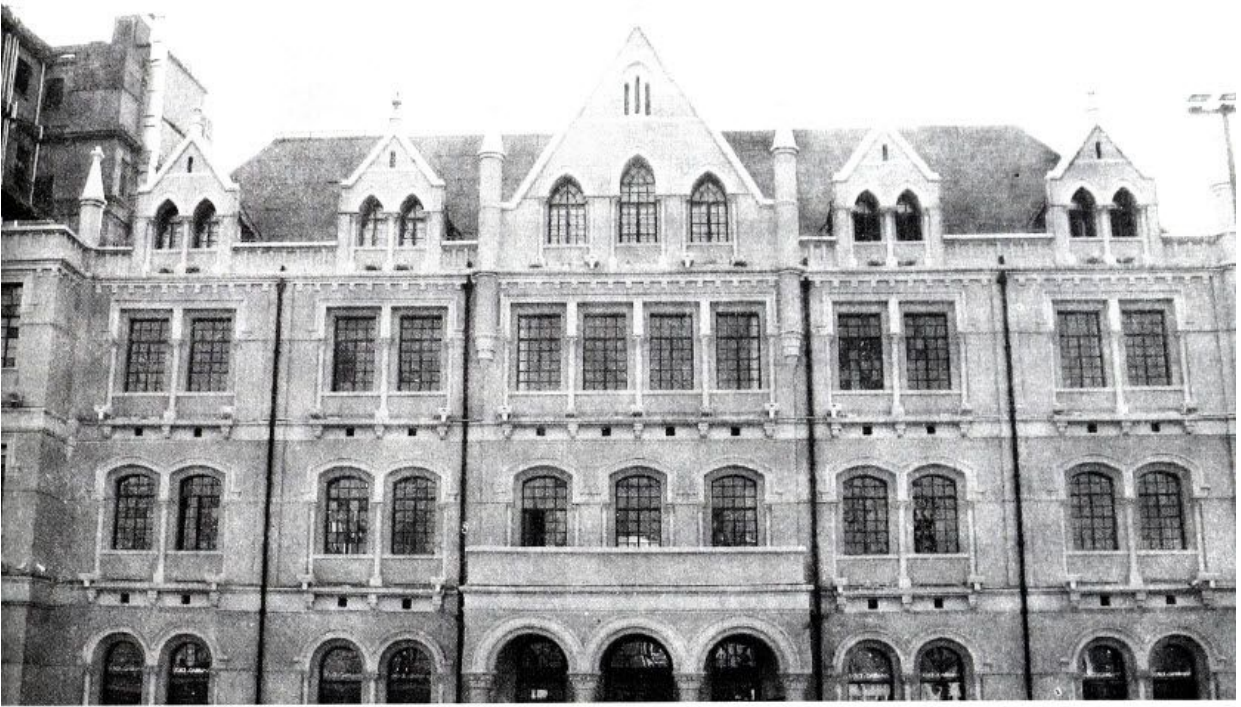
洋务运动主要指军事、工业、贸易和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对金融制度和近代金融机构与工具的引进很少涉及。当时中国的金融结构很简单，除了官府收支与拨付的资金系统外，只有票号与钱庄两种基本业态。前者于山西最盛，主要承担汇兑和机构存贷款功能，后者则更多专注于当地的商业存贷款活动。对于维持自然增长的商业活动勉为其难，对口岸开放后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击和近代工业经营而言，票号和钱庄都没有资本积聚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和空间。

鸦片战争之后，从1845年至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的资本规模、管理方式和风险控制能力伴随产业资本向中国延伸而不断强大，将中国本土票号和钱庄挤压到边缘城镇和落后产业，苟延残喘。

针对金融市场的空间，担任过洋行买办的商人唐廷枢在1876年曾倡议在广州建立股份制的新式银行，李鸿章在1887年也批准了与美国人合办华美银行，但遭到朝廷禁止。直到10年后的1897年，在官商盛宣怀手上终于办成了第一家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相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开矿、修路、造船、建水电等实业浪潮，一个银行的动议走了20年才修成正果，真是令人叹息。

中国洋务运动的同期，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1868—1889）。从倒幕战争到奉还大政于天皇，从迁都东京到建立内阁，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和经济制度；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销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制定宪法。日本的军国主义导向推动了军事能力的极大提升。成王败寇，甲午海战使得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洋务运动的成就。

洋务运动以军工、矿山、铁路等实业投资为基础，对于汇兑、结算、信贷为业务形态的金融机构不以为意，依然依赖政府的强制拨付制度和民间的个人信用来承载近代的工业建设和产业布局。在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和民间钱庄、票号趋于崩溃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体系和买办制度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的矿山、铁路、工厂、邮电、水厂等建设多是依靠外资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或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甚至政府预算也要依靠发行外债来寅吃卯粮。如笔者另文所述，1911年盛宣怀主导的四国大借款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收路政策，也因此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业银行。

洋务运动未能启动近代金融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的障碍。欧洲早在17世纪就有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业惯例，英国在1856年颁布了公司法，明确了有限责任的法律地位，这是现代公司进化的最为重要的基石。投资人的风险严格限制在出资额上，根本性地推动了现代资本的大规模积聚过程。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如票号、钱庄等都以股东全部资产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这就迫使金融机构尽可能股东分散化经营，将资本和经营范围严格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中形成的许多实业公司则是参考了洋行的股东结构，多采取股份公司的方式建立。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建立的公司多是股份制，而且官股私享，经营者获得多重利益。不仅有股权分红，而且有商权分利，还有准入权、孝敬金等费用。这种利益独享、风险规避的特殊公司体系正是盛宣怀等官商得以大行其道甚至逼走洋人同行的不二法门。因此，以为洋务运动操刀者不懂金融实在是大谬，他们只是以手段获鸡鸣狗盗之利，拒制度求盘根错节之益。

洋务运动始于清朝崩溃之际，外敌于前，欺辱于心，一时激起志士仁人的奋起，也鼓励能臣强将的搏击。各国列强之间的博弈，全球近代产业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给予了中国和日本一个宝贵的时段去变革。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齐头并进，引进近代工业技术和设备，更新教育体系和官吏机构，导致了亚洲经济在全球市场的首次崛起。政治制度和文明观念领域的进退取舍，造成了中国、日本发展路径的差异，而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发轫与否及其演化路径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差距。

近代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这是工业体系的内生因素。洋务运动搬来了可见的机器和技术，却没有学习金融观念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一种瘸腿的工业化。我们后人更多提及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失败，这种评价有可能妨碍我

们理解洋务运动的得失，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很难真正理解金融制度与产业、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内生关系。

第十八章

铁路与金融启动现代中国的产业革命

内忧外患，政局动荡，贷款合同无法履约，政府信用几乎破产，铁路融资不得不中断，产业革命之梦随之搁浅。如今，中国铁路建设、市场融资能力依然欠缺，发人深思。

1976年，一本关于中国债券的书在西方掀起了一轮中国债券热。由于中国债券的品种稀少，伦敦交易所不时还挂牌标价，给收藏者以希望。1979年，一张1898年由德国银行发行的面值为500英镑的中国铁路债券竟然拍出了14000英镑的价格。当然，由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结束，这些海外债券不能交易也无法清偿，就变成了收藏品，供专家鉴赏。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些债券揭开中国产业革命融资历史的一角，尽管这次产业革命由于战乱和政府交替半途而废。

西方的工业革命始于英国的纺织业，但其完成则以铁路业的成熟为标志。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1825年在英国的斯托克敦和达灵顿之间建成并运行的。英国和美国都相继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期完成了这样一个产业周期。对于地大物博的美国而言，铁路产业是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由于铁路业是资本密集型，铁路业高潮之时，也是资本市场高潮之时。20世纪初，纽约股票交易所中上市的公司大约有60%是与铁路相关的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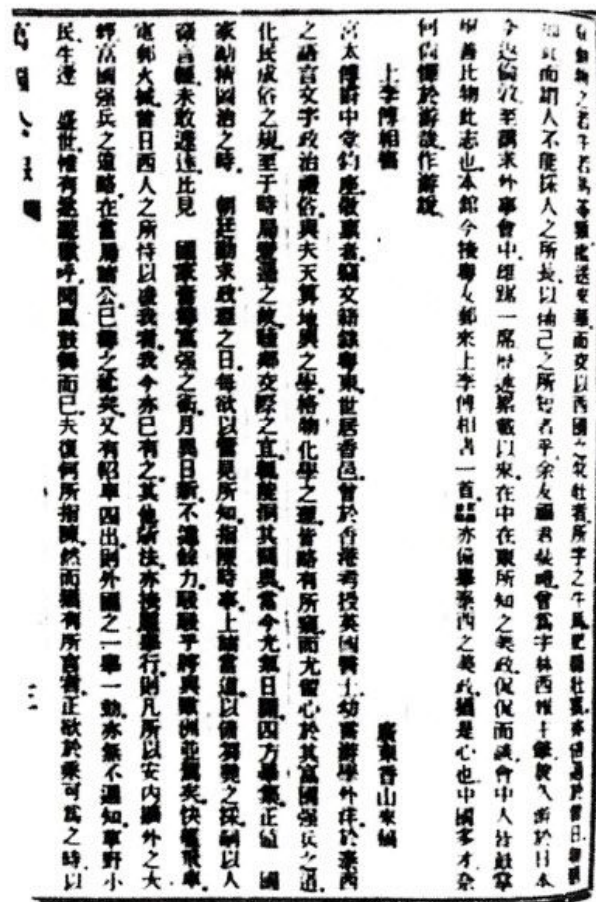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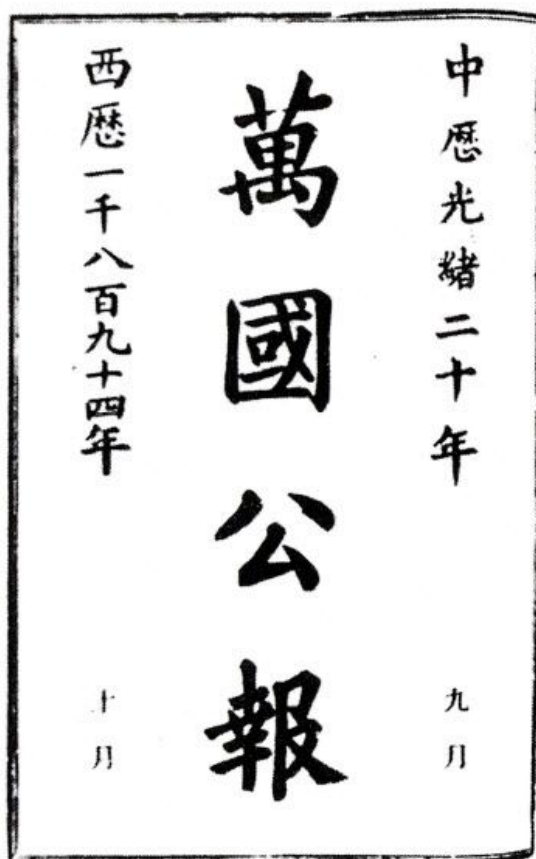
通过一连串学者研究出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铁路在工业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国家，都是通过铁路来推动工业革命进程的。德国开始工业革命相对较晚，但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1850—1869年，年增长率达到10.2%，同时期法国为6.7%，而英国在1849—1870年间仅为5.2%。铁路在德国的崛起中处于重要地位。德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35年修建的，由纽伦堡至富尔特，长度仅为6千米。1839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铁路建成。1869年，德国铁路共有17700千米，其中普鲁士占10000千米，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与其铁路发展速度成正比。俄国工业革命中，铁路在各个阶段也都起到带动作用。1851年连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铁路通车，到1861年有铁路2388千米。19世纪60年代，铁路从莫斯科辐射出去，连接中部9省主要城市，还有铁路连接乌拉尔和乌克兰，后者变成新的工业中心。他们将英、法资本投资于采煤业、冶铁业，生产供全国使用的铁轨，南边则发展巴库石油中心。1887年，俄

国拥有铁路30132千米，全国1.13亿人中有132万工人。1887年以后，俄国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农村在19世纪90年代已成为工业品稳定的销售市场。这时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仅增加对煤铁的需求，还把工业引向东方。到1900年，俄国已经有铁路53350千米，而此时，工业革命恰好完成。

我们再回到中国。在明清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的农耕社会并没有全国性市场，运输多以水路和马车为主导，交通未能形成独立的市场需求。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五口通商的开放时代，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中国内地试图建立战略要津，自然要利用正在成熟的铁路技术。修建铁路成为当时主要的商务和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中国的洋务派领袖也从西方考察的经历中了解到铁路和矿山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样提出了从铁路入手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革命领袖孙中山在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中提出“地球各邦今视铁路为命脉矣”，呼吁修建铁路。孙中山在下野后受临时政府委托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四处奔波，筹建铁路。

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修建了淞沪铁路（从吴淞到上海），全长15千米，这是中国办理客货运输业务的第一条铁路。不过，这条铁路仅仅运营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赎回拆除了。1881年开通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和第一台“龙号”蒸汽机车的建成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



《万国公报》刊登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部分） 孙中山在上书中提到“地球各邦今视铁路为命脉矣”。

不过，真正启动中国铁路和矿山建设的是甲午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干预。中国的战败导致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中国抢占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滩头要地。英、美、俄、德、法和日等国都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占领、租借或投资港口，鼓励本国投资人进行铁路建设。美国出于与英国竞争的战略考虑，更是由总统出面推行门户开放主义，鼓励商人们进行美元外交，到中国投资，重点关注铁路、矿山和港口。

英美铁路的热潮是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融资实现的，特别是美国金融家J. P. 摩根创新的信托和证券化，使得欧洲短期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美国的铁路产业。但是，彼时中国的金融系统完全没有建立，政府也没有任何管制措施，基本是依赖民间钱庄和票号来进行短期资金周转，根本无力积累长期资本投资铁路。尽管有地方官吏如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和盛宣怀之辈，但他们也是依赖政治人脉和地方商界的有限资源来投资，矿山和钢铁厂尚可应付，铁路则是捉襟见肘、无力大动。

中国的开放和工业化给西方银行与铁路集团以空前的机会，各国纷纷在中国通过代理商或直接与政府洽谈修建铁路项目。有些则通过提供卖方信贷推动中国采购本国的机车、钢铁和设备物料，或者与中国政府、企业合资直接投资铁路，或者代理中国政府在境外发行长期铁路债券为铁路融资。在中日甲午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间的三四十年间，铁路融资成为中国未竟的产业革命和金融市场活动的共同动力。

中国的境内外债券发行大体有三个高潮。清政权期间发行了3次，分别在1884、1898和1911年，数量不大，湖广铁路债券是最大一笔。民国初期发行种类极多，五花八门，但数量均不大。据统计有430种，主要用于铁路建设及其物料购置、政府融资和特种购买，如飞机等。其中，许多发行只是借新还旧的技术措施。最后一次高潮是在二战期间。因战乱，多数发行半途而废，而且是爱国债券性质，很少有偿付。中国的铁路债券中故事丰富，值得提及的有几件。

第一，陇海铁路是中国东西向的干线铁路，在西方被称为陇秦豫海铁路。东起连云港，西至兰州。全长1759千米，1905年动工，1952年建成。陇海铁路先是陕西地方政府官办，1908年又改为民间商办，因多年筹款无力而停滞，由政府于1911年再次收回国有。1912年，北洋政府与比利时商定借款，分段修建。1920年，再与比利时和荷兰借款修路。1924年北洋政府第三次借款，在中国发行1000万银圆债券，用于国内施工。同时在国外发行7500万比利时法郎，用于购买设备和物料，10年为期。因时局变化仅发行了一半，次年不得不再次为偿付利息而借款。到了民国时期，政府继续向比利时借款，同时法国也参与了部分融资。客观地讲，陇海铁路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举行罢工，横贯中国东西的大动脉陇海铁路修建陷入停顿。1921年11月8日，陇海路铜山站，因司门者受机务总管之命，将专为大厂机务工人出入之八号门突然锁闭，愤怒的工人将栅门挤开，为此，有两名工人被开除，于是酿成“八号门事件”。事发后，徐州铁路工人迅速推出代表赴洛阳、郑州、开封各大站联络，11月20日晨，铜山站全体机务工人首先罢工，发表了《陇海铁路罢工宣言》，提出了“反虐待”、“争人权”、“光国体”等口号，全路罢工持续了7天。最后，决定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会员，同时要求书记部正式派代表指导徐州、洛阳、开封各站的工会工作。可见，铁路的修建不光于工业，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都直接产生了影响。

第二，湖广铁路债券案。1911年，清政府与西方四国签订了借款合同，为期40年，总金额为600万英镑，两段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因为战乱和政府变更，1936年起，开始无人支取利息；1951年到期后，本金到期也无人要求偿还。1979年中美建交后，几个美国人以持有债券为由，向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偿还本息2.2亿美元。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受理，并于1979年11月13日向中国外交部长发来传票，要中

国政府在20天内应诉。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主权豁免原则，退回了美国法院的传票，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单方面做出了“缺席判决”，并且强制执行，扣押了中国在美国的财产。最后，鉴于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对法院施加影响，以该案涉及美国重要国际关系为由，要求法院撤销缺席判决。因为此事一度恶化的中美关系才稍有缓解。湖广铁路债券是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我在之后的“一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一章中有涉及，此不详述。

第三，铁路融资重组。民国初年，中国铁路基本靠外国贷款融资，政局动荡，多数不能履约，政府信用几乎破产。1935年，国民政府委任曾长期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资深金融家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张立即启动铁路债券的重组谈判，以削减利率、免除复息，减轻本金及展期偿付为中心，相继完成了津浦铁路、道清铁路、广九铁路、陇海铁路、湖广铁路等重组方案。到1937年4月，铁路债务的9/10基本已整理就绪。中国铁路债信大大提高，这为国民政府筹措新债提供了条件。此后，铁道部先后和外国债权人签订了多项合同。外国参与修建的铁路有：英国沪杭甬铁路、中德湘黔铁路、中法成渝铁路、中英京赣铁路、中法贵昆铁路、中英广梅铁路、中英浦襄铁路等。



张嘉璈 在中国铁路融资的历史上，他是无法绕开的先驱。

说到铁路与金融的结合，张嘉璈的确贡献颇多。他从金融转入交通后，中国铁路发展迅速。在中国资金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他利用铁路债券，1936年1月，修筑新赣路南昌至萍乡段；2月，修筑湘黔路株洲到贵阳线；1937年，修筑了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1938年，修筑了滇缅铁路等。在全面抗战、国家十分困难的1937—1942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他还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千米。抗战八年，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千米的筑路任务。为此，他先后发行了1亿多万元公债，后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只可惜，在战争环境下，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他本人也因此辞职。

翻检中国的铁路与金融历史，头绪极多，从金融角度观之，有几点可以留意。

其一，铁路融资的国家信誉。美国早期铁路主要是由私人投资，政府给予土地、独家经营权以及免税的支持。各州政府也通过发行铁路债券和投资股票的方式给予融资方便，只有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等少数地方政府直接投资铁路。中国铁路百年来全部是政府主导，很少有市场操作的空间，因此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主要依赖国家信誉。湖广铁路债券的官司应该是国际司法的特例，有诸多政治因素介入，不应引以为荣。而且，政府信用不能一味透支，中国高铁建设长期在政府扶植下未能建立自身市场融资能力就是重要教训。

其二，铁路融资的产业链。铁路需要大量的钢铁，导致钢铁厂和煤矿的建立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形成大大激励了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且，铁路也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交通便利后，旅游和居民迁徙都导致国家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中国历届政府对铁路融资高度关注，但对于产业链延伸却未能梳理。铁路部门军事化管理，上下游企业全被垄断门槛和垄断价格所钳制，不能自由提供增值服务，形成单向依附性。动车事故后，几十家铁路相关上市公司股票立即暴跌甚至停牌便是明证。

其三，铁路融资培育资本市场。铁路的资本密集性激励了金融工具、机构和市场的发展，这是在西方金融市场获得的经验。中国铁路过于依赖政府信用和银行融资，导致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失去了铁路融资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和衍生金融产品。而在刚刚表达出资本市场活力之时，铁路板块整体通过股票和债券融资的强制性政策进一步绑架了市场，扼杀了市场选择空间。

第十九章

百年前的中国橡胶泡沫

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动摇了清政府的根本。此时，清政府距离最终覆灭，已经无多时日。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专家们力图从全新视野来讨论革命的得失，我曾在前文提及1911年盛宣怀牵头的价值600万英镑的四国大借款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从而导致辛亥革命，这是从事金融史研究的立场上的一说。也有专家从金融投机风潮的角度来讨论，这同样是值得重视的阐述。

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汽车及橡胶轮胎的发明和迅速普及导致全球市场对橡胶的巨大需求。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应用和今天一样，自然在资本市场中获得最快的响应，同样也会引起过度的反应。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和新兴大国美国的橡胶进口量从1908年开始连续每年大幅递增。因为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当时橡胶价格开始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尽管从1908年的2先令跳到1910年4月的12先令，但当时的橡胶成本仅为1.6先令。

一时间，全球各地有条件的橡胶产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都立即建立了无数的橡胶公司，而且都充分利用尚在创新时期的股份公司形式向投资者伸出橄榄枝。上海作为当时亚洲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自然成为橡胶投资的焦点平台。据英国《泰晤士报》统计，从1909年年底到1910年年初的几个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上海新成立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当时有家名为“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翻了一倍。上海拥有大笔资金的本地人、华人和外国人，不舍得失去这样一个大好的发财机会，

纷纷加入到抢购橡胶股票的行列。一些公馆的太太小姐们甚至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但即使有钱，也要托关系才能买到股票。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大约80%的股票被华人购买，在上海的外国人则抢购了20%。很多华人最后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炒作。

位于上海黄浦路一号的西商众业公所是外资控制的在中国经营的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91年，是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营业了50年之久。西商所交易的股票多属于英、美、法、日等几个国家。在1910年6月的一个月內，该交易所安排了30只橡胶股票上市，其中英国公司占了1/3，此次上市卷走了1350万银两。除了外商经纪公司外，许多中国机构和钱庄也雇用经纪人参加交易。值得提及的是，西商所当时推出了各种金融创新，包括股票分拆和分期付款等。

当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一个月內迅速上升十几倍时，我们熟悉的一幕自然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无数新贵和土财主纷纷倾囊而入，普通职员甚至贫民也将致富之路赌在橡胶股票上。投资者无暇判断股票真伪，一味哄抬股价，从上海一路买到伦敦。当时，华商在上海投入资金近3000万两，在伦敦投资超过1000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年可支配收入不过一亿两。

致命的是，投机橡胶诱惑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八大钱庄”（正元、兆康、谦余、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也很快加入了这个行列。而“八大钱庄”的背后，则是号称“钱庄的钱庄”的票号在支持。当时上海有两大票号，即宁波买办商人严义彬所经营的源丰润票号，以及合肥官僚商人李经楚经营的义善源票号。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向投机者提供贷款，同时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做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第二种情况则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例如当时的正元

钱庄东家陈逸卿、兆康钱庄东家戴嘉宝、谦余钱庄东家陆达生三人，先后合作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用于橡胶股票交易。

1910年，全球经济突然逆转，伦敦股市立刻暴跌，迅速导致远在上海的橡胶泡沫瞬间破灭。众多的橡胶股票公司灰飞烟灭，众多投资者和企业家人间蒸发，股票市场失去流动性而停业。更加致命的是，鉴于无数中国的钱庄、票号深度卷入投机，呈现连锁破产局面。最早三家钱庄直接受到牵连，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很快，另外五家和两大票号也相继受到波及。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元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作为大清金融财政的重要支柱，钱庄、票号的受创，让与之关联密切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和民间资金也受到侵蚀，他们相互拆借资金，越陷越深。同时，外国银行也停止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款，并催要还款，直接导致中国的新兴工业和民生陷入灾难，并且被外国资本把持。

橡胶股灾发生后，时任上海道台的蔡乃煌与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上奏朝廷，宣统皇帝特别批准官府出面，向外国银行借款渡过危局。8月4日，蔡乃煌与汇丰等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机构凭借自身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勉强挺过了第一次冲击，维持着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秩序。

当时的理想，希望事情应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

官银拿去救市，官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作为垫付之用。此时，与蔡乃煌有过节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蔡乃煌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第二天宣告清理，亏欠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倒闭。源丰润的倒闭，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闭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经理，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但是，到了1911年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李经楚见势，紧急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翼借款10万两，但被断然回绝。次日，义善源终于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工商业大恐慌随之发生，第三波橡胶股灾开始。



蔡乃煌（中） 处理橡胶泡沫的晚清才子上海道台——蔡乃煌，显然他处理得并不好。

最终，江浙地区的金融和事业发展几乎殒命，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受它们的牵连，多数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面陷于瘫痪和破产。

自洋务运动的同光中兴后，中国经济从1903年开始的连续6年的经济增长被这次全国性的橡胶泡沫所摧毁，导致多年的经济萧条。清政府不得不启动国际大借款以苟延残喘。这场危机动摇了清政府的根本，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可以假设，清政府迫于经济压力，才最终决定收回原本商办的铁路，导致了保路运动的发生，并且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有意思的是，处理橡胶泡沫的晚清才子上海道台蔡乃煌，后投效在民国总统袁世凯门下。1915年，袁世凯为了筹备帝制的款项，任蔡乃煌为粤赣苏三省禁烟督办，与英商勾结，禁止土烟，售卖洋烟，每箱要求烟商报效4500元，预计可获利2700多万元。1916年年初，西南讨袁事起，梁启超、蔡锷等组护国军，云南、广西宣布独立，盘踞广东的云南军阀龙济光遭受压力，表面宣布独立，暗中仍听命于袁世凯。袁世凯又委派蔡乃煌任特派员到广东，一边筹款一边监视龙济光的动静，后来发生了历史上的著名悬案“海珠事变”，蔡乃煌被指为幕后真凶。历经清末和民初的蔡乃煌，展现出了对市场和江湖的充分理解和腾挪功夫，在改朝换代中全身而退。却在后来军阀兵乱和政治斗争中丧命，被袁氏同门将领陷害，将其押赴天字码头枪决时，他的罪名为——蔡乃煌无罪可科，国人皆曰可杀。实在是当代的莫须有之论。

从西方的“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旁氏游戏”到当下的美国麦道夫案件和中国的各种集资与投机，都是资本市场的内生现象，并非传媒宣传和法律宣判所简化的异象。温故知新，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机制。即便屡次发生，也断然各有异同，不可轻易给出评价。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内外融资压力下顶层设计的结果，更

是中国各个阶层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不断参与创造的结果。可惜的是，每一代投资人和监管者都对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过于自信，对过往历史不屑一顾，甚至彻底遗忘。这无疑使我们后来人不得不重复历史的低级错误。

翻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最早一次金融危机，会让我们有许多全新的体验和启发，也会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第一，中国的晚清市场经济和资本积聚基本是在上海完成的，外资金融和中国钱庄、票号之间彼此合作，比恶性竞争更多。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全球推广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结，使得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当时亚洲最具影响的融资中心。因此，具有全国意义的金融危机自然也在上海发生。此前的局部危机，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雪岩垮台和山西票号倒闭等并不能有此等能量。上海出道如此之早，曾带动亚洲纺织、橡胶等产业的国际资本走向，却在百年后仍苦苦寻求所谓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令人唏嘘。

第二，新产业和新产品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一度形成泡沫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反复发生这种情况，而且都是在市场形成时主导了市场的格局。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南海泡沫，就没有现代公司法的形成；没有郁金香泡沫，也就没有现代交易机制和监管的建立；没有上海橡胶泡沫，也没有后来现代金融机构对钱庄、票号的洗牌和10年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奠基（另文讨论）。我们因此可以体验到美国铁路泡沫（1910）、中东石油泡沫（1970）、全球互联网泡沫（1990）以及全球衍生产品泡沫（2000）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和观念的变革。

第三，产业、金融的发展在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在中国尤其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中国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也会将全球危机带入中国，洗劫国民积累。一旦资本市场建

立并与国际对接后，如何建立平稳机制和缓冲地带值得高度关注，但这不应该成为设立人为障碍的借口和拖延对接的理由。

第二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就输在融资上

甲午一战，清政府偿付战争赔款共计3.4亿两白银，等于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战争融资的高收益刺激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毁灭了自己。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100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清朝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除了斗志昂扬外，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加以改善。

在当时的环境下，按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人口、资源、军事力量、朝廷财富等）远远超过日本。当时，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则是8：9，日本稍占上风，但几乎可以忽略。在战舰的质量方面，北洋水师“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也厚达9.5寸；而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强大的装甲防护。不仅如此，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设计时还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有300毫米口径大炮4门，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再说火炮方面，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是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为141：209。就平均船速而言，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也并不明显。

中日之战不仅清朝认为必胜，英、俄、德、法等列强也看好中国，就连日本军界也认为要以破釜沉舟换得与清分庭抗礼的结果。谁知黄海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台湾被割让，东北几乎也被划出去，刘步蟾、方伯谦等留英将领也将卿卿性命

断送在小了几辈的日本同门师弟手上。这种惨烈的奇耻大辱一直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心头，每每成为百年来中日冲突的内在纠结。

19世纪末期，世界各国高度关注海域和殖民地资源，列强都将海军建设当成头等大事。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更是发愤图强，提升军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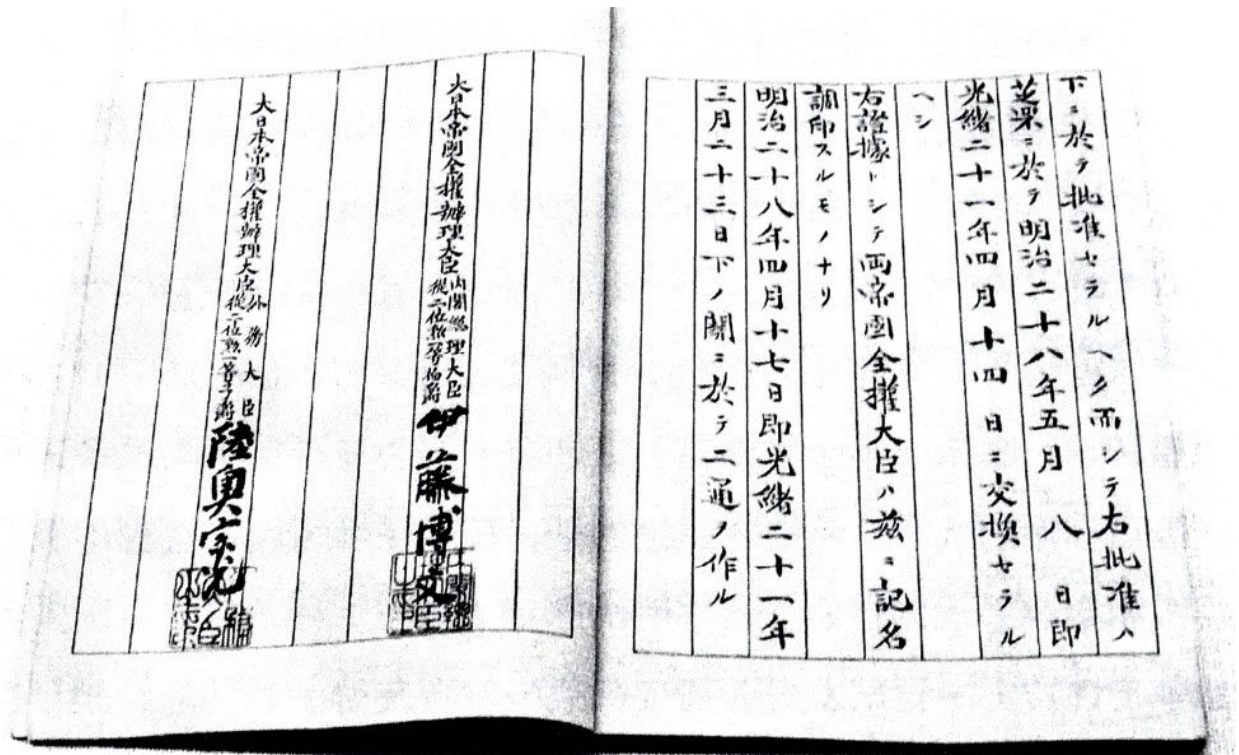
甲午战争前，正值慈禧大寿。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2年1月），朝廷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辟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则特造彩绸10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重挫，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最后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而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旅顺失守。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但此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訢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

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丁汝昌在战前曾提出，主要舰船上应该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却声称无款，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当时中国经济数倍于日本，但在层层盘剥之后，中国实际投入海军的经费却不如日本。尽管中国的北洋水师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舰队，也拥有最为先进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官兵，但在之后的10年基本没有再行投资，甚至维持基本运转的费用也难以筹措。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勘修皇家园林。到甲午海战之前的10年中总共动用了600万两白银，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了436.5万两。

大敌当前，大清海军无力继续购买更为先进的炮舰，甚至已经在英国Armstrong公司订购的两艘巡洋舰也由于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去改成“吉野”号和“浪速”号。这两艘舰只分别在1893年和1885年交付使用，在甲午战争中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重创北洋水师，成为在中国民众心目中臭名昭著的两艘战舰。1900年两舰又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巡弋渤海；1904年被编入第一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攻打旅顺的战斗。



《马关条约》的日文版 日本靠发行国债打赢了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赔款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收益，自此日本的战争融资更变本加厉。

反观日本，当时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的整合花费极大，不能满足军事投资之用，据统计，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日，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日本明治维新（1867）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中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8000万日元左右。据日本学者著述，日清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多万，国库存款2500多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藏大臣一度主张向中国索要10亿两赔款，但担心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为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中国赔偿军费条款中仅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在李鸿章的周旋和西方列强的暗示下，最终，日本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1/3。《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于俄国、德国、法国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放弃侵占中国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又向清政府索要了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同时，在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

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中曾考证，库平是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并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当时，金价上涨，银价下跌，已经成为趋势，因此，英镑兑换比率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却难以遏止，从而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

日本又掠得1494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

由中国掏腰包的这笔巨款被日本用于发展自己的工业、军事以及国民教育事业。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在1897年开创时所用的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该所1901年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张宇燕等经济学家引用过的一份材料显示，从《马关条约》签署到1903年的8年间，日本的公司总数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农商务省公布过的统计数字表明，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到1903年已降至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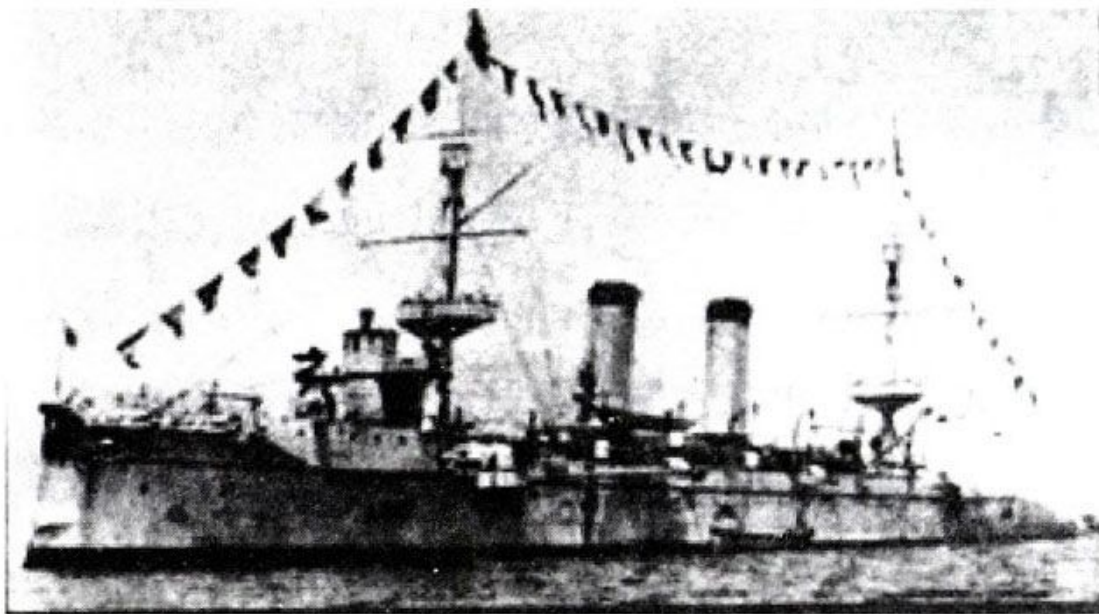
更值得一提的是，战前，中日两国都还使用银本位的金融制度，欧美国家则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当时的纺织业等工业设备和原料、军需品和军工生产设备都需从金本位国购入，银本位制度对日本发展工业限制极大。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货币条例》已经规定采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经由英国支付的中国赔款，则为日本的币制改革提供了资金。1897年10月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后，日本便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它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列强角逐竞争。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地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两艘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吉野”号和“浪速”号成为了主力杀手。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统统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享胜利果实。事实上，日本利

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中国战败后，除了支付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赔款外，还将台湾岛割让给了日本。各国列强则要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战争赔款以英镑支付。如此天价的赔偿数额，作为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得分别向英、德、法、俄等国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实际上，如笔者前一篇文章所述，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巨大收益，战争融资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将中国的赔款进一步用于军费支出，从1896—1905年分三期扩建海军，投入3亿多日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投入军费是政府开支的3.74倍，而在日俄战争中投入的军费是4.15倍。到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各国时这一比率则达到了9.16倍。战争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仍然是政府公债。可是，战争融资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最终毁灭了日本，导致了一段日本的亡国史。



“吉野”号 本为大清订购，后因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买的“吉野号”，在甲午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成为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可以使整个制度倾覆。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那年，也会败在辛亥那年。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日本海军，就有可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改写世界历史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应该假设。

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但又不仅仅是。债券还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惜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

第三，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甲午、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需的透明度和流通性之重要。买公债就附加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表达了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意义，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都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有多大的提升呀。

第二十一章

一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

一张发行与1911年10月25日的铁路债券，无声地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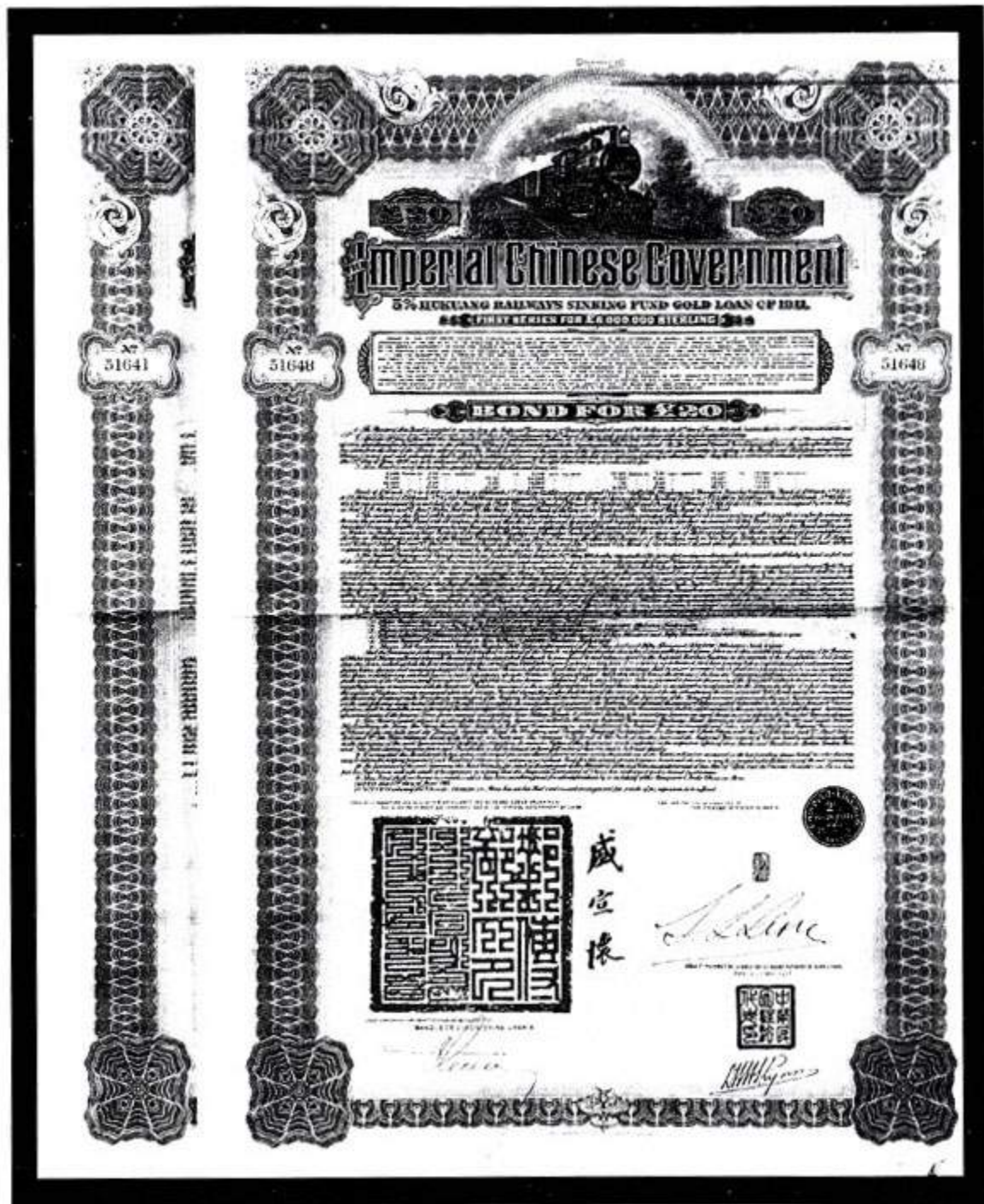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海峡两岸都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政治源泉、军事因素、制度变革以及文化变迁等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和表述。但是，辛亥革命背后的商业要素，特别是金融动力却乏人问津，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切入点。

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整地保存了一张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面值20英镑，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就是这张沉浸了历史密码的旧债券，告诉了我们金融与辛亥革命的直接关联。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张债券直接引发了一场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债券签名的手迹出自盛宣怀，他是这场借款风波中的关键人物。盛宣怀出生在江苏武进龙溪一家官宦人家。16岁那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动荡时局下他随着母亲迁至盐城。23岁乡试落第失意之时，幸得湖广总督李鸿章器重，从此跟随李鸿章左右，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担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铁路公司督办等多个要职。被誉为“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以他独特的沟通能力和经营手段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19世纪末，环顾世界，许多国家将修建铁路作为启动工业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国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实施期间，朝野上下越发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决定修筑铁路，也制定了借债筑路的政策，这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借款修筑不同路段的铁路。作为回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铁路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各国列强也以此控制了中国许多交通枢纽，使得国家权益严重受损。在筹资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颁布新政，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民间人士热情高涨，各省相继设立铁路公司，由此出现

了一段民间铁路建设的高潮。然而民办铁路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短缺、管理不善以及贪污亏空等使得民办铁路建设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 毫不夸张地说，这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

盛宣怀是极力主张修筑铁路的清朝官僚之一。有学者统计，清朝共修筑铁路约9100千米，其中3962千米是外国人修筑并经营的。中国自筑的铁路5100多千米，其中政府筹款修筑铁路4465千米，商办铁路657千米，而盛宣怀一人就督办筑成铁路2254千米，占到政府筹资修建铁路的将近一半。

盛宣怀始终认为铁路建设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国家财政起到关键作用，必须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而清政府财政困难，需要不断向外国借款，铁路几乎是大清在海关和港口权益之外唯一可以为外国所接受的抵押权益。在张之洞生前动议并谈判的向列强借款合同的基础上，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提议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股票改换官办股票，有不愿换票者给还股本或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川省铁路股实用款项，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不得由股东收回。这事实上就是用官定价格强制将民营铁路国有化。

同时，盛宣怀又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又称湖广铁路债券），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担，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做抵押，聘用英国、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各一名，分别修造粤汉铁路及川汉铁路。至此，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等本来属于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将铁路收益权抵押给了外国人。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已经允准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开端。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的这一草率和霸道行径，已经使民间人士的忍耐度达到了极限。各省成立保路同志会，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最多时参与人数达20多万。他们以“破约保路，维护完全商办”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保卫路权运动。川路公司曾违规炒股亏损300万两白银，地方官员也试图浑水摸鱼让朝廷承担损失，故而激化矛盾，使得四川成为保路运动发展最为迅速、激烈的地区。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在广东，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最开始，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后，根据条款，英、美、法、德等国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了西方列强。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吃尽了苦头，所以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

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当时的舆论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保路运动。1911年7月17日，《申报》10版题名为《四川人之争路热》的文章中写道：“四川保路同志会开会於成都铁路董事局，到者二千余人……因借债而路亡，因路亡而国亡……”演说力驳路归国有与借款合同之损失。1911年9月28日，《申报》4版题名为《川路滴滴血（八）》的文章写道：“今政府未与协议，一旦收归国有，富者无端失此大利，心已不甘，路股七百余万金，政府又镶为己有，贫民减衣缩食之所积遂归乌有之乡，痛在切肤，情何能忍，于是倡议争路。而官吏阻之，遂不得已罢市罢课……”

为了缓和局势，四川咨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不久，川路股东4000余人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确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派人赴各地讲演，联络其他团体，并选代表赴京请愿，力争废除借款合同。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指责保路运动领导人滋生事端，将赴京请愿的代表押解回川，并命川督赵尔丰兼程赴川。赵尔丰囚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保路同志会近万人到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

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反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8月4日，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¹⁾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

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当。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后，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辛亥革命从此启动并大获成功。

令人唏嘘的是，1911年10月25日，盛宣怀被革除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朝廷特意在旨意上表述为“永不叙用”。被革职两天后，从权力巅峰跌下来的盛宣怀离开北京，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从中国大连港出发，乘坐一艘邮轮前往日本，67岁的清朝老臣开始踏上流亡之路。5年后，盛宣怀在上海郁郁而终，这也是清朝官商背景下相对放眼世界人物的集体命运。



盛宣怀 “中国商父”盛宣怀，在历史书上是不折不扣的反角，然而显有人知的是，正是他奠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保路运动只是导火索，国际压力和国内变革力量日渐增大，由于大清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风云际会之时，需要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直接导致盛宣怀强力实施民营铁路的国有化，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助产士。金融的力量终于破土而出，成为使新旧制度更替的最重要的因素。

也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能力来设计这样一个机制，筹集本土的资本投资于本土的铁路，辛亥革命也许就有不同的路径，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这种假设毫无历史逻辑的支撑。但是，换个角度，欧洲工业文明之所以如火如荼在300年间根本解构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市场规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各国同样的银行家们真是居功至伟。他们从16世纪起，将早期的货币汇兑、典当和高利贷等生意有声有色不受干预地演化成在今天仍然是主流的金融体系。而当时早已经更为成熟的钱庄、票号的中介服务生意始终在政府打压下各自为政，苟延残喘。想到早在美第奇家族之前600年就创造了纸币（宋代交子）的中国金融先驱者们，更让我们后人不胜唏嘘。

这么多年来，我们研究辛亥革命都无视背后金融因素的力量。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制度变革和社会演化时继续将金融视为无物或者妖魔化，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四国借款之后的执行也很复杂。湖广铁路债券利息1938年停付，部分本金在1951年到期未付。持有债券的几个美国公民1979年在美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本息。法院一审判决中方败诉。中国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享有主权豁免因而拒绝承认判决结果。1983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时也谈到这个事情，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1984年，美国地方法院重审此案，以美国相关法律不追溯国家行为等理由撤销了判决。1987年，原告再次上诉未获批准，此案终结。

(1) 今四川资中县。

第二十二章

曹锟贿选与金钱政治

世界上一些国家政治献金、贿选等丑闻层出不穷，金钱与权力的合流难以避免。回顾历史，我们是否应有更宽容的视野？

中华民国的第六任总统曹锟在任时间不足一年，却直接推动了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在北京颁布（1923年10月10日）。据今天的法学家评价，这部宪法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多党制衡、新闻自由等特点，而且联省自治的方案与当时世界流行的联邦制相一致，乃领先于亚洲的宪法。不过，这部宪法从未执行，一年后便被段祺瑞政府轻易废除。除了新官上任都要建立自己的新发展观这一惯例外，据当时舆论言，这是一部贿选总统制定的宪法，因人废言废事就是自然的了。

曹锟出生于天津一个贫穷的造船工家庭，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在他的政治和军人生涯中经常受到耻笑。年轻时，他曾是保定府街头的布贩子，1885年弃商从戎，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又参加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清陆军第三镇统制的曹锟奉命率军进攻山西革命军。1912年1月调防北京，2月曹锟改称陆军第三师师长，受袁世凯唆使，制造北京兵变，为袁世凯拒绝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制造了借口。1915年年末到1916年年初，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称帝，曹锟是公开表态支持的一个军阀首领，为此他被封为“虎威将军”。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曹锟奉命入四川，但于1916年3月战败，同年9月受任为直隶督军。1917年张勋复辟遭到曹锟的反对，但同时又随同冯国璋、段祺瑞反对孙中山在广州维持的旧国会和护法运动。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

曹锟虽然出身贫寒，又是军旅出身，但他用心缜密，在北洋军阀体系中颇孚众望。冯国璋去世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首领，逼退徐世昌和黎元洪两位总统后，开始操控国会，用重金公开收购议员的选票，当选总统。



曹錕宪法纪念币 因人废言废事让一部伟大的宪法彻底被历史掩埋。

实际上，辛亥革命后，选举总统的过程一直就十分坎坷，到曹锟逐渐掌权时，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让总统选举更加复杂。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却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次日晚上，在小麻线胡同的一所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定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与此同时，津派、保派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到1923年10月5日的选举会，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以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中山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鼎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等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上述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鼎升是地方民意代表，其中有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

实际上，这次选举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

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

其贿选的公开与强迫行为，被传媒渲染得锣鼓喧天，引起公愤。此时担任南方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和所有投票的议员。用5000块大洋买来的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曹锟也被称作“猪仔总统”。次年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政变，将曹锟软禁。从此，曹锟退出政治舞台。这次贿选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谈，更成为民间文学演绎的素材。曹锟后期曾拒绝日本人邀请出山，其坚持反日的正面形象被淡忘，去世后被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今天少有人知。

曹锟贿选，自然是丑闻。但在商业史和金融史上却不能简单以街谈巷议而结论。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政府割据对抗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曹锟作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者，可以用政治阴谋和武力威胁相继赶走两个总统，占据京津重地，踌躇满志，缘何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如此大费周折，不惜动用家财和舆论，百般讨好议员，显然更有远谋。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球大势，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结局等固然是环境约束，但曹锟本人要顺应时代变化，采用金钱民主的手段更是重要原因。相对于直接军事镇压反对派而言，曹锟通过其弟曹锐和朋党动用大洋收买议员拉选票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接受贿银投票给曹锟的议员几乎全部是1913年中华民国首次大选时投票让宋教仁获得大胜的议员，基本是各省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是推动辛亥革命的社会精英人物。不过10年间，政客的纷争、军阀的混战、理想与现实的磨合、激情向老练的转化等，使得这些社会才俊和社团名流纷纷参与贿选。不仅有人拿了曹锟的钱，还有40多位议员拿了曹锟竞争对手的钱，也有两面都拿的议员。个中复杂，显然并不是一个5000大洋便可以概论的。许多参与拉票的议员也期待通过曹锟当选能推动第一部宪法的实施和多党政治博弈的格局从军阀混战中脱胎而出。贿选不过是低成本实现目的的一步。



曹錕 因为贿选的道德污点，曹錕输光了所有筹码。

即便贿选，曹锟毕竟也要支持一个先进的宪法（该宪法草案已经打磨了10年之久），要给老百姓一个未来愿景，要给近500个议员（当时的社会名流和贤达人士）一个短期的承诺，要与竞争敌手讨价还价，要给同党追随者以现实利益。而这些承诺和妥协至少要通过大家可以看到金钱或预期到的商业利益来进行调节和结算，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口号和各种主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贿选也是符合程序的，曹锟当选也构成了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无论是否合理，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贿选在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只是方式不同。古罗马时期的贵族政治竞争中，就已经非常娴熟地利用公民权和领地拉票选举执政官。尼禄皇帝也直截了当地用金钱买来贵族对他改造古城等项目的支持。中国历代朝廷中用金钱上下打点完成政治目的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曹锟不过是过于自信成王败寇的规则，一厢情愿地企图用日后的成就来弥补贿选的失德罢了。

换一个角度说，金钱其实是政治变革的重要杠杆。孙中山的革命一路走来，也是依靠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支持，张静江便是首要功勋。张静江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盐商巨富之家，但他本人则是中国最早的从事国际贸易致富的商人，20世纪初，张静江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活动，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成为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发挥商人视野和特长，主导了被称为“黄金十年”的1928—1937年中国大建设，他在现代中国铁路、公路、电力、通信、能源和市政建设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位宁波商人虞洽卿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长期资助者。1916年孙中山为了建立长期资本来源渠道，与很早理解交易市场的虞洽卿达成一致，共同筹备一个股票交易所。几经磨难，终于在1920年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交易所。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和陈果夫等后来把握国民党政权的人物都曾直接参与，甚至进场交易。其中蒋介石和陈果夫曾有专营的交易商执

照，尽管前两年曾有赢利，但在1922年的上海信托和交易所倒闭大潮下亏损退出。

早期国民党人在商场的沉浮经验导致他们高度重视对金融与财经大权的控制，长期重金聘请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专家为民国政府设计货币改革政策和金融体系，始终推动中国货币及资本市场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其中，1933—1935年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次金融改革，保证了八年抗战的财政与经济运转。

其实，推动政治变革和组织社会革命，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撬动工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任何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领袖都需要金钱作为长期执着事业的资本。将曹锟贿选过度道德化解读，实际上是偏狭隘地甚至是故意地以声讨贿赂为由来回避讨论国会选举和行宪的必要性。果然，段祺瑞执政后，立即解散国会，赶走议员，恢复军人执政。尽管段祺瑞本人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但道德清高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昌明。

时至今日，政治贿选在各国仍时有出现。不过，公然贿选已经成为暗流，政治献金和捐赠正在被各国制度广为接受。政治献金的公开性、专属性和与直接回馈的隔离性等使得其与贿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是有巨大模糊空间的，这也是选举法律中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丑闻不断，多与贿选相关。美国、欧洲也时常有政客因收受贿款而下台。因此，我们在重温百年前曹锟贿选事件时，也应当有更为宽容的视野。

金钱与权力始终是一体的，没有金钱支持的权力难以长久，没有权力的金钱也是朝夕不保。古往今来，金钱与权力始终彼此向往，千方百计结成纽带。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二者是否结合，而是金钱分散和权力分散，是制度的稳定和公开。当千百万创业者、企业家、消费者都可以拥有财富和资本能力时，当拥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家都能选择并顺从自己的主张群体时，多元的财富博弈和权力制衡就建立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

第二十三章

民国金融的大突破：废两改元与法 币的建立

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

大家都熟悉，秦始皇在完成大业的过程中，实行了几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铸币权，发行秦半两，更是被后世经济学家们高度赞赏。但事实上，2000年前的商业很不发达，货币还是城市居民和上层社会的支付手段，所以这项措施更多的是传达出秦朝统一天下的意义。此后，各个王朝不断在货币统一上反复折腾，但一直未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是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

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各地仍是诸侯割据。明清两代以白银为主体的货币制度，虽然经过多次币制改造，特别是张之洞主导的“废两改银”，但各种货币还是同时流通。市场上使用的银两和各种铜钱的形状、成色、重量、类别、规格等差异诸多。大清龙洋和墨西哥鹰洋混用，汇票、外钞、黄金、碎银、珠宝甚至烟土等都是流通货币。这给政府税收、商业交易、民众消费等行为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当时民间钱庄林立，从业人员必须能同时应付七八种不同货币，瞬间就要完成汇兑和交易，实在算得上是独门手艺。

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同时还是中国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混乱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支付中的大部分银两也是兑换成英镑，直接存入日本在海外的账户，后者大大推动了日本向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

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无论是出于军事统治还是外部压力的需要，这三位用果敢手段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早在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北洋大臣的时候，面对战后社会混乱、物价波动、钱庄银号纷纷倒闭、货币流通不足、金融体系崩溃的局面，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了统一货币的措施。首先，袁世凯命令天津知县张涛打击私造制钱、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并且下令禁用制钱。其次，他还建立了天津官银号，是中国的第一家省级国家银行，一方

面用于开办储蓄、集聚官民基金、发行货币、规范金融市场、稳定金融秩序。另一方面用于低息放贷于私营企业，支持了北洋实业和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再次，袁还责成周学熙建立了“北洋银圆局”。周履任后，随即向社会招聘技师和工人，两个多月内，造出铜元150万枚，并且成功造出银圆，当年获利70余万，不仅稳定了社会经济，还有力地支持了直隶财政。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打击违法铸币，禁止滥用私钱，建立银号，建厂铸币，加大货币投放，增加流通，平抑物价，稳定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1903年天津士绅兴办的天津初等工业学堂，天津官银号为其贷款2000两。同时天津官银号还放款70万两给天津各中小钱号，恢复市场。1904年，天津商会协理宁世福创办织染缝纫公司，天津官银号为其贷款1.5万两。另外天津官银号还为劝业铁工厂贷款20万两，为启新洋灰公司贷款50万两，这些措施恢复了天津的民族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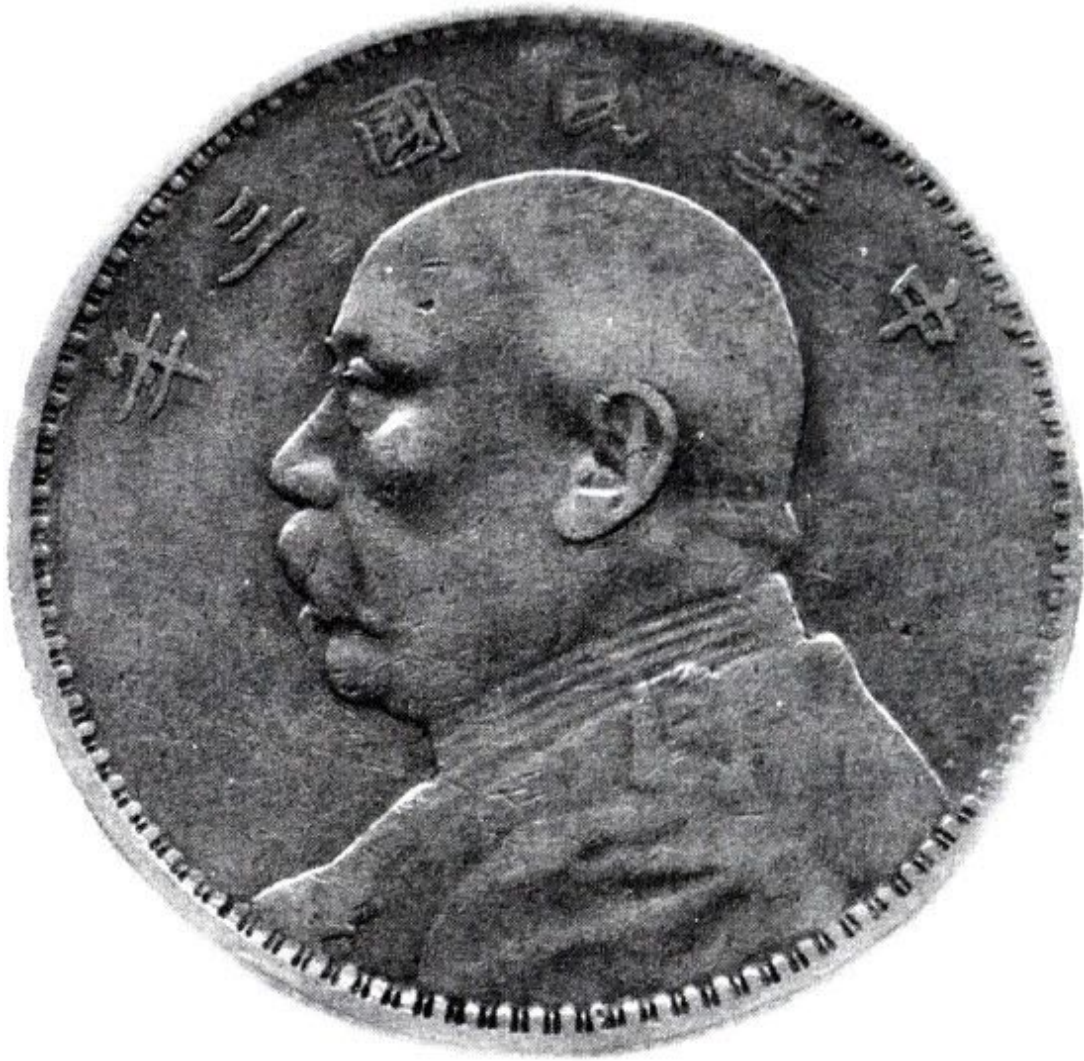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担任了民国大总统。为应付财政危机、国库亏空和充实军费，除了对外借债和提高税金外，袁世凯在之前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清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立即推行币制改革，同时公布《国币条例》，设立币制局，垄断铸币权。

为了能够顺利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于1914年3月8日设立了币制局，委任当初的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为总裁。梁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要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1914年12月，天津造币厂首先开铸新银圆，印有袁世凯头像。南京、武昌等造币厂跟进，“袁大头”银圆大受民众欢迎。但是，“袁大头”的发展还是经历了诸多困难，为了为币改筹集经费，袁世凯曾

试图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支持中断。随后，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下，梁启超黯然辞职，币制局也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在此期间，新币铸造的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最初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考虑到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最后决议改从原北洋造银圆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3%。这一改动虽然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保证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到1920年，全国已经铸新银圆3.8亿多元，基本驱逐了原来流通市面的大清龙洋与墨西哥鹰洋。尽管各地仍然有不同金属货币或纸币的发行，但“袁大头”已经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兑换和清偿货币，事实上形成了银本位制度的现实基础。



银圆“袁大头” 在中国商业现代化转折的背景下，“袁大头”客观上起到了统一全国市场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袁世凯的金融政策堪比秦始皇。

“袁大头”银圆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客观上也起到统一全国市场的作用。当时，在西方各国纷纷采用金本位制度的环境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银本位特区。各国白银纷纷流入中国，供给增大，白银价格下跌。中国银圆事实上的贬值大大有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1908—1920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以上，长三角地区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当然，这个被遗忘的中国黄金发展时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需求和当时中国政府鼓励市场经济发展共同的结果。

近年来，各界对袁世凯称帝的背景和他本人的心路有了很多新的解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余年，现在的我们对当时中国社会分崩离析的权力格局已经相当陌生，习惯于用我们当下的民主政治观念进行解读，袁世凯统一铸币权并推行“袁大头”银圆的事件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在中国商业现代化转折的背景下，袁世凯的金融政策比当年秦始皇的统一货币更具现实意义。

翻过袁世凯的一页，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卷土而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老牌经济强国因此受到冲击，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33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这项举措引起了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南京政府为了应对白银外流，立即通过增收白银出口税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税率仍赶不上世界银价上涨的幅度，就此，在不久后，废两改元法正式公布，即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圆作为流通货币。

作为主导废两改元的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这项措施，除了国际局势外，国内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面临一个经济规模急剧增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规模、生产能力、消费能力还是投资需求等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阶段。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资产货币化

迅速提升，除了外资银行外，本土银行也有数百家，证券和股票交易非常活跃，上海成为远东重要的金融中心，黄金交易量甚至超过法国和日本。

民国之前的几百年，尽管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已经习惯性地接受银金属作为支付手段，但是，并不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更多是约定俗成。而且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也在不断变化。银圆作为个人结算和流通手段与银两作为机构结算和价值储藏手段同时并存不悖，仍然是阻滞市场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与国家普遍采用的金本位背道而驰，始终是当时中国加入国际市场的屏障。国民政府提出《整理财政大纲案》（1929），拟分两步走，即“废两改元”实现真正的银本位，之后，再推行金汇兑本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美国留学归来，对西方社会的金本位制度非常熟悉，极力主张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强力主导推进改革。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规定自3月10日起各业交易改用银圆计算，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为法定银圆价格。从此，银圆成为民国时期国家使用的正式本位货币。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实施了对黄金和鹰洋等的限制令，统一了全国各地几十家造币厂的铸币权。到1933年年底，废两改元全面成功，完成了明清和北洋政府梦寐以求却无力实现的目标，也真正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地位，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国家。

不过，好景不长。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宣布公民持有黄金为非法，同时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对于美国建国后金银始终是货币储备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而言，这个政策导致美国事实上处于银本位制度上。白银价格大幅上涨，为提高白银储备量，1933年12月—1934年5月，美国分别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采取提高银价，实施禁止白银出口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计划在4年内每年收购白银2442万盎司，试图控制世界白银市场。

世界白银市场银价的普遍上涨，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动摇了中国银本位制的基础。1935年，中国发生了“白银风潮”，白银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严重缺乏支付工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大规模失业爆发。银本位刚刚启动一年半，便进入了死局：银圆贬值则外流，升值则通货膨胀，经济进入全面危机。

1935年11月，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采取果断措施，将白银立即国有化，停止出口，切断白银与国际汇率关系。同时立即由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发行法币，禁止白银流通。法币是国家法定信用货币，具有无限的清偿能力，与金银含量无关，与汇率相关。法币先与英镑后与美元建立了固定的汇兑关系，因为后者可以间接兑换黄金，所以这是金汇兑本位。中国酝酿已久的银本位不足两年便进入了金汇兑本位。

法币制度和金汇兑本位的实施要将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得到经济大国的支持。当时，日本作为事实上的敌国，强烈反对法币并动员各方力量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英国顾虑与日本关系，也拒绝了孔祥熙的2000万英镑稳定贷款建议。经秘密讨论，最终中美双方签订了协议，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近2亿盎司，收入1亿美元，奠定了法币改革的基础。

法币的建立在形式上将中国的中世纪货币本位一步推到了金汇兑本位，实现了货币现代化，避免了中国当时的全面经济危机，也建立了之后整个抗日战争的货币支撑体系。当时担任伪中央储备银行顾问的日本人说：“如无1935年之币制改革，亦无1937年之抗战。”在20世纪30年代，国乱如此，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任财政部长在整合和提升中国初级规模的早期货币制度上是具有历史贡献的。



民国法币 民国法币并不仅仅和“通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法币的建立避免了中国的全面金融危机，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货币支撑。

附：我为什么要办金融博物馆

中国金融博物馆两周年之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题目，直截了当。我立即答应下来，马上动笔。有太多不同圈子的人在反复地问，我也是不断自问并不断调整答案。我既不是学金融专业的，也非历史学者，更不是搞博物馆的内行，却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突然扛上了创办一家金融博物馆的事情，改变了职业生涯的轨迹，也开启了另一次创业之门。

金融博物馆的由来与“被套”

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看到一篇英文报道说，造访位于华尔街上美国金融博物馆的访客是以往年份的几倍，让我很是好奇。当年10月，我在去纽约出差时与天津市的崔津渡副市长一起与索罗斯讨论次贷危机，他也提到这家博物馆。于是，我们乘兴而去，不到一小时的参观，让我们印象深刻。中国人习惯的博物馆多是集中介绍古董和收藏品。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博物馆通过声光电手段和栩栩如生的画面，让我们迅速地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去华盛顿特区的路上，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应当有这样一个以教育功能而非收藏功能为中心的新兴博物馆。崔副市长希望我能协助找到相关专家，他在天津物色场地，一起合作创建。不久，崔副市长陆续寻找了四五个场地，亲自带领我实地考察勘定。同时，我也在北京、上海、四川和天津等地四处访问专家，征求各方意见，也看了几十个不同的博物馆。不过，专家却始终没有落实。

这有许多原因，其一，中国金融历史很短，资料缺失，年轻人对金融史没有兴趣；其二，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金融和历史学者有强烈的居高临下教诲他人的情结，不习惯博物馆的对话与启发模式；其三，同时熟悉历史、金融、博物馆知识，又有操作能力的人太少；其四，也是最重要的，除了我自己外，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完成这个博物馆。受人之托，一诺千金，我只能被“套牢”了。

我几乎翻遍了所有中文的金融史著作和相当有分量的英、日文金融史资料，初步学习了金融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金融史和博物馆管理学。同时，我开了“金融观念史专栏”，也在商学院开设了金融史课程。有几十年从商经验的积累，回头读书读史，常有豁然开朗的情趣，乐此不疲，一晃竟然3年了。当然，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与一批大学生、研究生为主体的创业团队，在各界的支持下，两年内建立了两家与金融相关的博物馆。

金融博物馆的创建与困惑

在天津开业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主展包括中国金融史、金融与我们、民间金融演义、黄金简史、天津金融等，特展则是与美国金融博物馆一起合作的次贷危机展览和通货膨胀史。在苏州开业的中国基金博物馆则包括了共同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公益基金以及姑苏金融史等内容。我们还利用博物馆的场地举办了近20次相关的金融专题展、艺术展和设计展等。许多重要机构也来博物馆举办各种会议和论坛，甚至我们还办了两场婚礼。特别是博物馆建立了书院，在几个城市推动公益读书活动，得到强烈的反响，也带动了北京几个书院的建立，彼此声气相求。

博物馆的创建过程中有许多探索中的困惑，体制和习惯的制约迫使我们不断调整生存方式。例如：

第一，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博物馆当然要有政府的执照审批、管理和财务支持，但是以教育功能为主的民间博物馆还是应该以民间主导为佳。博物馆是意识形态领域，展示主题、内容、逻辑和文辞等都有敏感性，官方主导有严格约束，动辄得咎，马虎不得；民间主导则有空间和余地，有功自然属于政府，有误民间管理者承担风险和责任。例如，我们最近与英国同行共同策划的《中英金融史》，涉及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敏感课题，我们都是反复考证历史，用展品表达历史逻辑，给访客以思考空间。

第二，公益经营与市场开拓。政府博物馆经费源于税收，免费自然是应有之义；民间博物馆基于市场经营，而且经费来源多样，可以根据理事会原则自主选择。政府基于提升文化品位和公益投资的考虑，会给予民间博物馆各种财务支持，但常常带有招商引资的意图，因此依赖财政拨款是不实际的战略。在目前的大众感知水平上，博物馆的论坛、展示、会议、纪念品和咖啡店等收入只是减少亏损的手段，会员俱乐部和捐赠也不会短期内有效。因此，办博物馆必须有公益支出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办法。我们在两周年庆典上推出“金融牛”的署名竞拍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第三，藏品与团队。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特别是类似金融这样历史很短暂的主题，以传统方式根据藏品价值确定博物馆的地位是不合适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创建博物馆的过程中，大部分精力都在与相关部门不断讨论和证实我们的合理性。仿佛金融博物馆的意义和价值是由盗墓高手和考古专家来认证，而不是金融界专家和社会观众来审定。在反复面对文物局领导质疑我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时，我坚定地回答：镇馆之宝就是我本人和创建团队。

第四，专家兴趣与大众教育。在创办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考核和质疑，因为大家都想证实我们的学术水平，大家潜意识里认为，博物馆必须是一个钦定的学术权威，这是由于中国博物馆长期由政府垄断和评定形成的思维定式。其实博物馆仅仅是一个平台，是一个需要

不断提升自身水平的交流平台，与观众教学相长，没必要有什么耻辱和不安。我们始终重视观众的指教，不断学习改进。博物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或者你是什么级别，而在于你能如何改变社会，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大众。

金融博物馆的意义与期待

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在过去30年里专注于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可以理解的主流旋律，同时也凸显了急功近利和成王败寇的社会价值观。全球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欧洲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沉迷于大国经济崛起的中国企业家和消费者直接面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调整政策失灵的局面。由此，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过程合理性迅速成为主导当下和未来经济思维和行为的重要坐标。

经济史与金融史就成为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无暇也没有能力引经据典地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条件下，在故作高深的学者们还在慢条斯理地纠结于学派门第之时，阴谋论就成为了一种快餐和祷告文，迅速在大众中传播开来。

金融博物馆就是普及金融教育，启发民智和提升金融素质的公共平台。它不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也不是收集金融票证用品给少数专家把玩的后院仓库。扫除金融文盲是一项长期的使命。金融市场千变万化，每隔几年，知识就淘汰更新，不断学习和提升金融技巧是现代企业竞争的手段，也是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两年来，中国金融博物馆吸引了4万多名观众到场，积累了丰富的沟通和分享金融知识的经验。

金融博物馆是不断变化的平台，我从来不用完美主义来苛求自己和他人。即便历史悠久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只要给我10分钟，我就可以挑出10个毛病。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断学

习，善于改进，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天天进步。对我而言，人们对博物馆的表扬便是鼓励，冷嘲热讽便是鞭策，恶意攻击也是肯定我们的能力和影响。从善如流就可以因势利导地发现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和机会。

我为什么要办金融博物馆？因为我喜欢学习和挑战。有太多的人在挑战现实和未来，我也如此充满激情地经历这一切。回首一望，很少人在挑战历史，我有了基本的条件，懂金融、爱历史、能操作，因此成就了愉快的新生涯。

部分参考书目

1. [英] 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
3. [美] 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 [美] 戴维·凯里：《资本之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马勇：《容忍历史不完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2年版。
6. [美] 莱因哈特、罗格夫：《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7. [日] 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系列，中信出版社。
8. 央视《货币》纪录片主创团队：《货币》，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9. [美] 帕克斯：《美第奇金钱》，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10. [美] 罗伯特·J. 希勒：《非理性繁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姚遂：《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2. [美] 鲁宾斯坦：《投资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13. [美] 凯斯勒：《我们如何来到现在：商业、技术与金融趣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14. [英] 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5. [英] 尼尔·弗格森：《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6. [英] 尼尔·弗格森：《纸与铁》，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7.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18.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 [美] 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五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
20. [美]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
21. 盛溢等编著：《博物馆里说金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 叶有明等编著：《博物馆里说基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 李弘等编著：《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4. [美] 盖斯特：《百年并购》，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
25. [美] 戈兹曼等人编著：《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
26. Brooke Hindle and Steven Lubar: *Engines of Change: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90-1860* (Oct 17, 1986)

一部以皇权为中心的垄断史，只会以从上向下的角度记录统治的权术，向人民展示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经过加工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后，人们无法看到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一旦将那些真正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展现在人们面前，书本中的历史立即变得苍白无力。而被极力渲染为无恶不作、流着鲜血的资本，恰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本书作者在筹建中国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金融史，结合自身3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细节线索，抽丝剥茧，连缀成文，详细描述了一系列小的金融创新如何在历史的纵深中产生令人惊叹的蝴蝶效应，悄然改变历史的进程。例如，宋代交子预兆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结构，张居正的变法导致了300年后的鸦片战争，一张债券引发了辛亥革命等。凯恩斯讲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本书所包含的一系列金融故事，足以挑战你的固有认识。

选题支持：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 卢国俊

监 制：马利敏

图书策划：高龙柱

特约编辑：艾秋霞

责任编辑：董祎萌

封面设计：



订购电话：010-83670073

购书网址：www.chinamediatictime.com